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
學報

2015/08

教育科学

EDUCATION SCIENCE

第31卷 第8期 (总第159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军 尹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李洪天

张广才 张勤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教育科学

【本刊特稿】

- 试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条件保障 王海英(1)
-

【素质教育论坛】

“成人”教育与“德性”实践

- “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素养价值探究 葛敏(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周璐(13)
中小学生公民技能培养的必要性及其实施路径 罗嫣才(17)
-

【德育心育研究】

- 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 金奇(21)
反思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分析 陶磊(24)
计算机说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路径 徐惠忠 贲智勤(30)
认知神经科学青春期研究理论对小学高学段教育的启示 程世英(34)
新时期“江苏精神”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王瑾(38)
-

【高等教育研究】

- 试论我国高校预算管理的现实诉求 章跃一(43)
高校实施《内部控制规范》面临的困难与对策研究 毛成银 吴云飞(48)
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 SWOT 分析 张英花(53)
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初探
——基于培养对象现状调查的研究 徐宁 胡春妮(58)
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中的“双导师制”研究 王家华 张杰(63)
-

以权利义务对等观为导向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构建研究 庄素娟 甘 诺(67)

【学前教育研究】

- 关于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思考 彭 云(70)
我国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研究述评 徐 琳(75)
专业标准背景下幼儿教师职前培养路径
——以绍兴文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孙 燕(81)
-

【教师教育研究】

- 新型师生关系的当代伦理意蕴 张 勤 赵敏奇(85)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视角下的教师教学力研究 石 丽(90)
关于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朱韩兵(94)
基于教师政策的“好老师”培育路径研究 王共蒙 黄 荣(98)
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教师文化探索与实践
——以无锡市江溪小学为例 杨伟光(103)
-

【课程教学研究】

- 基于学生立场下的语文教学标准答案的思考 陈尚达(106)
历史背景下的语文教学
——兼与李山林教授商榷 张长霖 王家伦(111)
产出导向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研究 黄 珍(115)
卫生法学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促进 祝 彬(120)
-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Vol.31 No.8(Serial No.159)

Aug.2015

Main Contents

Guarantee Conditions for China's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WANG Hai-ying(1)

"Adult" Education and "Virtue" Practice

——On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Virtual Leadership" GE Min(9)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Civic Skill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 LUO Yan-cai(17)

From "Virtue is Knowledge" to "Virtue is Capital" JIN Qi(21)

"Computer-aided Persuasion": An Important Path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XU Hui-zhong BEN Zhi-qin(30)

Practical Demands of China's University Budget Management ZHANG Yue-yi(43)

SWOT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aizhou ZHANG Ying-hua(53)

Exploration of Reform of Postgraduate Programs on Economic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ostgraduates XU Ning HU Chun-ni(58)

A Study of "Double Tutorial System" in Combined Postgraduate Programs by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Centers WANG Jia-hua ZHANG Jie(63)

Role Identity of Tuition-exempt Male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PENG Yun(70)

Research Review on China's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Rural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 XU Lin (75)

Construction of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 ZHANG Qin ZHAO Min-qi(85)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 ZHU Han-bing(94)

Thoughts on the Standard Answer in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udents

..... CHEN Shang-da(106)

On Viability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in Extensive Reading HUANG Zhen(115)

试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条件保障^{*}

王海英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协调运行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保障,譬如基本的组织机构、必要的制度规则和平台建制。从组织保障来看,教育改革领导小组是教育改革的领导机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是教育改革的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第三方是教育改革的监督机构;从制度保障来看,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平台保障来看,包括技术平台、业务平台、信息平台。

[关键词] 社会支持系统; 条件保障; 组织保障; 制度保障; 平台保障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01-08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是一项复杂工程,^[1]涉及政府支持、民间支持、政府—民间支持三大板块、十个要素,其错综复杂性可想而知。如何才能保证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理想架构能协同运行、运作良好?一套结构良好、功能健全、措施有力的保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2]在当下的语境中,一些基本的组织机构、一些必要的制度规则、一些必需的平台建制,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得以良性运行的系统保障。在这些组织、制度、平台中,官方与非官方、正式与非正式、长期与短暂多元共存,共同筑建起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社会防护网。

一、社会支持系统的组织保障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并非一个抽象的逻辑架构,而是一个有着特定行动目标和运行逻辑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依托多元的组织架构、复杂的组织关系和有效的组织运作。来自政府的、民间的和政府—民间的不同组织构成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细胞,彼此之间的互动合作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生成了不同的组织运作模式。

(一)组织保障的构成

在当下日益多元的社会里,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组织基础也必须是多元的。这一多元属性具有两层内涵:其一,组织主体的多元性,即既有来自官方的组织,如政府各个部门、人大、政协等教育改革的决策机构,也有来自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如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基金会等教育改革的参与机构,还有来自非政府、非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第三方,如人才市场、社区机构等教育改革的监督机构;其二,组织结构的多元性,即建立在多元主体的专业分工、业务范围、任务目标、协调程度基础上的组织关系也是多元的,其中,组织结构的多元性是组织主体多元性的反映和结果。

1. 教育改革领导小组:教育改革的决策机构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由三大子系统构成,政府支持子系统的主体是不同级别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鉴于政府自身机构的复杂性、层级的垂直性和政府职能的多样性,若想政府支持子系统更好地发挥支持教育改革的作用,就必须建立起能够协调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且专门服务于教育改革的统筹机构。譬如,在推进《国家中长

*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2JZD046)。

[收稿日期] 2015-07-15

[作者简介] 王海英,女,江苏高邮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讨论教育改革的各种重大问题,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决策机构。

从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功能来看,它不是在政府内部重新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现有机构之上的决策机构,而是在政府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对与教育改革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功能整合,从而以更快捷更高效的方式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各项决策。可见,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并非政府的正式机构,也不是政府的实体机构,而是一种政府治理的运作机制,通过将与教育改革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进行功能统筹的方式形成一种决策机制。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改革领导小组中,领导人、相关成员、下属机构等并非独立编制、独立处室,而是兼职性质、协调机构,其目的仅仅在于针对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统筹、决策。因此,各地的教育改革领导小组通常由当地分管教育的一把手担任组长,整合与教育改革相关的重要职能部门,如教育、财政、发改、编办、住建等部门的负责人来进行综合决策。实际上,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教育改革的决策推进从个人决策走向组织决策,从领导个人决策走向职能部门综合决策,进一步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2. 民间社会自治组织:教育改革的咨询机构

事关所有受教育者、家庭、地方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教育改革,能不能由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说了算?虽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已经体现出从个人决策到组织决策的转变,但任何教育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托克维尔主张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思路必须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这意味着,培育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形成具有话语权的社会自治组织非常重要。在现阶段,教育改革的咨询机构可以包括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基金会三大类。其中,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发挥的是民间智库的作用,基金会发挥的是民间银行的功能。

(1) 学术团体

在民间社会自治组织中,面广量大且相对不受限制的是各种学术团体。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学术团体都是以从事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为目的的组织,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

而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协调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实体。最早的学术团体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以及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近代以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学术团体,如中华教育会、中国教育学会等。当下,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学术团体更是多如牛毛,专业分化越来越细致,这些学术团体既可能是围绕教育问题而展开,也可能是与教育相邻或相近的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学科多样性、人员构成的专业性,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智慧基础,也为政府决策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来自民间的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咨询建议。不少对教育改革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也依托学术团体建言献策,在发声困难的情况下,学术团体的团队力量也会成为专家发声的重要依托。

(2) 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是指介于政府、个人之间,并为双方提供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和中介性特点。作为政府与个体之间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以组织化、群体化的形式,把个体力量凝聚起来,有组织地抵制那些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规则,促进由个人抗衡权力向团体制衡权力的转向,有效地制约并保障着公权力的良性运作。

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发挥团体制衡效应,关键在于行业协会能够通过组织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为公民提供一种特殊的、有效的政治生活的表达途径,为对抗国家非正当干预提供一个缓冲地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业协会可以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去影响公共决策,反映民主呼声和监督制约国家公权力。

我国当下社会生活中,行业协会数量相对于学术团体而言总量并不饱和,国家对行业协会的限制要远远高于学术团体。目前,在教育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包括中国教育行业协会、中国教育协会、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国职业教育协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中国教育家协会、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等,这些行业协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民间的民主参与提供了组织保障。因此,托克维尔认为,行业协会是抗衡政权机构的“堤坝”和监督权力的社会的独立之眼。

(3) 基金会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基金会不同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基金会的基本特征。

全球范围内第一批基金会诞生在美国,比较有名的有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1981年,我国第一家基金会成立,最初大多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我国基金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注册了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譬如,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陶行知教育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等。

相比国际上的基金会,我国境内的基金会不仅数量少,而且较少具有慈善捐赠色彩。但现存数量有限的国内基金会和影响较大的国际基金会,譬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支撑作用,是中国政府在下一步要鼓励发展的方向。

3. 非政府组织与第三方:教育改革的监督机构

改革不仅需要决策机构、咨询机构,更需要监督与问责机构。在我国过去的各项改革中,通常是政策出台多,执行效果少,表现出明显的悖论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缘于政府自身机构设置的不足、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一方面缘于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育不良、参政途径的稀少。在教育改革中,要充分调动起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非政府组织与第三方,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监督功能。

(1) 非政府组织

所谓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从约定俗成的意义来看,非政府组织并不包括企业等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不包括家庭等亲缘性的社会组织,也不包括政党、教会等政治性、宗教性的社会组织。而且,相对于企业、家庭、政党和教会等社会组织来说,非政府组织往往更具有公共性、民主性、开放性和社会价值导向的特点。

在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

志愿性的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面向特定任务,由兴趣相同的人们推动,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国际协议等。

可见,非政府组织是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一般性社会组织的,其自身所具有的既来自民间,又独立于政权的双重属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合法监督功能的实现。

(2) 第三方

从内涵的意义来看,第三方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中立机构。在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中,发挥功能的第三方大多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从政府机构中裂变而来,一种是从民间组织中转型而来,无论其来自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第三方的核心属性便是其中间人身份,它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

我国当下生活中的评估机构多来自政府内部,其利益独立性几乎不存在,它们往往代表政府来对政府进行评估,无法超越其政府一员的身份限制。第三方评估与监督机构的诞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监督问责效果的透明化。

(二) 组织保障的运作

有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还得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否则,再完善的组织架构也只是架构,不能发挥其支持功能。根据成功教育改革的经验,强化伙伴关系,形成工作联盟;倡导集体决策,凝聚广泛民意;支持自主运作,实行弹性管理,是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组织机构良好运行的关键机制。

1. 强化伙伴关系,形成工作联盟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行政学理论家卢瑟等人认为,政府的相关工作应该作为一个单元来完成,所有的机构应该合并成一些更大的部门,^[3]以克服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4]的治理局限。不仅政府内部的治理要走向大部制或整体政府,公共治理,尤其是教育改革,也要逐渐打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边界,开展跨边界的组织联合,通过文化、动机与目标的整合,在教育改革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之间形成工作联盟和伙伴关系。

之所以称决策机构、咨询机构与监督机构之

间的关系为工作联盟，其核心在于任务导向。即去除不同机构之间的价值差别、特性差别、成员差别，形成任务导向、功能耦合的工作机制。在不断的工作磨合中，性质不同的机构之间会逐渐生发出具有一定情感色彩、互赖互生的伙伴关系。

2. 倡导集体决策，凝聚广泛民意

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与监督机构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这可相应保障各治理主体充分地参与改革进程，真正转变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下的政府一言堂状态。在当下的政府决策中，从个人决策到组织决策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但公共治理中多元主体集体决策的工作机制与制度机制尚未形成，迫切需要在工作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协商共治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扩大各种决策的民意基础。

如何才能在工作联盟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决策的各项制度？可借鉴的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教育改革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让各学术团体、各民间协会、各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途径参与决策，形成民间改革方案与官方改革方案的竞争状态；第二，建立社会听证制度，将要付诸实践的改革方案进行公开论证，让更多的普通大众有发声的机会与通道；第三，建立纵横改革全程的集体协调制度，保证改革方案的重大调整都能反映民众意愿、代表集体民智，使改革决策成为超越个人和纯粹公权力的一项活动。

3. 支持自主运作，实行弹性管理

在伙伴式的工作联盟中，学术团体、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与第三方并不是与政府捆绑式地运行，而是各个组织机构基于自身的专业特点、分工方向自主运行。政府致力于联合其他民间机构开展科学决策，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改革的全程中发挥参与、咨询、评估、监督的作用，每一方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组织优势。

在各个组织机构进行自主运作过程中，系统能够选择的只有弹性管理，充分尊重各个组织机构自身的运作特点，像社会第三方一样在不同的组织机构之间穿针引线，建立一种开放、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激发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纵向沟通与横向协调，利用行业内规则加强组织内自律自治，实现多元利益的冲突与整合。

与政府治理的刚性规则不同，社会组织内部

与社会组织之间，基本上基于一种通过谈判、协商、妥协等方式形成的组织内秩序，即一种自生自发的自律秩序，一种相对于政府法治而言的“私序”。这种私序看起来没有约束力，但实际上可以约束组织成员的非理性集体行动，促进利益和权利诉求的理性和程序化，达到弹性管理的目的。

二、社会支持系统的制度保障

有了组织保障还不能保证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运作良好，还需要有制度保障和平台保障。从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来看，组织是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组织是制度约束的函数，制度是在组织相互作用中逐渐演进的。具有最大化行为的组织，既可以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实现其目标，也可以通过改变其现有制度约束来实现其目标。

(一) 制度类型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5]为保障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良好运作，建构一个有生命力的制度磁场是必需的行动。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制度是指稳定重复的、有意义的符号或行为规范。^[1]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认为制度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这些制度的执行机制。

1. 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组织保障类型中，包括常规化的正式制度和有待创生的正式制度。

(1) 常规化的正式制度

所谓常规化的正式制度，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为了保障社会的运行，已经确定的各种正式制度。譬如，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投入制度、考核制度、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等。当教育在进行某些内容的改革时，与教育改革相关的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也必须同时进

行配套的改革,譬如,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需要同时配套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人口制度改革、经费投入制度改革、管理制度改革等。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妄图只进行局部的改革而不进行全局性的系统设计、配套改革,教育改革永远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有待创生的正式制度

在教育改革中,制度的障碍是多重的。为了克服显见的制度障碍,就必须对既存的制度进行改革,以生成支持教育改革的良好制度环境。我国当下的政府正致力于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与此相配套,一些新的有助于教育改革顺利推进的制度必须不断地在改革中创生出来,譬如,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范围内政府间关于教育改革的会商制度,行业间关于教育改革的会商制度,政府部门间关于教育改革的联席会议制度,教育改革方案的社会征求意见制度,教育改革的社会听证制度,政府、企业、学校间关于教育改革的协商对话制度,教育改革问责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改革的多元主体、多中心治理、利益的多中心协同、权力的制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为,制度是行动的支撑,没有制度,就无法实现期待的行为转变,也就无法期望教育改革的成功。

2.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价值信念包括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推动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好的教育改革,如何通过改造教育来改造社会等;教育改革中的伦理规范形式多样,包括人的规范,如作为学生、作为教师、作为家长的伦理规范。另外,还包括作为关系的伦理规范,譬如,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教育与行政关系、改革与发展关系等;教育改革中的风俗习惯从古至今约定俗成的东西太多,譬如师教生学、师尊生卑、教室礼仪、服装规范等;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更是挥之不去,如影随形。

相比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人、对组织、对行为的约束更是隐性的、持久的、内在的,它更具韧性,有时也比正式制度更具激励效应。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如何

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作用是一个需要不断加强的研究课题。

(二) 制度运作

时代强于制度,制度强于个人。如何在时代和制度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既是时代的难题,也是制度的尴尬。这意味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即便拥有了一系列与时代、与个人相契合的制度系统,倘若制度只是文本,不能从文本变成现实,变成有效的激励约束,那么,制度建设永远只是画饼充饥式的想象。因此,务实的制度建设依托于两个方面:一是建设制度,二是执行制度。实际上,制度的实施与运作就是诺斯指出的制度类型中的第三类,即制度实施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实施机制:

1. 制度的效力依托于执行力

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是通过其执行力实现的。执行力使制度从文本层面升华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身边不停发生作用的无形锁链,约束、指引着人们的行动。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须有其执行力,正式制度的执行力由国家、法庭、军队来保障,非正式制度的执行力由社会舆论、意识形态来保障。

如果一项制度只有静态的规则条文、动态的规则执行,缺乏强制的规则问责,那么,制度的强制性、震慑性仍然无法生发出效力。正是执行力将规则条文由静态转变为了动态,赋予了其能动性,使其在执行中得以实现其约束作用,证明了自己的规范、调节能力,从而成为了具有强制力的制度。

2. 制度的组合结构与变通逻辑

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制度保障是由一系列多元制度集群而成的,制度与制度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结结构与组合方式。不同的组合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生态,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效应。在教育改革中,要针对改革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制度组合结构,达到不同的改革目标。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教育改革,制度间的组合结构是趋向于整合,而非趋向于分裂。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有机整合、相互支撑、互为因果,可以保障改革全程的顺利进行,倘若制度与制度之间出现冲突、抵消、角力现象,改革一定也会遭受损失。

制度与制度的组合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改革的进行,制约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发挥,因此,围绕改革目标的制度变通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变通的一种方式是有选择地改变各类制度的比重及组合结构,从而改变制度安排的总体特性。有时,则是通过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来调整制度结构以实现制度变通的目的,如我国中小学的校办企业和各种收费,私立学校的兴办等。^[7]

3. 创生制度嵌入与克服路径依赖

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的约束性。制度的合理性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譬如,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比较适应于静态社会,当社会越来越具流动性时,户籍制度就成为各种教育改革的绊脚石。制度又是一种嵌入性存在,它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中。教育改革社会支持系统的各类保障制度不能脱离当下的宏观体制、微观制度,也不能脱离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因此,教育改革必须成为嵌入社会的改革。当教育改革不能很好地嵌入社会改革时,必须创生条件,促使教育改革成为嵌入社会的改革。譬如,当单纯改革户籍制度无法满足教育均衡化的需要时,必须同时进行整个社会二元制度的改革,如城乡一统、区域一统、校际一统、体制一统等。

让教育改革成为嵌入社会的教育改革不容易,任何制度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习惯于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的方向前进。而且,一种制度的形成过程,总会伴生着与现存体制相契合的利益集团的生成过程。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已经获得的制度收益,因此,一旦改革力图展开,便会遭遇众多压力集团的反抗,最终不得不形成妥协、变形的新制度。

要想打破现有制度中的各种伴生利益集团,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通常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主要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主要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1]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的命令和法律引起和实现的。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且其有效性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譬如,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

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

三、社会支持系统的平台保障

所谓平台保障,特指为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的进行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譬如,技术手段、业务平台和信息平台等。

(一) 平台类型

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支撑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良好运作的平台类型至少应该包括官方平台与民间平台两大类。官方平台具有政府性、公益性、免费性,更适应于公共管理;民间平台基于市场营利,由私人资本投资运作,具有灵活性、自主性、逐利性。但无论官方平台还是民间平台,其提供的具体平台类型大体包括三种:技术平台、业务平台、信息平台。

1. 技术平台

技术平台是一套完整的、严密的服务于研制应用软件产品的相关文件或工具。真正的技术平台应该是选择合适的技术体系、技术架构,指导并规范应用软件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各阶段工作,提炼用户真正需求,提高代码正确性、可读性的软件工具。优秀的技术平台还包括一套高效的底层通用的代码,甚至还包括代码生成器、代码安全漏洞检查工具等。

技术平台的设计与开发是保障教育改革各项措施真正能够落实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各类课程改革、教育信息技术改革、终身教育改革等。目前,官方较有影响的技术平台包括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技术服务平台,其主要提供开展教育信息化、电子政务、数据统计、安全保障、技术培训、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质量核查等各项工作的技术。

民间较有影响力的技术平台很多,譬如“融创天下”利用自身强大的技术优势,提供信息化教学、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等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视频服务应用平台,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结合起来,集教学、管理、学习、娱乐、交流于一体。

以视频服务应用平台为例,其中涉及录播技术、大规模跨平台互动技术、跨平台直播技术、跨平台点播技术,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惠

及校园,还可以辐射周边地区、偏远山区,通过网络与教育云平台对接,实现互联网上支持下的教育革命。

2. 业务平台

业务平台是开展各项教育改革,实现改革目标所依托的环境和条件。这些业务平台多以官方的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政府区域间教育联盟、大学联盟、民间的各种教育联盟形式出现。其中,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中除了地方政府成立的各种协同中心外,最著名的当属于“2011 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是继“985 工程”“211 工程”之后,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2011 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协同创新中心分为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和面向区域发展四种类型。譬如,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等校牵头的首批 14 家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2013 年通过认定,成为首批“2011 计划”建设高校。

政府间教育联盟最典型的是长三角教育联盟,由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教育部门发起,通过开展长三角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长三角博士生论坛、长三角暑期学校等合作项目,推进三省市间的教育合作。譬如,学位论文抽检互检、研究生访学互访制度,联合举办论坛、联合招考研究生等新模式。为了更好地运作长三角教育联盟,还成立了三省市协调小组办公室、三省市联席会议制度。

官方背景的大学联盟数量相当多,如最著名的九校联盟、卓越大学联盟等。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2009 年 10 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九所高校。其形式类似于美国常春藤联盟、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澳大利亚八校集团等,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加强合作与交流,优势互补。联盟成立后开展了多项实质性活动,如互派交换生、召开研讨会、开展暑期夏令营等;卓越大学联盟也是由九所大学组成的高校联盟,其成员包括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等。卓越大学联盟还签署了《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本着“追求卓越、协同创新”的原则,既联合开展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也重点推动高校间本科生“国内游学”机制的深入落实。

除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政府联盟、大学联盟外,民间社会组建的旨在开展各种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联盟也数不胜数。譬如,长三角教师联盟、长三角人才市场联盟、长三角家庭教育联盟、中国家长联盟、中国教师联盟、中小学教育联盟网、中教联盟网等。这些教育联盟都是草根式的组织,它由教育领域中工作性质、兴趣爱好及理想信念相似的一批人通过共同接受并遵守的行为规则组成学术共同体。这些教育联盟通常拥有多样性的资源,具备坚实的凝聚力,在联盟成员之间实施扁平化的管理。

3. 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是教育改革过程中信息发布、信息获取、数据挖掘的重要渠道。当下改革中,信息平台多以电子信息平台的形式呈现,如网站、数据库、电子期刊等。譬如,由教育部主办,由中央电化教育馆运行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就是这样的电子平台。在倡导电子政务的今天,各地政府都拥有自己的官方信息平台,如官网、官微、官信等。除了官方信息平台外,民间信息平台也是多如牛毛。譬如,中国学前教育联盟网,更多提供的是幼儿园一站式服务与采购平台,服务于商业目的,而不是教育目的。

信息平台除了电子的外,还有纸质的,如各类报纸、橱窗、宣传栏、公告栏、广告等。以报纸为例,服务于教育改革的报纸至少可分为两类:主流媒体、都市媒体、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以官方党报、日报为主,譬如《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都市媒体以各个城市的晚报为主,譬如《现代快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

在正规的、组织化的官网、电子政务平台和纸质媒体之外,信息平台中还活跃着颇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譬如 QQ、微信、飞信、博客、论坛、维基、播客、视频博客、职业社交网站、企业社交网站和其他工具等。这些散在的社会舆论更容易成为凝聚改革共识、制造改革舆论、问责改革效益的信息平台。

(二) 平台运作

要想使教育改革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依托平台很好地运作,精心的设计与策划、富有远见的平台建设与运行、强有力的管理与维护是重要的保证。

1. 平台设计与策划

平台的设计与策划是服务于一定的教育改革目的的,不同的教育改革需要不同的平台支撑,因此,在平台设计与规划时,要考虑其技术参数、业务流量、信息交互性。不仅如此,平台设计与策划时,还要综合分析前端用户行为和后端服务管理。从平台前端用户行为分析来看,数据挖掘,流程优化,具体用户量、交易量、等数据维度是必须考虑的综合因素;从平台后端服务管理来看,网络的稳定性、防黑客能力、自我纠错能力、客服跟踪等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 平台建设与运营

设计规划好的平台并不一定能很好运行,它还受制于现实的可能性,如技术参数、服务器的容量等。因此,平台建设主要包括两大工作:一是硬件设施的布局,二是组织架构的建立,譬如人员岗位的设置和管理体系等。

平台运营是指为了提升平台的服务质量,发展更多的用户并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从事的与平台经营、运作相关的工作。譬如平台相关活动的策划、营销、推广等。在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期间,我国政府专门建立了信息采集平台,了解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意见,更好地制定十年改革的方向、内容与路径。

3. 平台管理与维护

无论是技术平台、业务平台,还是信息平台,平台的良性运行都需要管理与维护。譬如,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如卓越大学联盟中的《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三省市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

培养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三省市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

除了一系列管理制度的建立外,平台的运营还需要团队的维护,譬如,定期检修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进行服务器升级和保养,定期网络安全检测,定期整理网络咨询、公众投诉反馈、内容更新等。在进行硬件设施维护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成员间沟通,如联盟间论坛、网络会议、互访、交流等,强化松散组织间的协作,以增进情感互信。

[参 考 文 献]

- [1]王海英.成功教育改革的系统设计、协同运行及效果评价[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2]吴康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6).
- [3]臧雷振.国外政府再造与我国“大部制”改革刍议[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3).
- [4]曾维和.当代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组织创新及方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 [5]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9(4).
- [6]马健生.试论教育改革中的制度变迁[J].教育科学,2003(3).

(责任编辑 师语)

“成人”教育与“德性”实践^{*}

——“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素养价值探究

葛 敏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素养提升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创新举措,“网络虚拟领导”不仅要有“果敢”、“擅导”、“合理”的处事风格,更要达到“化解新矛盾”、“传递正能量”、“产生好效果”的工作成效。这其中“人”是关键因素,“成人”是价值追求,职业素养养成是“成人”教育对人的道德教育的“德性”实践的体现。“网络虚拟领导”需具备政治素养、德性素养、知识素养、行为素养和信息素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职业素养理应更趋大众化、生活化、智能化、团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关键词] 网络虚拟领导; 职业素养; 高校; 学生党员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09-05

一、职业素养之于“成人”教育价值影响

职业素养养成和“成人”教育的交集包括人的品德教育,这属于道德教育范畴。同样,职业素养蕴含道德素养,“成人”教育蕴含道德教育,“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去做成一个人’的根本生存方式问题,而不是具体行为规范问题。道德、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是在引导我们以人的存在方式去生活。”^[1]因此,良好的职业素养养成是“成人”教育对人的道德教育的“德性”实践体现。

(一) 成就自己: 职业素养对自我成长的教育价值

职业素养是人的社会属性范畴,但又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是从业人员的职业认知、职业技能、职业心理、职业情感、职业拓展等素质

的统称。人是一种崇高的生命价值存在,职业素养是人的内在素养经过后期教育培养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P.461)}从而揭示了人的(自然)生命高贵属性决定人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同时良好的职业素养又能反映人的(自然)生命崇高精神价值。那么,“网络虚拟领导”的良好职业素养对自我成长的教育价值体现在:

1. 物质丰富。“成人”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生活实践回归,既不“物”化,也不“神”化,而是“人”化,使人更成为人的价值本原。“生活”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的存在称之为“生存”,是自然现象,人的“生活”是社会存在方式,离开“生活”就不能称之为“人”。而人的生活实践离不开物质的创造和积累,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和物质的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学生党员在‘网络虚拟领导’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2DJD009),江苏省教育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高校立德树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5JYD J-YB0019),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高校学生党员在‘网络虚拟领导’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GJS-XKT1201)。

[收稿日期] 2015-06-11

[作者简介] 葛 敏,男,江苏灌云人,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系认识表明：“实践具有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物质性是指：首先，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其次，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性活动，体现自觉能动性；最后，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具有社会历史性。”^{[3](P.1)}人的职业素养通过物质实践方式来实现，包括专业技能、物质财富、历史价值等，为自己创造了丰厚的条件，从而实现“物质”的极大满足。

2. 精神升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生命的双重性，人的自然属性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属性，动物的自然属性里没有“精神”的概念。人通过社会属性的物质实践来实现自然属性的精神升华，人生命的双重性决定了：“道德既是一种调节社会关系的特殊手段，同时，道德又是人实现自身统一、精神完善的一种特殊方式，使人不断形成、完善德性，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4]道德作为人的一种意识和精神存在，属于超生命的生命。“道德不仅基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具有世俗性，而且更具有超越世俗的高尚性，它是生命的自我完善，是生命的至高境界。”^[5]简而言之，人的职业素养的提升反映人在复杂社会关系中地位的提升，包含“德性完善”的社会评价和“生命价值提升”的自我评价，最终形成人生命的精神升华。

3. 价值提升。人生命的自然属性本无价值高低之分，但人的社会属性反映人的价值差异。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6](P46)}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存在”，“存在”本身无价值意义，但人追求生命的意义是人所固有的，人生命通过社会属性的“生存”表现出追求意义的向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是从生命意义的不同向度去诠释生命价值意义，人的职业素养的提升亦即体现为人生命的价值提升。

（二）教育他人：职业素养对他人的教育价值影响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教育”解释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教育在增进学习者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可以影响其思想品德，教育目标的达成依靠教育者的示范作用。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

特·班杜拉认为，“示范作用是指人类个体接受某一榜样（model）的影响并占有其特征的过程。就行为而言，它是指个体通过观察别的社会个体的行为表现而获得这一行为技能的过程，其中被观察个体构成观察个体的行为榜样。”班杜拉把行为技能的这种获得过程称为观察学习。^{[7](P.86)}教育的示范作用决定了教育具有主动施教和被动模仿的特质。

1. 能力影响。心理学将能力依照不同标准划分为三对：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再造能力和创造能力、认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如果从程度高低的角度可以将能力划分为简单能力和复杂能力。教育的影响过程，示范作用功不可没，无论何种能力影响，都是由示范作用的影响程度决定的。随着示范作用的影响逐渐深入，学习者的能力由简单能力向复杂能力发展。

2. 形象影响。人的潜意识影响人的模仿和认同，这是由人的欲望本身决定的，外部环境的持续影响使人的潜意识演变为人的意识，并形成人对良好形象的认同机制。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8](P.141)}可见，形象影响是人的模仿行为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经历“认同一模仿—再认同一再模仿”的无止境形象模仿塑造过程。

3. 经验影响。经验来源于实践的判断、想象和洞察能力，经验是一种学习、模仿和被影响的过程。英国心理学家洛克说，“人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9](P.68)}经验可以分为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人可以通过成功经验让自己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快速、高效的进步；通过失败经验可以让自己少走弯路，作出合理的选择。

二、“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素养内涵

“网络虚拟领导”的工作包含“教育与自我教育”、“服务与约束”、“舆情研判与疏导”、“隐形身份与显性作用”等特性及动机。他们所面对的情形复杂多变，所打交道的“网民”更是“口味各异”，工作要求上要“化解矛盾”、“传递正能量”、“产生好效果”，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涵养方能驾驭“信息方舟”。

1. 政治素养。政治素养决定了对“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政治路线的执行情况，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的基础和前提。”^[10]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网络虚拟领导”应该具备的政治素养，“网络虚拟领导”应该旗帜鲜明，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追随者和倡导者；其次是听党话、有信仰、讲奉献、重锤炼的新时期学生党员、骨干；最后是具备政治敏感性、敏锐洞察力、精准鉴别力的党的后备军。

2. 德性素养。古语云：德者，国之基也；德者，人之性也；德者，智之帅也。可以看出德性素养是做人、为官、治国的首要素质，是道德认知、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结合。德性是人性的核心价值，是人性本质力量的综合体现，德性也是德行的先决条件。“网络虚拟领导”德性素养是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在网络行为中注重德性修炼，施以道德行为，不断提升德性素养的职业涵养。“网络虚拟领导”所表现出的忠诚、诚信、责任、勇敢、无私、公正、仁爱、谦虚、友善等都属于德性素养范畴。

3. 知识素养。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美诺篇》）中论及美德与知识的逻辑关系时，虽没有完全弄清知识是否完全等同于美德，但知识是美德的来源是毫无争议的。“网络虚拟领导”只有在知识素养（伦理知识、理论知识、政策知识、心理知识、新闻知识）上更胜一筹，才可能在网络行为中发挥更多向善的可能。同时，“伦理——认识平行论”的哲学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做了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无知。那么，“网络虚拟领导”的知识素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不道德的网络行为产生，也可以理解为知识素养的提升有效避免网络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4. 行为素养。在人的思想品德的知、情、意、行四要素中，行是目的，是其他要素的外在表现，也是检验人的思想品德是否知行合一的关键指标。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指出，“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是指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它们是行为的实际决定因子，它们包括需求变量和认知变量。需求变量本质上就是动机，认知变量就是能力。”^[11]“网络虚拟领导”的网络行为关乎校园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心理调适、情绪宣泄、学习、交流与沟通等行为素养的修炼，关乎网络舆论导向的良性发展。

5. 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国家当前对建立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必备素质需求。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12]。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选材标准，“网络虚拟领导”的信息素养必须具备传递正能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网络舆情传播和处置能力，必须具备扎实的信息文化素养、信息意识素养和信息技能素养。

三、“网络虚拟领导”职业素养的未来走向

当前，国家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信息化决定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将建设网络强国与“两个一百年”（建党、建国）的奋斗目标比肩部署。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因素是“人”，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我国需要培养一批具有领先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和卓越创新团队。从人才作用发挥角度，他们必须具备把握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社会发展规律、引领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社会潮流的职业素养。

（一）未来信息社会展望

没有人能准确地描绘信息化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具体影响，但是信息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信息化必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影响人类社会的教育、生活、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形成未来信息社会的新概念——泛在信息社会，这“是建立在智能网络、先进的计算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之上而形成的技术社会形态”^[13]。在穷尽未来信息社会的版图资料时，发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原则宣言》对未来信息社会作的展望描述更具指导性参考价值，可以归纳为信息技术的“泛在”、“平等”和“共享”。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科学世界图景，在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将会属于信息和信息过程”^[14]。比如：生物信息科学技术、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等。

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的发展除了使得信息来源多样化之外，还可以提供一整套比过去更为强有力的欺骗工具。”^{[15]（P.93）}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只是欢乐和机遇，也可能是灾难和挑战。信息技

术的发达是一把“双刃剑”，从信息技术打诞生乃至未来都是如此，信息技术发展史的一条经验是信息技术的高端技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是一件危险的事，人数越少危险程度越大。但让所有人掌握信息技术的高端技术是绝无可能的事，欲使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危险系数大为降低的前提是我们能否拥有一支信息技术的制衡力量。

（二）“网络虚拟领导”职业素养的未来特征

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尽快提升信息技术更新频率，这就要求“网络虚拟领导”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快符合未来信息时代特征的职业素养修炼，成为主宰未来信息时代，有利于社会发展稳定的制衡力量。

1. 大众化。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民众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角色已不再单纯以网络行为为主体，网民也不再是单纯的含有“对立”意味的工作对象，可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网络虚拟领导”的职业素养需要有“大众化”元素，培养大众意识和大众视野，体察社会公众诉求、深入社会公众生活、满足社会公众体验。

2. 生活化。未来信息技术的发达和传播与生活息息相关，“网络虚拟领导”应是充满生活情趣的，其职业素养的修炼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说，都阐明了生活实践的积极作用，生活的健康的人才会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生活的智慧可以使人充满活力。

3. 智能化。泛在信息影响无处不在，“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人们一直在寻求更有效率、不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消息、通知形式。……人们急需一种更细微、更智能的通知体验，来改善多设备造成的‘通知爆炸’现象；而最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则是基于上下文联想的数据分析形式。”^[16]这一困扰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妥善解决，终端智能和信息推送智能成为信息共享的流行趋势。人们处理信息的终端不再是特制产物，不再有终端“私有”的概念，而可能是佩戴的眼镜、手表、纽扣，亦或商场、书店的阅览终端，甚至是路边的电子显示屏，通过秘密或指纹、人脸识别等实现信息“私有”。

4. 团队化。未来信息社会的分工是越来越精细化，网民的信息舆论来源更加广泛，产生的舆论影响变幻莫测，信息的接受、甄别、分析、处理、反馈决定了个体无法做到时效性和精准性的兼顾。“网络虚拟领导”的工作任务需要更多的协同者，可以是志同道合的“盟友”，也可以是因某个问题的需要临时组建的“团队”，团队化的协同工作不仅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创新，使“网络虚拟领导”的角色更加专业化，还有利于提升团队成员的归属感，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5. 国际化。信息技术的发达，模糊了国家的界限，世界也是“平”的。网络舆情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异国他乡的“图谋者”。“网络虚拟领导”的工作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虚拟社会，那时的网络舆情危机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内发生的网络舆情最先可能从国外发酵，但操纵者可能是国内网民；另一种是点燃国内网络舆情危机的操纵者可能身在国外。“网络虚拟领导”的全球化的视野、意识、观念、技术将成为必备素养。

6. 多元化。我国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决定了未来社会必然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的多元化社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未来信息社会的创新、创造将成为社会发展主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往往从人的生理需求开始。但随着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需求多元必然出现，“网络虚拟领导”职业素养应包括社会舆论、利益、生活、创新、决策、制度、价值观、组织、思想与政治理念的多元化。

[参 考 文 献]

- [1] 鲁洁. 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引导生活的建构[J]. 教育研究, 2010(6).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 [3] 陈燕, 高树群.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
- [4] 吕前昌. 悖离与重建：走向生命关怀的道德教[J]. 理论月刊, 2010(7).
- [5] 冯建军. 走向道德的生命教育[J]. 教育研究, 2014(6).
- [6] [美] A. J. 赫舍尔. 人是谁[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7] 高申春. 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下转第 89 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周 璐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 山东潍坊 262500)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财富和教育资源。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虽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但始终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高校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精华, 唤醒大学生道德成长的内在自觉, 在教与学的和谐以及大学生自身心灵的和谐中完成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和人文素质的提升。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 人文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 G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13-04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青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石,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能够培养大学生优良道德品质,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培养其文化自信、自觉、自强意识, 使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作用, 应成为高校深入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含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 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 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已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 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 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 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传承性; 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

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对我们的思维与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大学生, 为我们创新和传承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修养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人文素质, 是指人应具备的内在品质, 包括学识上的积累、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即关于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人文精神以及个人能力, 也包括人的理智、能力、情感和意志等内在因素。它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 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美好境界, 是完美人格的体现。

人文素质培养, 是指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 转化为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价值观、人生观等的过程, 是引导人们求善、求真、求美的精神教育过程。人文素质的培养强调人的知识、情感和意识等全面健康地发展, 并为人的生存竞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应引导大学生完善人格修养, 科学正确地理解世界、理解动态发展的时代与社会、理解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关心国家命运, 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坚定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

[收稿日期] 2015-05-15

[作者简介] 周 璐, 女, 满族, 山东青州人,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助教。

高校应通过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深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大学生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理论思想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二、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任何一种现代文明,都必须从传统中吸取营养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为大学生人格塑造和价值理想的确立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引导大学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1. 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勤政爱民和举用贤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意识,“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等,都为现代人提供了智慧和启迪。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倡导见利思义、胸怀天下、报同忘身、自强不息、谦恭礼让、宽以待人、和而不同,这对大学生修身养性,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和谐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处理好人际关系均具有积极影响。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弃的精神家园,也为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培养人文精神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

2. 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在世界多极化、国内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形势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思想观念日益活跃。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奠定重要基础,对于引导大学生增强民

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目标,这体现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思想哲学及做人的根本经久不变,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考的积累是当代大学生最好的人生指南,辩证地吸取和借鉴,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 有助于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个人修养的“好教材”。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助于大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和更好地做人、做事、做学问提供广博的文化基础和人文底蕴。坚持“知行统一”原则,加强大学生的道德实践环节,使其达到在实践中认知、在实践中养成的目的。倡导注重人格和人生价值、道德和伦理的内涵,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人生价值;“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勿以恶小而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律己观念;“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舍生取义”、“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准则等等。把这些数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作为大学生必修的内容,无疑对大学生塑造完善的人格,养成良好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具有积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崇德弘毅、严于正己的修身功夫,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修养境界,“慎独”、“自省”的修养方法,更为大学生加强道德和人文修养,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途径

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年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作用,高校应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结合专题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途径,拓宽和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确保教学效果。建立健全传统文化教育机制和制度,加强对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1. 加强和完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确定学时设置学分,统一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拓宽选修课覆盖面。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全面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活动。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挖掘本学科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传授学科知识、培养能力、指导方法的同时,渗透中华文明成果、传统美德教育。在大学语文、思想政治等学科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引导及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与相关院系(部)成立课题组,对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进行总体研究和规划,开展相应的教学与研究活动。采用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典阅读与讨论结合等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3]加强教材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突出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精髓,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和吸引力,结合实际开发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教材。发挥高校内部相关研究机构的作用,加强历史文化研究,组织大学生研习传统文化,形成师生共建的研究成果。

2. 培养建设一支有水平、有素养的教师队伍

优秀的教师能够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征服学生,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要采取措施、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力度,特别是对现任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辅导员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培训,提升教师教育能力。^[4]教师应严以律己,修身立德,躬行实践,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探索,教学相长,不断提高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掌握和驾驭水平。

3. 开展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

应深化校园文化建设,有效构建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应以宣传教育活动为载体,营造传统文化教育的氛围,可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主题活动,邀请传统文化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进校园、进课堂。还可丰富第二课堂内容,正确引导大学生主动接触、了解、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充分利用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结合校史挖掘、文化传承和优秀校友名录的研究整理,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5]依托共青团、学生党支部、学生社团等,开展理论研讨、系列讲座、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艺体育、主题教育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校园精神文化氛围。利用广播、宣传栏、校报、展板、手机等媒介进行传统文化、思想的宣传,通过各种节日、纪念日进行主题教育,通过观看录像片、主题班会、读书活动、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更多地了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参观、调查、访问等形式,使大学生行为得到检验,思想得到升华。

4. 搭建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平台

充分利用现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共享资源,开展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工作。加强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在校园网站开设传统文化教育专栏、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等,拓宽适合大学生学习特点的线上教育平台。组织相关教师开发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视频课程,选取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诗文,开发建设“中华经典资源库”,为大学生进行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在线学习提供条件。

5. 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遵循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规律,探寻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方法。发挥家庭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通过网络和手机平台,开办“家长学校”、“家长传统文化培训班”等,加强学校与家庭的配合与联系,提高父母对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认识,增加家教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家庭教育要突出“做人”的教育目标,将传统的人生哲理与价值体系融入到家庭环境中;在教育方法上突出“礼仪”与“身教”,教育子女学会待人接物。倡导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形成爱国守法、遵守公德、珍视亲情、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的良好家风。

好家风,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围。

学校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全体教职员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合力。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管理的全过程,并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列入教学大纲,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方式与方法改革,在继承传统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实现教育方法和手段的突破。教师要率先垂范,身教与言传结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坚持德育为先,德育与智育相结合,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诱导,寓教于乐。

营造重视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要加强理论宣传,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大学生时时处处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之中。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利用历史遗迹、博物馆、展览馆、公园等场所,因地制宜地建立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园,使其成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基地和生动教材。重视传统节日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创新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和礼俗,发挥它们在教育和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功能,为大学生营造感受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6.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考评机制

拓宽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渠道,构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效机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有效抓手,融入日常教学中,纳入高校量化管理体系,常抓不懈。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精神,加大校园文化建设的推进和考评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环境。建立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始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保障。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和力量支撑,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努力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S].教社科[2014]3号.
- [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7(2).
- [3]朱伟.大学生思想教育应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J].洛阳大学学报,1997(3).
- [4]马菊霞.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J].价值工程,2010(34).
- [5]李国娟.对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教育探索,2014(12).

(责任编辑 晨晓)

中小学生公民技能培养的必要性及其实施路径^{*}

罗 嫣 才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与责任。在当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大背景下,关注公民技能培养至关重要。强化学校公民教育功能,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社会生活,学会提“小建议”,有序参与政府管理,让学生把所学的民主准则与公民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让学生在实践训练中体验民主生活的真谛,不断提升学生作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技能与责任感。

[关键词] 公民教育; 公民技能; 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 G40 - 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96(2015)08 - 0017 - 04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无疑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命题。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发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号召后,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再次响应、确认这一号召。学者檀传宝甚至认为“公民教育并非只有工具性的一

面,就目的和性质而言,公民的培育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1](P.183)}。然而,“我们现在搞的还不是公民教育,只是公民教育研究,没有社会化、没有实践化”^①。有研究表明,1997—2007年的10年间我国公民教育研究主要处于理论分析和比较借鉴阶段,理论研究多达75%,而实践层面的研究不足25%(见表1)。

表1 近10年来我国公民教育研究情况统计^[2]

研究主题	理论研究	背景研究	历史研究	比较研究	实施研究	会议综述	其他
比例	32%	12%	10%	21%	20%	4%	1%

近年来,公民教育的研究虽有实践趋势,但“许多人对公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分歧,公民教育缺乏系统性思考……这就导致有极大局限性的公民教育内容、形式更多地集中在有关公民知识的传授和灌输上,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公民意识、批判能力、公民技能等公民品性的培育”^{[1](P.295)}。这样直接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产生“有公民知识而无公民技能的愚民;或是只抱怨社会问题,而不知行动的奴才;或者只用粗鲁的行为行破坏之事的

草莽”^[3]。因此,在实践层面加强公民技能的培养,促进关心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具有判断力,懂得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理性、非暴力、负责任地妥善解决涉及公共事务的公民技能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民技能培养的必要性

1. 公民技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指国家或社会根据

*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课题“小学班级公共生活的建构与公民品格培育”(项目编号:13YJA880074)。

[收稿日期] 2015-06-08

[作者简介] 罗嫣才,女,广东佛山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市教学研究室教研员。

①王东虓,袁正光,徐景安:《什么是公民教育?》,2009年5月30日下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社会发展的要求,培养其所属成员忠诚地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品质和能力,是一种指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管理、协调个人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教育,主要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与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的教育,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具备在公共事务方面理性、负责任、有效参与的有知识、有技能、有价值和理念的公民。

目前,我国与公民教育直接关联的国家课程有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的“思想品德”、高中的“思想政治”等。关于国家公民身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宪法和国家基本法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团结、国际组织等国际通行的公民教育内容,实际上已广泛存在于目前的德育课程之中。但这些都仅是“知”层面的学习,如何把“知”落实到“行”,参与民主社会的建设,成为实际意义的“公民”,需要公民参与,需要相关技能的学习与培育。

2. 公民技能是“积极做公民”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曾言:“何为政治?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政治是大家的事情,公民理应积极参与,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也有明确规定,其第二条指出:“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与责任。

责任与参与是公民教育的核心所在。知晓有何责任、懂得如何参与,是影响公共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掌握公民知识是前提,更要学会有效参与的技能,并以此为工具,积极投入到改良社会中来。因此,公民的意义是积极地“做公民”,而不是消极地“是公民”,没有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也就没有公民。公民能否积极参与、分享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反映了管理的民主与否,也体现了公民技能水平的高低,因此,努力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是“积极做公民”的必要条件。

3. 基础教育阶段是公民技能培养的黄金期

众所周知,一个人幼年时期形成的态度和价值观对成年以后的生活方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养成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关键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格罗斯

和德州大学教授丹尼逊提出的公民发展理论模式将儿童至成年人公民观念发展历程分成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分别是生物性公民阶段、家庭性公民阶段、形成性社会公民阶段、阶层性公民阶段、横向社会关系阶段、纵向社会关系阶段。其中,第三至第六阶段正好与基础教育的年龄大致相符,是从少年儿童期到青年期,个体逐步发展对他人负责的态度与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开始严肃地思考个人的价值观,透过自我检验从事自我反省,并逐步增强个人认同的过程。因此,基础教育阶段是中小学生公民技能培养与发展的黄金期,加强对中小学生公民技能的相应培育与训练,将对我国培养民主社会公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公民技能的涵义及其培养路径

通常而言,公民技能包括智力技能与参与技能两方面,它是指公民要培养查找、研究资料信息的技能,社会调查的技能,沟通、协商、仲裁、演讲、谈判的技能;养成对某一立场或观点的解释、分析、评价和辩护的能力;具备对过程和结果的监管能力;能够运用所了解的公民知识有效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能力。

不管是智力技能还是参与技能,它不是先天遗传下来的,也不会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而自然增长,它是需要在学校接受教育,更需要在参与民主社会管理中得以传承和习得。正如美国公民教育学者麦柯菲(Walter Mcphie)所言,公民教育要想成功,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内容:适当的课程(指学科课程),在班级与学校运作中的民主过程和民主参与模式,校内外可供学生实习民主行为与责任的机会。^[4]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与实践,要有效培养中小学生的公民技能可以采取以下两种途径。

1. 强化学校公民教育功能,突显相关学习方式中公民智力技能的培养

学校公民教育的使命就是进行公民知识的学习与参与技能的培养,让学生把所学的民主准则与公民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让学生在实践训练中体验民主生活的真谛,因此可通过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来实施。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公民教育的课程,如“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进行系统实施。课程的系统实施是掌握和了解公民知识的前提,但对学生公民智力技能的培育还需要加强对诸如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式学

习等学习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的技能、解释与分析的能力、评估与辩护的技能。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采用渗透的方式,在不同学科课程中进行公民知识的教学,如在社会课、历史课、地理课、语文课中进行。学校里所有的课除知识传授以外,也有培养学生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情操的责任。所以,公民教育不应只贯穿于课程中,还应贯穿于全校整个时间——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通过非正式课程推行公民教育是实施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从学校管理到班级管理,从校风建设到课外活动都可以渗透公民教育。如一些学校组织的“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国旗下讲话、社会服务等活动,也是有效提升学生公民技能的好方法。

2. 学会行动,参与社会及公共事务管理,突显公民参与技能的养成

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参与一个民主社会生活是整个学校的责任。如何让学生将学到的公民参与技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这需要一些途径来实施公民行为。

第一,关注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管理,学会提小建议

“到社会上去”是公民参与技能的行动准则。课堂上的一切活动,对学生来说仅是准备而已。^[3]尽管我们把思考做到尽可能融通其中,但是真正深刻的和有力的行动,必须到社会中去检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才是公民教育的真正课堂。南京市教育局举办的“小发明、小创造、小设计、小建议和小论文”的“五小”评比活动足以说明这一点。活动中,参与“小建议”项目评比的中小学生每年会对自己生活中存在的哪些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提出各种各样的小建议,其内容涉及南京如何实施垃圾分类,如何改进银行叫号系统节约纸张、提高环保意识,优化公共交通设置,提升地区文化和城市建设水平,改进科技产品等方面。这些建议或是学生的设想,或是一些好的倡议,或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学生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判断力,充分展示了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科学素养。面对问题,学生不是抱怨,不是发牢骚,不是冲动行事,而是在不断的调查中分析,在分析中加深了解,在了解中学会科学合理解决,这是一种理性的公民思维,是新时代

公民负责任的理性参与。

可见,“小建议”蕴含着大智慧。学生在关注生活的热点或难点中学会观察,学会用建言现有政策的主人公态度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学会提出适切、适宜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不仅是在参加一项评比活动,而且是在享有公民权利^①,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学会做公民,成为公民。学生今日之理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将可迁移,促使其未来提出合理、合法的提案,并为其不断改善、修正现有政策或者重新研究现有政策、改善政府行动、影响政府决策,不断推进我国民主社会的建设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学会理性地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自愿参与政治活动,在活动中依照程序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对政策表达自己观点和主张的行为。它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反映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4]中小学生是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主体力量,培养其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方法多种多样,近年来笔者所在城市主要是通过“公民法制教育实践活动项目”的推进,不断提升学生作为公民理性参与社会管理的技能与责任。

公民法制教育实践活动项目是在实践领域内引导学生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公民养成方案,每班学生(大约 20—30 人)在教师指导下,选取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严格遵循六步骤,开展为期半年或一年的研究。

步骤一:确认社区中存在的公共政策问题。学生在平常的生活中通过观察、收听广播或与他人交流中发现社区中存在的公共政策问题,并与家长、邻居、社区成员一起讨论,了解他们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所见所闻及想法,写下自己调查的结果,从而确定自己最想研究的课题。

步骤二:选择班级研究的问题,遵循民主的原则。全班共同讨论每位同学在社区中发现的问题,在共同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全班学生进行民主投票,选出班级共同研究的课题。

步骤三:收集班级所要研究问题的有关资料,彰显合作的魅力。确定研究课题后,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课题研究分工,并通过图书馆、报

① 我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社、教授与学者、律师或法官、社区组织和利益团体、省市区政府、地方政府的立法或法律制定机构的代表、管理机构、互联网等信息渠道收集信息。

步骤四：编制班级方案，汇聚众人的智慧。根据搜集而来的资料，全班同学分成四个小组：解释问题组、评价现有政策组、编制班级赞成的公共政策组、编制班级行动方案组，共同为该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出谋划策。

步骤五：报告方案（听证会），张扬个性风采。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法律人士或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代表做听证员，向他们报告所确认的公共问题在社区中的重要性，解释并评价现有政策的优缺点，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行动方案。

步骤六：反思学习经验，放眼社会的发展。听证会结束后，教师指导学生既从个人也要从班级成员的角度对整个公民教育活动过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并不断完善班级的研究方案，最终实现问题的解决。

整个研究过程科学、严谨、规范，它教会学生如何去开发解决社区问题的公共政策；学会如何行使权利去监督和影响社区政策的制定；同时也开发了学生促进理性调研、批评性思维、有效沟通和深思熟虑的智能和参与技能；开发学生行使基本权利和承担责任的民主素质。而这些正是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

一个个公民法制教育实践活动项目的课题，一次次的听证会，引领学生形成现代的公民思维方式，掌握和养成正确的参与技能，面对公共政策

问题，学生在不断的调查中分析，在分析中加深了解，在了解中学会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法制教育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成长的舞台，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国家意识，强化他们国家未来公民的意识，他们现在“展示的是未来的政治蓝图”。^①

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变教育部门的责任为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加强全社会公民教育，形成包括学生、家长、政府、社会媒体等在内的公民教育网络，在公民社会中过公民生活，才能共同谋求公民教育的最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檀传宝.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 [2]黄歲, 黄晓婷. 近十年公民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1).
- [3]赵亚夫. 如何理解和开展学校公民教育(一) [EB/OL]. <http://courses.teacher.com/DisplayInfo.aspx?ID=4093&subject=36&item=10,2015-10-18>.
- [4]杨勇, 杨秀玉.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1(11).
- [5]赵亚夫. 学会行动：社会科课程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6]赵志毅. 论公民教育中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 [Z]. 2010 年全国公民教育试验经验交流会材料.

(责任编辑 秋阳)

^① 出自 2006 年 6 月 14 日，原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周稽裴在南京市力学小学四(1)班在鼓楼区政府礼堂举行“关于垃圾车漏水问题研究”的听证会上的讲话。

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

金 奇

(扬州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美德既与知识密切相关, 又与资本紧密相联。美德即知识, 强调美德的知识底蕴与知识前提, 体现了善与真的统一, 美德应该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上, 由此, 教育是美德培育的合理路径; 而美德即资本, 强调资本的内涵因子包含美德, 强调资本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 从而强调美德的资本属性以及美德的价值与功能属性。美德资本的存在样态可以区分为个体、组织和社会的美德资本, 作为资本的美德, 既是工具性的, 同时又是价值本身。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合理路线图为: 教育—知识—美德—资本。

[关键词] 美德; 知识; 资本; 教育

[中图分类号] B82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96(2015)08 - 0021 - 04

美德既与知识密切相关, 又与资本紧密相联。美德即知识, 强调美德的知识底蕴与知识前提, 体现了善与真的统一, 美德应该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上; 而美德即资本, 强调资本的内涵因子包含美德, 强调资本不可或缺的道德构成要件, 从而强调美德的资本属性或美德的价值与功能属性。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合理路线图为: 教育—知识—美德—资本。

一、“美德即知识”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 对这一命题的解读可谓大相径庭,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理解, 这一命题通常生发出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 “美德”有哪些, 形成美德的有哪些“知识”? 美德是什么, 其具体内涵因子主要有哪些? 知识是什么知识, 包含哪些知识? 这是命题解读的起点。“美德”又译为“德性”, 希腊文为 arete, 英译为 virtue, 通常指人的一切优秀品质, 在苏格拉底那里, 美德的具体内涵因子主要包括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诚、节俭等。在苏格拉底看来, “智慧就是最大的善”, 因为“金子和银

子都不能使人较为好一些, 而有智慧的人的思想却能使人富有美德”。^{[1](P.55)} 而“那些有智慧的人是凭着他们的知识而成为有智慧的人的”^{[2](P.233)}。这样, 知识使人有智慧, 智慧就是最大的善, 就是最大的美德。那么, 这里提及的形成智慧与美德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哪些知识呢? 在苏格拉底那里, 知识较多地倾向于指“整个世界的理念知识, 善的知识, 自我的知识”^{[3](P.20)}, 而不是指自然的知识、技术的知识或数量的知识。

2. 美德与知识的关系。“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在思想史上开启了关于美德和知识关系的探讨,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 命题本身也部分揭示了美德与知识的关系。

其一, 知识是美德的前提, 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从最容易形成共识的意义上理解, 这一命题把美德与知识相联系, 认为知识是进行善恶判断、形成美德的基础, 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 所以苏格拉底说: “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 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将是对的。”^{[4](P.164)} 就是说, 任何美德都不可能真正离开知识的支撑而存

* [基金项目] 2015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项目编号:2015SJD744), 2015 年江苏省扬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立项课题“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2015 - 11)。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3

[作者简介] 金 奇, 男, 安徽肥西人, 扬州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在,任何善都离不开真,也即“没有无真的善”。这样,知识贯穿于美德之中,知识是美德的共性,知善而行善,善知将转化为美德。换言之,“善知”和“知善”均需要理性、需要智慧,理性和智慧皆仰仗知识,与知识形影不离,知识铸就理性、积淀智慧,循理性与智慧而行,美德乃成。从事实与经验来看,一个社会或地区的教育科学文化整体水平越高,则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整体道德认识水平和美德发展水平便愈高,即呈现出某种正相关。

其二,“美德即知识”体现了善与真的统一。知识与美德的关系表现为真与善的关系,也引申为事实与价值抑或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样,“善与真的统一,其表述即为‘美德即知识’”,这种表述“将人们的价值追求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即“通过不断地追问‘x是什么’,例如‘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美德是什么’‘善是什么’……,从而将人们对自身及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坚实的知识的基础上,向人们揭示一个实然状态,而这个实然状态同时也是其应然状态。”^[5]因此,“美德”与“知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善与真、价值与事实、规范和真理的统一。

其三,既维护知识在美德中的地位,又推动知善而行。美德即知识,并非知识等于美德,而是指美德蕴含知识前提,知识是形成美德的必要条件,但需要明确的是,知识不是形成美德的充分条件,有知而无德在现实中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问题不在于借“有知却无德”的悖论来否认“美德即知识”,而是侧重于强调并维护知识在美德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不止于知善,更要推动知善而行,将道德认知转化为美德品质。

3. 美德的可教性及其限度。既然知识贯穿于美德之中,那么知识的传播在总体上应该有利于美德的培育与提升,而知识是从教育中得来的,并非与生俱来,这样,“知识的可教性”为“美德的可教性”作了一定的理论铺垫,因此,苏格拉底同时认为美德是由教育而来,“如果美德具有这样一种本性(指‘美德即知识’),它就是由教育来的”^{[4](P.164)}。也就是说,“美德可教”是“美德即知识”的逻辑结论,或者说,教育是美德培育的合理路径,教育通过善的知识的传授使人们具有足够的智慧明善知恶,避恶趋善,以体现和趋近人的本性。但知善而行善,才能将道德转化为美德,事实中知善而不为、知善而行恶也从反面清楚地表明,教育在美德形成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和受限的。从

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来看,认识是实践行动的先导,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善知只有通过实践行动才能转化为美德。

二、美德即资本

“美德即知识”表明了美德的本真性或真理属性,而真理往往又是价值的载体,提出“美德即资本”的命题正是要突出美德的资本属性或价值属性。

1. 基本意蕴。西松曾认为:“从广义上说,一切财富——无论其满足人类的何种需求和欲望——的性质均为资本。”^{[6](P.27)}在这层意义上理解,诸如实物、货币、文化、道德等都是资本。在国内,王小锡最早提出了“道德资本”的概念,并指出:“所谓道德资本,从内涵上,它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从外延上,它既包括一切有明文规定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制度条例,又包括一切无明文规定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民风民俗等等。”^{[7](P.6)}这一表述对道德的工具属性、工具功能作了清晰而完整的诠释,即明确地指出了美德的资本属性。以资本的视角来审视道德,“张扬的是一种功利论和道义论结合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致用主义’的主张,明确反对抽空道德的形而下基础、一味张扬义务论的道德观,也反对把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问题庸俗化的所谓‘经济道德无涉论’的观点”^[8]。也就是说,道德资本理论是要进一步突出道德的资本属性,强调“德得相通”,“德者得也”,如樊浩在《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指出的,“只有当‘德’与‘得’相贯通,‘德者得也’,以‘德’获‘得’时,社会才具有基本的合理性与公正性”^{[9](PP. 358 - 359)}。作为一种非实物形态的、精神形态的资本类型或实物形态资本的精神构成要素,美德资本既是工具性的,同时又是价值本身。美德资本中的“美德”,既包括苏格拉底时代就曾提及的诸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诚、节俭等美德,也包括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如开拓、进取、平等、适度、公平、诚信、互助等提升个体精神境界、改善人际关系和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精神品质;美德资本中的“资本”,既指可以带来生存、升迁、发展的资本,带来物质收益、财富和利润的资本,也指带来精神愉悦、满意体验与幸福

感的资本。前者是工具性的，后者则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或者就是价值本身。

2. 何以可能与存在样态。美德资本何以可能？美德主要是通过嵌入个体、组织和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对行为或活动产生规范、校正和引导，发挥使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增值的资本功能。从美德嵌入的对象来看，美德资本的存在样态可以区分为微观美德资本或称“个体的美德资本”、中观美德资本或称“组织的美德资本”以及宏观美德资本或称“社会的美德资本”。

其一，宏观美德资本。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国家、区域的美德存量与发展水平，包括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普遍的信任体系、互助合作的社会组织等。对一个社会来说，较高的社会整体美德发展水平是一种资本、一种优势、一种竞争力，可以增进社会公众的整体福利水准。因此，里德雷说：“美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像润滑油一样对人类社会不可或缺。”^{[10](P.151)}对社会来说，美德通过嵌入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及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可以规范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如企业等社会组织）乃至类主体（整个人类）的行为，降低社会控制、管理与监督成本，减少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和不同社会之间的摩擦耗费，从而使整个社会成员因之受益，在这层意义上，美德具有了促进整个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资本意蕴。

其二，中观美德资本。即各种社会组织的美德资本，尤其是对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企业来说，美德更是一种不可或缺、可以带来实实在在利润的资本。一方面，美德通过对企人力资本精神层面的引导与建构，对释放企业中劳动者的精神生产力将产生直接的推动力；另一方面，美德通过渗透进企业生产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多种层面，引导和促使企业注重承担社会责任、恪守诚信无欺等规范，这种积极正面的美德形象可以赢得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情感上更倾向于接受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从工具意义上讲，美德在这里转化为了企业现实的利润，转化为了现实的生产力，因此，道德对企业具有资本意蕴。随着人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意识的普遍觉醒和提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和企业的道德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可以肯定地说，良好的道德形象与道德声誉等美德资本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无形资产，是一种可以实现价值增值

的不可或缺的资本。

其三，微观美德资本。即个体的美德资本。对个人来说，美德通过嵌入个人品质、思想和精神世界之中，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甚至“不能仅仅将道德资本认为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而应该是全部”^{[6](P.203)}。西松肯定地说：“事实上，如果要阻止一个人从自己美德中获得收益，比之相反要难得多。”^{[6](P.216)}对个人来说，美德资本既具有工具价值，同时又是价值本身，作为前者，美德通过嵌入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受到敬重、获得增值，从而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积淀起道德基础；对于后者而言，西松认为，“我们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中，那是因为我们坚信那样能使我们更接近幸福的目标。幸福本身就是我们的追求，其他任何事物只有与幸福相关时才有意义”，而“积累道德资本就是在追求幸福”^{[6](P.189)}。这样，美德所可能带来的鲜花与掌声、物质与精神回报使其资本的形象显得更加凸显，因此，“美德即资本”的命题及美德资本的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三、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

美德资本如何形成？西松认为，“道德资本主要依赖于培养正确的道德或者美德”^{[6](P.46)}。而“美德即知识”则强调要维护美德的知识基础与前提作用，同时，“美德即知识”命题衍生的“知识的可教性”“美德可育”都明确强调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即“一个人可以用来增加自己道德资本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缺点不加忍耐，而且要不断使自己接受新的教育”^{[6](P.202)}。赫尔巴特也曾指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11](PP.259-260)}。在教育中学习知识、储积善知，同时依循善知而行，即是在培育、维护和提升美德资本。

概言之，美德即知识，美德即资本。通过社会教育、实践行为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美德一方面与知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资本密切相联。美德即知识，强调美德的真理性，强调美德的知识底蕴、知识基础或知识前提，但知识不等于美德；而美德即资本，强调资本的内涵因子包含美德，强调资本不可或缺的美德这一基本构成要件，从而强调美德的资本属性即价值性，在某种意义上，美德等于资本，但资本又不限于美德。当论及个人、

（下转第 93 页）

反思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分析^{*}

陶 磊

(南京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 江苏南京 210026)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作为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现代性元叙事”不仅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予以割裂,而且同时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核心——人的问题。发展主义转型话语笼罩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不仅不能掩盖其“被转型”的事实,而且暴露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实际上是丧失了自身独立性的转型逻辑。因此,重新对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予以省思,不仅是阐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根本动因的需要,更是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人的职责,以及关乎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性元叙事; 反思; 转型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24-06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但是,熟知的问题不应成为拒斥反思和批判目光审视的理由,有时甚至相反,许多熟知的概念由于得到不断的重复恰恰最有可能成为逃避理论上反思的抽象教条。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正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之一。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巨大。因此,对此问题予以根基上的深入反思,已成为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变革和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创新的前提性重大问题。

一、作为“现代性元叙事”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话语

在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讨论的诸多话语中,无不凸显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话语学者们讨论的问题域。换言之,正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主要是以现代性为主轴而展开的这一判定,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才被描述为“思想政治教育为适

应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以实现自身现代化为目标、以科学化和人本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结构的转变”^[1]。问题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来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不仅容易将思想政治教育硬生生地割裂为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更重要地是这一目标定位背后的“现代性元叙事”,反过来又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核心——人的问题。且必须指出的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割裂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其背后的逻辑仍是“现代性元叙事”。

何为“现代性元叙事”?这里所指的是为现代性建构提供合法性的宏大话语。“现代性”确实是一个充满着歧义的语词,但应该没有学者会否认,现代性是代表着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正如哈贝马斯的考证:“黑格尔起初把现代当作一个历史概念加以使用,即把现代概念作为一个时代”,“这种概念认为,现代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2](P.5)}即是说“现代”总是依赖于“传统”或“过去”等历史概念,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现代化视野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3BKS086),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判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范式分析”(项目编号:15YJC710054)。

[收稿日期] 2015-07-11

[作者简介] 陶 磊,男,安徽当涂人,南京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博士。

并通过和这些历史概念的对立关系中将其凸显出来的,因此,“它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3](P.178)。以这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基础,它必然持一种进步主义史观。因为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引发问题的过程,“时间则是克服问题的有效力量”,即是说现代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于是,“进步”和“发展”就获得了为现代社会“定向”的意义。直言之,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根据恰恰就是建立于这一“定向”之上。因此,“现代性总是与具有鲜明的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诉求的‘元叙事’设计和创造联系在一起”^[4]。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转折时代的种种遭遇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现代性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最为深层的渴求。与此相适应,种种现代性元叙事就应运而生。虽然人们赋予这些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现代性元叙事”种种不同的内涵,如“理念转型、功能/价值转型、体制、机制转型”^[5]、“范式转型、话语实践转型、教育模式转型、主导性或主导关系转型”^[6]等,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进步”和“发展”作为主旋律。在此意义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所发挥的正是现代性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功能,它试图为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基础。

在利奥塔看来,元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叙事”。元叙事是“旨在为用一种普遍原则统合不同领域,形成某种普遍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规范,从而为制度认同和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基础”^[7](P.211)。不过,利奥塔并不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只是单一地建立于普遍性的价值理念,目的和意义同样是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元叙事所诉及的一些形而上学理念,“它们关涉的主要还是未来社会所要实现的目的,它们之所以能够具有合法性功能,是因为它们被认作是普遍适用的,对人类具有指导意义”^[7](P.28)。

元叙事的上述性质,首先决定了它总是诉诸于大全式的、普遍性的、总体性的“终极语汇”来论证现代性价值合法性。实际上,元叙事的“元”就是指这种总体性的诉求。其次,它对现代性价值合法性的论证途径是目的论式的。因此,它设计了另一个超人般的权威存在,即一个不仅“合规律性”,而且“合目的性”的理性规则。再次,它所貫

彻的是一种两极对立式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即元叙事的价值合理性论证是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进步与落后、开放性与封闭性、善与恶等一系列二极对立基础之上,进步和发展、前者战胜后者且对其实现主宰已成为神圣而不可违抗的铁律。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最有影响的现代性元叙事无疑是被我们称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话语体系。大家普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话语体系蕴含着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定是我们所熟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8](P.50)。这种解释模式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所表达的原则和规律的“普遍性”和“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不过是用科学的理论、原则、方法和组织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即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将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规律”和“永恒之理”,并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终极理想”。于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又被进一步清晰地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向科学知识发展,思维方式向系统思维发展,工作职能向合理定位发展等。^[9]不难看出,这种禀赋“总体性”、“目的论”、“两极对立”的元叙事在其深层遵循的恰恰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这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价值理想,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它不仅要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划界,而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因其与生俱来的“大写”的独断和专断性质,势必压制和笼罩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小写”的生命之上。就前者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统合的“总体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它已经成为强势话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就被很自然地界定为:“以‘灌输’为手段,以为执政党和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性目的为唯一目的,以培养无个性的‘服从型’和‘听话人’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10]。显然,这种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偏见,一定程度上遮蔽,甚至是否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真实情况。不过,作为弱势话语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立面的靶子,其又势必遭遇到这种贬低、甚至是丑化的命运。就后者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虽再三强调是以人本化为特征的整

体性结构的转变,认为以往以社会中心任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社会中心任务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对人的忽视。因此,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为人服务和为社会服务统一的转型。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服务”的提法是否严谨(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是一种服务),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心任务和社会中心任务是否就是同一的等问题,但是,问题不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中提出对人的重视,或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在转型论述中贴上人的标签就得到解决,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载体、目标转型中要重视人,人就获得了真正的重视。而实际上,因一定阶级或组织对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预设,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即所有的个体生命必须放弃其私人的“偶性”并服膺于“大写的理想”。依照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逻辑,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现代性元叙事所规定好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它们构成了个体生命所应予以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标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将由外在的规范予以评判和定义,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个人在遭遇着“不容违背”、“不能缺度”的思想观念时,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追求等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而被弃之一旁。

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被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因何而转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根本动因何在?这里所关涉的问题在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被转型”?长期以来,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直接动因来自于社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现代社会立足,为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为现代社会服务,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确证,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11]。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过程”^[11]。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即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动力分为三个场域:一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场域中加强社会控制、适应社会转型和体现技术进步的内在需要;二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中观场域中的群体动力和组织动力;三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场域中的主体性动力和学科自身发展。^[12]问题是,对思想政治

教育转型动力作出如此细致划分,不但根本上无助于我们明确何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根本动力,而且在这三大动力中就有两大动力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或者说更加清楚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被转型”这一事实。而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转型只能微小又微弱,因为作为微观场域的动力无时无刻不深受着宏观场域和中观场域的制约和影响。

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它也必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作出改变,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们知道,一般认为: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属性,甚至是本质属性。于是,在这种“决定论”观念中,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或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发展,它的根本动因只能是政治、经济、社会,它本身从根本上说只能是“被动”的。

更进一步说,是从社会转型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社会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外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恰恰是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的逻辑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以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蜕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附庸,即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倘若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逻辑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需要,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就不可能是以人的转型为核心,只能是以社会转型的需要为重中之重。直言之,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社会转型为动力,使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作为社会的工具“被转型”,而隐藏在这种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背后的逻辑,却是基于一种社会机械决定论的假设。在此种机械决定论看来,社会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实体存在,而且它具有压倒性优势并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人不过是社会需要加以塑造的客体,即是说人在这种社会实体中丧失了其存在地位,没有独立性可言,也不会有任何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又作为社会的构成部分,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顺应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自然也成为社会转型的产物,随着社会转型而转型。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与超越,只能与社会转型保持步调一致,亦步亦

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目的也只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和复制现实社会的要求,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奉行的也不可能是其自身的规律,而是市场功利或政治争斗等。当然,这不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是不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然受到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制约,并与特定的社会相适应。但是,这并不能抹煞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性,甚至就将其视为社会的工具。

依照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之见,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入了“结构性暴力”之中,即“由处境、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造成的暴力”。所谓结构性暴力,是因为“这种暴力的来源是一个匿名的结构”^{[3](P.514)}。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正经历着转型问题的困扰,这是一种由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过程中由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造成系统性、整体性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又很难给正处于困扰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开出一副好的药方,因为我们很难找到是“谁”造成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的困境,即没有哪一个文化主体该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问题承担责任。问题的诡异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每一个个人或群体并没有游离于这种暴力之外,却又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能为它承担责任。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更加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这种“结构性暴力”的施压中被转型的风险。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要想有效地降低这一风险,显然不能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需要作为其唯一逻辑,即除了要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之外,更要担负起超越于政治、经济、社会,引领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与使命,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从业人员才能真正实现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平等对话。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也才能在这种自赎中得以拯救被宰制、被决定和被转型的命运。一言以蔽之,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困境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逻辑。

三、超越“现代性元叙事”和被转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新课题

据上所述,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话语的“现代性元叙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被转型”,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逻辑

不明确。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逻辑受制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核心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转型,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转型,所有的外部转型都是围绕着“如何培养人”的转型。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问题上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培养接班人。应该说,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反映了特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但因“接班人”这一说法本身具有的浓厚的封建色彩,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封建帝王政治中的“东宫太子”,这种不平等性昭然若揭。有学者可能正是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要“以培养社会主义公共人为目标”^[14]。但是,该学者的“公共人”的解释却颇值得寻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通过创造有联系的公众,让受教育者密切关注公共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关心他人,更拥有不断践行对众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从而成为真正关注、关心实际贡献于国家、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14]。直言之,这种“公共人”的定位,仍然停留在“接班人”的提法之中。显然,这样的“公共人”定位与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世界”的要求难以一致。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要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培养出来的人要能成为世界一份子并担负起自身的责任,但这样的“公共人”培养出来也只能局限于国内的狭隘眼界,而无法具有世界胸怀。说到底,依照这一“公共人”的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不论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还是“接班人”,都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摆脱沦为社会工具的命运。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公共人”的提法不当,而在于如何看待和阐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的“公共人”的内涵。笔者以为,培养“公共人”可以也应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的核心。何谓公共人?人们立即会想到“公共性”、“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公共美德”等概念。毋庸置疑,这些概念都和“公共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些概念仍是在较为抽象的层面讨论“公共人”。实际上,所谓“公共人”,一般都具备这样的人格特征:“公共事务的关心;信息和知识的掌握;稳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准确观察的能力;对交流与讨论的参与;理性行为;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等。”^{[15](P.189)}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公共人”和现代公民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现代公民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如斯金纳认为现代公民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能力采取行动，二是不存在依附、不存在干涉、能够自我实现。^{[16] (P. 134–135)} 这两个方面实质上指的都是公民政治权利，即主动参与政治权利和免受政治压迫的权利。应该说，现代公民需具备的两个条件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伴而生的，现代公民的存在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持续和发展的可能，资本主义国家则为现代公民提供了相应社会和政治条件。马歇尔正是洞察了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于是直接断言：“只有西方才能找到公民概念”^{[17] (P. 10)}。这显然是将现代公民概念予以独有和独享化了。但不可否认，现代公民，乃至现代公民教育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但其确实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公共人”则不同。“公共人”所依靠的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中间领域，即这既不是私人领域，也没涵盖国家。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中间领域，或者说是公共领域，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如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个人道德的规约。应该说，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的。即是说“公共人”超越了特定地域、时空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应该以培养“公共人”为核心。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应以培养“公共人”为核心，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培养“公共人”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价值诉求，更是人性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因为其拥有着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作为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却是包含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规定性的一种肯定。正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这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规定性得以“拯救”，即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一种“拯救性”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价值诉求，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规定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和思想政治教育起源是紧密联系的。根据金林南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来开展的政治活动，只有在精神性政治活动达到非常活跃的程度，相对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才产生。“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形态层面的精神政治条件已经具备，

现代传播技术亦已经允许思想者的思想活动直接产生政治效应，思想活动可以在手段、技术上直接等同于政治行动。”^{[18] (P. 150)} 确实，只有在现代社会，即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中间领域的诞生后，不同的思想观念借助于现代传媒技术而进行公开的博弈才得以实现。即是说“公共人”所依托的公共领域，为思想之间的博弈提供了社会主体、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很难想象，在思想实践活动中公共领域尚付之阙如，思想之间的竞赛无从展开，遑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领域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生根落地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人”的存在。人是一种政治性存在，意味着人类离不开公共生活。根据阿伦特对古典政治的考察，罗马人称为 *humanitas* (人性) 的东西只有公共领域中才能体现出来，只有当人进入“公共领域冒险”时才能获得。^{[19] (P. 65)} 因为古典政治中并不将私人的生活作为人性的体现。现代人虽然承认私人生活的合法性，但私人生活不仅不构成人性的全部，而且人的卓越性只有在超越这种私人生活基础上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开放的领域，“首先，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20] (P. 32)}。即公共领域中的每一个人的言行不仅被自己看到和听到，也为他人所看到和听到。但是，“只有那些被认为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值得被看和值得被听的东西，才是公共领域能够容许的东西，从而与它无关的东西就自动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事情”^{[20] (P. 33)}。换言之，只有那些超越私人生活，为群体、民族、人类思考的东西，才是值得关注的。反之，人性中的自然本能的东西，则是以牺牲人和世界的实在性为代价。公共领域之所以为人们值得听、值得看，说到底是在于在它那里人性得以熠熠生辉。“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是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22] (P. 36)} 显然，公共领域使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中挽救出来一些东西成为可能。倘若人性中没有这种向尘世不朽的不断超越，也就没有公共领域和“公共人”，也不会有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人性中的自然性和本能性决定了人类更关心，甚至只关心和他们私人利益有关的东西，个体的欲望一旦被其他个人欲望点燃，人与人之间就会像狼一样陷入“弱肉强食的争夺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公共领域的思想辩论和政治博弈中，通过说服、沟通、引导和批判

来实现公共领域的价值革新,以培养“公共人”,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之所在。

二是培养“公共人”和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高度一致性。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不仅不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加以改变,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能更好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思想领域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在现代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必然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它需要和这些思想观念进行对话、辨析、澄清等,从而承担起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观念的批判和澄清,还有创造等方面的职责,以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论是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还是和公共领域中多元的思潮予以辩驳和澄清;不论是以交流的方式,还是以言传身教的手段来展开,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们的价值认同和政治共识的达成。价值认同和政治共识之所以有达成的可能,这不仅源于精神生活的共享性,而且是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公共性立场所决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立场只能是公共性的。说理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为基本的形式,在其背后反映的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正是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决定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公共人”,“公共人”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立场的守护者。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常常使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对错误的思想予以辩驳和批判,公众舆论不是个人的意见的反映,而是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公共讨论而形成的“公意”。公意和众意有着本质性分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见的总和”^{[21](P.93)}。不过,公意是不会自动生成,而是需要人们参与其中,并经过详尽地辩论和讨论,最终被所有人所共同承认的东西。什么东西能被所有人共同承认?代表那些私人利益或少数集团利益的意思显然不行,只能是那些基于公平、正义,并体现和实现公平、正义的东西才有可能。显然,这一过程既是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公共人”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盛跃明,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及其路径[J].求实,2010(10).
-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4]贺来.超越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析[J].学术月刊,2014(1).
- [5]徐立丽.大学德育价值、内容及机制现代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9.
- [6]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关系的转型与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1).
- [7]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多维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 [10]雷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哲学反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2).
- [11]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及其转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3).
- [12]陈宗章.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动力述评[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4).
- [13][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14]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 [15]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16][英]昆廷·斯金纳.国家与公民自由[A].刘擎.公共性与公民观[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17][英]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18]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 [19][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20][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1][法]卢梭.公意与公民精神[A].谭安奎.公共性二十讲[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计算机说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路径^{*}

徐惠忠¹ 贲智勤²

(1. 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管委会, 江苏启东 226236;
2. 南通大学学生工作处, 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 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通过计算机等设备说服受教育对象形成预定的态度和行为,是当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重要路径。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工具、媒介和社会行为这三种功能角色的具体实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是强化计算机说服的可信性。

[关键词] 计算机说服; 实效; 路径; 关键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30-04

一、计算机说服的源起

说服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历来受到高度重视。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P.9)},明确了说服教育在团结群众、引导群众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2](P.1476)},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3](P.458)},深刻地指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说服教育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说服教育更是不能动摇和不可替代的。邓小平也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4](P.336)}说服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说服教育做得好,能够深入群众心里,真正转

变群众思想,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群众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5]明确了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入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中,增加说服力,让人们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接受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一道去做,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6]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和角度去考虑问题,与人民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

计算机产品和网络在普及中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态。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交互机会,使得通过计算机来改变人的态度和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计算机说服理论对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80111),2013 年南通大学教学改革资助课题“话语转换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2013B083)。

[收稿日期] 2015-06-08

[作者简介] 徐惠忠,男,江苏启东人,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硕士,讲师。
贲智勤,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副研究员。

行为成为可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Fogg B. J. 经过多年研究,将计算机说服定义为“通过计算机产品达到改变人们态度和行为目的的过程”^{[7](P.15)}。但目前国外对计算机说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商业推广,如提高品牌的认可度、改变人们的购买习惯等。近年来,计算机说服逐渐被政治家应用于政治活动中,如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通过 Facebook 等的推广获得了一定数量网民的支持。计算机说服关注的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影响而非单纯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附带影响,强调在说服过程中注重人机交流互动,尊重用户的选择,而非通过强制或欺骗手段,最终促成人的内在本质改变。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服教育仍然是必须牢牢把握住的重要方法。结合国外学者对计算机说服的研究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计算机说服定义为: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分析、研究和设计交互性计算机产品或应用,说服计算机使用者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态度和行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计算机说服区别于一般计算机说服,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的,是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开展的,是有计划地实施的,最终促成受教育者自我的内在改变。改变可以是加强,也可以是纠正,加强的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一致的态度和行为,纠正的是与之相背离的态度和行为。

二、计算机说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解析

计算机说服主要通过计算机发挥的三种功能角色来实现:工具、媒介和社会行为,三种功能角色都有自身的说服特点和方法。运用计算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工作,就是要紧密结合这三种功能角色的说服特点和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通过计算机内化为受教育对象自觉的内在态度,并成为习惯的外显行为。

1. 计算机作为工具,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工以提升说服力

计算机作为工具,通过降低难度或提升效率帮助人们实现对复杂事物的掌控,并达到改变使用者态度和行为的目标。

(1) 简化说服,即运用计算机的缩减技术。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总是有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回报

的心理,也就是效益最大化。^[8] 效益越大,行为频率就会越高。计算机说服可以将较为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简化为若干个简单道理加以推广。用户如果理解了简单道理并受到一定形式的奖励,就会提升自信,激发出更深入学习和探究的兴趣。

(2) 引导说服,即运用计算机的隧道技术,使用者按照计算机提供的预先设定路径完成特定行为。如十八大召开期间,门户网站在头版刊载会议重要论点,用户在点击后,就会进入十八大会议的专题版面,也就进入了十八大宣传的“隧道”,这样,用户有了更多的机会关注十八大的相关信息。隧道技术的运用犹如让受教育对象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并且有自主选择内容菜单的权利。用户持续留在“隧道”内的动力来源于能感受到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通过计算机可以为受教育对象设计一份“隧道”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菜单”。

(3) 对比说服,即运用计算机的监督技术。运用计算机对个人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在一定的范围或组内,将个人情况与组内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促进个体行为效率或道德水准的提升。如在面对道德滑坡等问题时,网站开通道德问题调查,如“摔倒老人该不该扶”等,由用户轻点鼠标选择自己的态度,同时,用户会看到自己在整个投票群体中所处的水平。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具备一定关系的“组”,并在“组”内公布组员态度和行为的组平均水平,提升优秀者的自我认同感,促进平均线下水平者因紧迫感而加强自我学习。

2. 计算机作为媒介,模拟现实体验以提升说服力

计算机能通过提供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要求的模拟情境,通过友好的体验来改变用户在真实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模拟方式主要有两种:因果模拟和环境模拟。因果模拟就是通过计算机模拟让用户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因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来影响人们,改变人们原有的态度和行为。因果模拟让人们能在安全、没有危险的环境中探究和体验,而且不需要经历现实中较长时间的等待。这种模拟避免了说教式的说服,属于隐性说服。如通过计算机模拟人为的浪费导致若干年后的水资源枯竭,进而说服用户形成节约用水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模拟就是创设一定的环境来激励用户达到特定的目标行为。模拟环境可以

控制在不暴露于新条件和可怕环境的情况下,通过虚拟奖励激发人们去施行目标行为。据研究发现,计算机模拟的对目标行为的虚拟奖励比在现实中的奖励更能刺激人们频繁和高效地完成目标行为。^[9](PP.23-34)比如游戏中的虚拟奖励会刺激用户一次次去挑战下一个任务。一个成功的模拟环境应该是能让用户从虚拟世界获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并能将它用于现实世界中。通过计算机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进行因果模拟和环境模拟,让受教育对象在虚拟模拟中的感受影响现实中的态度和行为,并通过模拟的可重复性固化目标行为和态度。

3. 计算机通过社会行为功能,改善用户印象,提升说服力

用户通过对计算机的物理、语言和社会角色三种印象来判断其社会行为功能。计算机产品往往呈现给用户一定的外部形象,即物理印象。计算机通过对目标群体行为、衣着、喜好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设计出符合他们兴趣点的聪明的有能力的可信赖的思想政治教者形象,提升说服力。

计算机产品一般是通过屏幕显示或声音提示向用户展示它的存在,比如屏幕对话框等,这是计算机展示给用户的语言印象。赞誉是计算机产品的重要语言表达方式,计算机赞誉同现实赞誉一样具有很强的说服效果。通过计算机对受教育对象的正向反馈及时给予赞誉,以进一步促进其自主学习和提高。在赞誉过程中,要注意赞誉符合

客观实际以及赞誉的频率。如果将不带赞誉的语言夹杂在赞誉语言中,就会增强赞誉语言的说服效果。^[10]

计算机产品有时充当现实世界中的某种职业角色,如教师、律师、医生或者经济师等。计算机产品充当的社会角色是否具有权威性是决定说服力的重要因素。一个优秀的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计算机产品可以具备某种或多种职业角色,因为计算机产品可以集成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职业角色社会功能的发挥,让使用者对其产生信赖,以形成明显的“光环效应”,提升计算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这便是胡锦涛同志要求的“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5]。

三、强化可信性,提升计算机说服力

计算机在说服过程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是可信性。受教育对象是否能被计算机说服,主动权仍掌握在受教育对象手中,这是计算机说服区别于课堂式思想政治教育说服的最大特点。只有使用者对计算机相关产品或应用产生信任,我们才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对用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服。通过计算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服的可信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可信性上,可信度越高,说服的效率也就越大,反之,就很难说服对方。计算机说服的可信性由真实性和专业性决定,真实性又由客观性和经验性决定,专业性由权威性和彻底性决定(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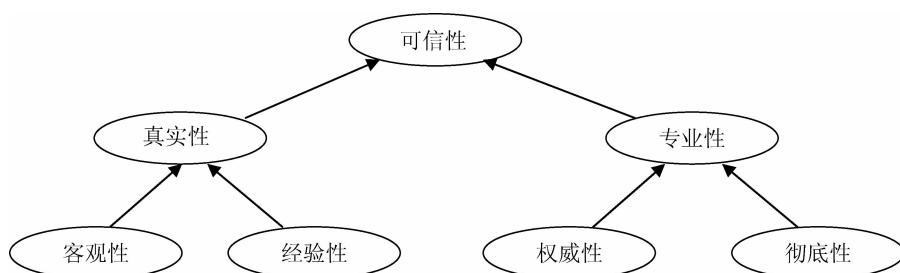


图1 可信性构成图

计算机说服的真实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否具备客观性和经验性。客观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客观事实的相符程度。客观性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实性的基本条件,只有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才能说服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计算机说服的客观性不但要求教育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而且所列举的数据或例证应标明准确的出处,并且这些出处或来源本身就是社会公认值得信赖的。同时,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表述应该是准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或带有歧义。计算机说服的客观性决定受教育对象的第一印象,是获得可信性的第一步,甚至可能是获得可信性的唯一机会。^{[11](P.129-200)} 经验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受教育对象的经验相符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经验相符程度越大,则受教育者认为真实性越强,说服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受教育对象因自身社会经历和教育经历会形成一定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会被运用于判断所接收信息的可信程度。这种判断是一种假定性的判断,会因受教育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受教育对象原有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一致,则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强化。如果不一致,但客观性很强,仍然能够获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进而能产生对受教育对象转化的教育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真实性较易被受教育对象发现和评估,并对受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表层结构产生影响,即对受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态度、心理、审美满足和关注热点等产生影响。

计算机说服的专业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权威性和彻底性。权威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否代表了相关领域的专业水平和权威观点。权威性一方面体现在内容的作者是否为某领域的专家,具备相当的影响力,即该作者是否具备对特定问题的发言权和发言资格;另一方面体现在论述内容是否凝练概括出了在特定问题上的重要论述和观点,即该观点或论断是否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彻底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否阐述了事物的本质。“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1)} 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还要能够通过计算机技术把这种由现象推及本质的过程充分展示给受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改变的是受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活动的深层结构,即受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信念信仰、话语体系和政治认同等。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性的受教育对象一般具备相当的理论基础和较为稳定的政治观点,但往往他们同样具有一定的理性分析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因而只要具备足够的专业性就有改变其

思想政治活动深层结构的可能。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计算机说服的真实性和专业性如果两方面都很强,或者其中一方面很强,另一方面不为人所知,仍然会被认为可信度较高;但只要有某一方面较弱,则另一方面就会被忽略,并大大削弱其可信度。因此,为保证说服力的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计算机说服的真实性和专业性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央视网.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01-07-01) [2012-12-05] [http://www.cctv.com/specials/80zhounian/sanji/zabbix0702_1.html](http://www.cctv.com/specials/80zhounian/sanji/zxbb0702_1.html).
- [6] 新华网. 胡锦涛在宣传会议讲话:用三个代表统领宣传工作[EB/OL]. (2003-12-07) [2012-12-05]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232678.html>.
- [7] Fogg B. J. *Persuasive Technology Using Computers to Change What We Think and Do* [M].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2003.
- [8] 鲁忠义,马红霞. 主角情绪和时间信息对情境模型加工的影响[J]. 心理学报,2011(5).
- [9] Fogg B. J. *Mass Interpersonal Persuasion: An Early View of a New Phenomenon* [A].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uasive Technology [C]. Berlin: Springer, 2008.
- [10] 赵均. 网络语言概说[J]. 现代传播,2005(2).
- [11] Ramachandran D., Canny J.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Human-Machine Dialogue* [A].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uasive Technology [C]. Berlin: Springer, 2008.

(责任编辑 师语)

认知神经科学青春期研究理论 对小学高学段教育的启示^{*}

程世英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青春期始于小学高学段,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 青春期的特点与大脑发育密切相关, 这一全新视角为认识青春期儿童提供了科学依据, 并对小学高学段的教育带来有益启示。教育者面对这种科学结论, 应警惕生物决定论并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应对学校教育。

[关键词] 青春期儿童; 认知神经科学; 小学高学段

[中图分类号] B84, G6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34-04

认知神经科学被称为是 21 世纪的前沿科学, 美国、欧洲、日本相继提出“大脑的十年”研究计划,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对青春期的研究极具启发性。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期始于我国的小学高学段, 其间, 学生经历了身心的巨大改变, 小学教育必然要直面这一变化。借助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审视过去的教育措施, 一方面, 可以使我们对青春期学生的教育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 帮助教育者改变部分错误观念, 在脑科学的基础上更好地应对小学高年级到来的青春期危机。

一、青春期儿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提出的颠覆性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 人的大脑在 12 岁左右重量就不再增加了, 所以, 人的大脑在那时就发育成熟, 如同房屋建构完成。青春期儿童的认知为什么会进一步发展并存在“暴风骤雨式的”行为模式? 传统观点从荷尔蒙变化等生理角度来推测可能的原因, 这种简单化推论为大众所广泛认可, 但并不令人信服。不可否认, 荷尔蒙对个体会产生影响, 但

是成人体内也存在荷尔蒙, 并不会由于荷尔蒙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由于某些原因而服用激素的个体也不会像青春期那样产生剧烈心理变化。那么, 究竟是什么在影响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变化? 认知神经科学家凯庭(D. Keating)从脑绝对容量出发寻找证据, 然而经过多年研究也得出结论, 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证据表明青春期脑容量的绝对增长与智力增长存在关联。^{[1](P.78)} 值得庆幸的是技术的进步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研究者采用多种成像技术, 如 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PET(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等, 对大脑多个区域的活动进行观察。其中, 青春期大脑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颠覆了多年来对青春期问题解释的激素论取向, 取得显著进展。青春期的大脑不仅远远没有成熟, 而且在很多方面都经历着突发性的成熟。概括来说, 青春期儿童的认知神经科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常识提出挑战:

1. 青春期儿童大脑的“用进废退”原则

研究发现, 青春期儿童的大脑发生着大量髓鞘化过程, 髓鞘化指的是构成脑部回路的神经轴突被一层髓磷脂鞘所包围的过程, 髓磷脂是一种

*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品牌建设工程一期立项项目(项目编号: PPZY2015A005)。

[收稿日期] 2015-07-10

[作者简介] 程世英, 男, 河南濮阳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油脂性物质,它能起到绝缘的作用。髓鞘化降低了神经突触的其他连接,看似阻碍了大脑其他发展的可能,但同时也增加了此类神经信号传递的效率和速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青春期儿童的大脑经历了明显的重构,有人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修剪枝叶”的过程,修剪成什么类型是由个体经常使用哪些突触并导致其髓鞘化而得的。所以科学家断言,青春期儿童缺少某些活动体验,与此相关的神经连接将慢慢退化,而更多从事哪种活动,就会形成哪种类型的大脑,例如“艺术的大脑”“数理化的大脑”等,这就是青春期儿童大脑发展的“用进废退”的原则。

2. 额叶皮层开始成熟但其发展远没有结束

额叶皮层是进行做计划、做决定、设置目标和元认知这些复杂认知活动时会被激活的大脑区域。在青春期早期,前额叶皮层会发生大量的突触裁剪,所以,青春期早期是一个抽象思维能力突飞猛进的时期,在青春期中期,前额叶皮层会继续髓鞘化,并且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成人早期,并在此后继续缓慢增长一直到40岁左右。然而这种成熟过程相对其他变化显得漫长,青春期儿童的理性推理能力较成人的相比还有很大不同。

3. 边缘系统发生神经组织的变化以及神经递质变化

如果说额叶皮层是“理性的大脑”,那么边缘系统就是“情感的大脑”,大脑的边缘系统主要有杏仁核和海马两个神经组织。前者关系情绪的表现,后者与记忆,尤其是机械记忆有关。在青春期,海马经历突发性的成熟,所以青春期儿童的记忆力与学龄期儿童相比短时记忆增加30%,同时杏仁核存在突发性发展,对行为产生更直接的作用。核磁共振发现,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成人主要激活前额叶皮层,而青春期儿童同时激活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成人可以跟着理性走,而儿童只可以跟着情绪走”。同时,在边缘系统,某些神经递质(使电荷能够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的化学物质)如多巴胺和5-羟色胺的水平也在发生变化,这些物质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

4. 胼胝体经历突发性成熟

胼胝体是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兰花形状的神经束,起到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作用。在青春期,

胼胝体经历突发性成熟,变粗变大,且经历髓鞘化过程。这保证了大脑两个半球较之前相比有更充分的互动与交流,需要左右脑同时参与的运动能力、认知任务以及社会性发展都出现一些变化。

这些大脑的变化与青春期儿童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看,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本文从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等方面来看待由此带来的心理表现。

二、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理解青春期心理发展及小学高学段教育

1. 青春期学生的学习能力加速提高,但仍有不少不足

认知方面的变化,第一,额叶在青春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促进高水平推理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脑区刚刚开始进入髓鞘化阶段,所以青少年的推理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他们对推理非常着迷,愿意进行思考,所以,研究发现,在课堂中吸引注意力的方式不完全在于趣味性和参与性,引发思考的教学设计同样可以让学生全神贯注。第二,海马的发展,使短时记忆增强30%,所以他们记东西会很快,但是海马主要影响机械记忆,工作记忆以及将知识纳入大脑知识结构的能力还在发展中。对青春期儿童进行学习策略,尤其是组织策略的教育对他们很有帮助。第三,小脑一直都被视为是控制运动的运动中枢,但J. Giedd发现,它在思维加工和决策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如构思一篇论文、解复杂的数学题都离不开小脑,^{[2](P.861)}因此,教师应该鼓励青春期儿童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根据“用进废退”原则,青春期儿童缺乏运动的后果不仅仅是影响身体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学习。

2. 情感在青春期学生的认知学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通过唤醒积极情绪促进学生学习

传统观点认为,理性的、安静的学习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证明在认知加工过程中,情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举例来说,脑的理性方面让我们设定解题的程序,但是,脑的感性方面可以让我们充满激情地、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对教育者来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情感的作用,应该认识到情感也是记忆和学习的关键部分,要加以充分重视。例如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积极情感相伴,怀有兴趣、成就感、征服欲等积极感

受投入到学习中去。此时学习内容与愉快情绪体验相关时,就会形成一个愉快的神经联系,在遇到相类似的情景时,杏仁核会记起愉快感觉。反之,感受消极时,杏仁核也会记住,并在下次产生不快,影响认知和加工。即我们感到愉快时会学得更多,而且良好感觉会是一种强化,成为下次做此类事的动力。在教育实践中,当老师看到学生学不好,就尝试反复讲解、不停讲解,或者布置大量练习,这种做法并不能保证学生一定能掌握这些知识,所以有经验的教师会非常重视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的情感障碍,以积极情绪的唤醒来促其学习。

3. 青少年在社会认知方面具有“假愚蠢”现象,应合理认识并加强交流

额叶的快速增长,发生两大变化: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理想主义的行为也越来越多,青少年理解了世界存在的方式,开始想象各种可能性。例如,他们开始对父母挑剔或者对某些观点质疑,经常用“那可不一定”“也可能”等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不同可能性的认识,这是一种认知上的进步,但容易表现为相对主义的观点,在社会性发展上表现为 Elkind 在 1978 年所提出的一种“假愚蠢”现象,即一种简单的要求,例如教师请学生帮忙把作业收上来会引起学生的种种联想:“他是在使唤我吗?如果我认为他在使唤我,我不给他收作业,但其实他可能不是这样。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形容,额叶越来越成熟,就如同一条尚未铺完的路,上面还有很多坑洼不平和泥泞不堪的地方。青少年的相对主义倾向和理想行为不能让他们在与人交往中产生合理的认知。在社会交往中,这种脑发育特点就表现为假愚蠢的现象,教育者认识到这种发育特点,并在平时与青少年友好交谈,指出其观点中的矛盾之处,让青少年参与决策过程,提供良好的示范等都是比较好的做法。

4. 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容易过敏的现象,应适当宽容并加强情感教育

杏仁核主要控制情感反应以及表情识别,杏仁核的加速成熟以及额叶的相对不成熟决定了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情感动物,甚至受情感所控制。例如面对家长平静的善意提醒“早点回家”,青少年的反应可能很剧烈:“你总是不相信我,总是这样”,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杏仁核

影响的表情识别能力还未成熟,对家长表情可能产生误读;二是杏仁核影响了情绪感受(之前不被信任导致的委屈等感受被唤醒)且超越了额叶的理性判断,对情绪感受的敏感加上控制和规划事件能力的缺乏,导致这种激烈反应。在小学高年级,学生错误理解老师的某句话甚至某个眼神的事也经常发生。因此,教育者对青少年的过激反应应该适当宽容,教会他们学习管理自己情绪的方法和策略,不加分辨地进行道德评判并非合适的做法。

5. 偏好冒险、易成瘾具有认知神经科学基础,应适当提醒并加强脑科学教育

如前所述,青春期儿童大脑的边缘系统中某些神经递质(使电荷能够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的化学物质)的水平也在发生变化。例如,青春期的大脑对多巴胺很敏感,多巴胺引发快感,而且这种快感能让人上瘾,所以,青春期儿童多参与一些让他们心情愉快的活动对他们很有帮助,相反,如果青少年用一些过分的方式来获得满足和快乐,这些方式包括抽烟、打架等出格行为,也包括追求刺激和冒险的非理性行为,大脑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且不断寻求程度上更强的刺激和冒险,以达到更高的多巴胺水平,产生快乐。另外,5 - 羟色胺(影响一个人平静和满足的感觉)水平在青春期明显不足,所以青春期儿童较少感觉到平静和满足。以上二者相结合导致青春期儿童偏好冒险、容易上瘾、滥交等行为,其目的是获得更高的多巴胺水平,从而更快乐。加之青春期大脑正处在生长发育中,所以,脑科学的研究者告诫青少年“我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这些行为(抽烟、酗酒、滥交等)对你的影响只是在周末,其实它对你此后的 80 年都会产生影响(影响了大脑的重构)”^{[3](P.9)},所以,教育者的及时提醒,用脑科学的研究来提供证据,说服青春期儿童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还发现胼胝体的发展导致青少年将右脑的感受与左脑的认知及时结合,所以更容易“害羞”,从而影响自我意识。小脑的发展能够使他们同时处理不同信息,颞叶的发展较慢,所以较难和青春期儿童进行沟通,胼胝体的髓鞘化过程没有完全形成,导致他们语言发展方面还存在问题,有时他们词不达意,有时又能表达出微妙的讽刺和挖苦,等等。这些知识科学性强、说服力强,给我们提供不同的途径

来看待青春期的儿童。

三、合理认识脑科学对小学高学段教育的启示

不可否认,脑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青春期儿童很有帮助,并且其实证性、科学性的外衣又显得非常迷人。在职后教师的培训或者在学校开办此类知识讲座时,听者往往频频点头,信服不已。但是这种不加思考和批判的认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是无益的,我们应合理认识这种教育启示。

1. 警惕生物决定论倾向

决定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制约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果的关联决定了事物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整个过程。生物决定论是心理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认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这些生物因素包括早期高尔顿所提出的智力以及由此导致的优生学、社会生物学所提出的基因(《自私的基因》)就揭示了人类心理和行为从终极意义上被基因所控制、操作),进化心理学也解释了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把适应环境的特征存放在基因编码里并以心理机制这一形势表现出来。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的研究披上了实证、科学的外衣,其迷惑性让人把解释个体心理过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对其研究结果大为追捧,认为大脑及其神经活动是心理产生的原因与基础。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顺着这种逻辑,人们对囊括一切的‘修复’成人行为的‘蓝图’的观念,远比对强调基因与环境相互影响重要性的理论要感兴趣得多”^[4]。

其实,就如同胃和小肠是消化食物的主要器官一样,大脑是心理的器官,是心理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不能就此认为心理就是大脑的变化。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我们可以从大脑的神经变化来解释某些心理现象,但就此认为认知神经科学就是心理学解释的唯一来源,未免有武断之嫌。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基于脑、发展脑与促进脑”,还要看到主观能动性以及意义、价值、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2. 教学是科学也是艺术

国内对于教育是科学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议。

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教育的科学基础,因此备受追捧。但是,具体的教育活动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个体的发展水平、家庭的引导、个体经历的外在环境、教师特质、学校心理氛围等等,这些因素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处理这些复杂性就如同用色彩和线条调制出一幅美好的画,用乐符汇成动听的音乐一般,在一幅名画里看的那种整体效果的震撼,在一首名曲里体会到的酣畅淋漓,只能用艺术解释,任何肢解后的汇总都无法达到那一整体效果。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学习名师的一些方法,但是如果照搬其教学方法和教育措施,并不加以消化、吸收、运用,那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杜威也指出,教学艺术,一大部分在于使新问题的困难程度,大到足以激发思想,小到加上新奇因素自然带来的疑难,足以使学生得到启发性的立足点,从此产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教育教学艺术是“一切人类艺术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一种艺术”^[5]。所以,教育现实的复杂性决定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艺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可以成为一块透镜,用以探求教育的复杂性,但是教育过程不是只有这一个透镜看得清,我们还应该合理吸收,在对小学高学段学生有更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艺术化地加以应对和引导,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参考文献]

- [1] Keating, D. *Cognitive and Brain Development* [A]. R. Lerner and L. Steinbe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M]. New York: Wiley, 2004.
- [2] Giedd, J. , Blumenthal etl. Brain development dur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MRI study [J]. *Nature Neuroscience*, 1999(2).
- [3] Sheryl Feinstein. *Secrets of the Teenage Brain* [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 [4] Thomas, J. How Biological Determinism is Encouraged [EB/OL]. <http://intl.concord.org/cbe/Thomas.html>.
- [5] 孙志胜. 教育是科学还是艺术? [N]. 中国教育报, 2012-07-20(6).

(责任编辑 师语)

新时期“江苏精神”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王瑾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从分析江苏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入手, 解剖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寻求相应的对策, 形成新时期以“江苏精神”指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 以期引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走向深层结构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 江苏精神;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38-05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桑学成曾说, 江苏实现每一次大的跨越, 都产生了有代表性的精神理念, 这些精神理念与物质生产领域取得的进步相互促进, 丰富了江苏发展的内涵。^[1] 精神来源于实践, 不同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精神, 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实践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引领。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 道德的规范是最厚重的历史积淀, 是维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对于未成年人而言, 为他们努力创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意义非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 “目前, 我国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 3.67 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2]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但却是当前青少年教育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新时期, 在江苏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 融入江苏精神,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锻造优良品德已经成为顺应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

一、厘清相关概念

1. 思想道德

思想道德最初是由“思想”和“道德”两个词构成。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中, 我党第一次把思想道德作为一个专门词汇提出, 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建设, 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 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P.244)} 在 1996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 又提出,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 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 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留守儿童健康关爱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258)。

[收稿日期] 2015-04-11

[作者简介] 王瑾, 女, 江苏盐城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种提法从科学的角度明确了思想道德的性质和内涵。可见,思想道德已成为和科学文化素质并列的概念。

2. 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概念可以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指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从这一条可以明确看出,未成年人就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人的个体。由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差异明显,而且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在他们成长的生理、心理及思想行为等各个领域都千差万别,特别是婴幼儿时期的思想道德状况很难进行把握和研究,同时考虑到本项研究的时间较为短暂,也不可能将视角触及所有的未成年人群体,所以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为年龄在12—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小学四、五、六年级至整个初中阶段。

3. 江苏精神

2011年,经过全省上下的充分讨论、广泛征集,江苏省委第十一届十二次全委会确定了新时期江苏精神,将“三创”精神深化拓展为“三创三先”,即“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三个“创”,就是创建大事业,开辟新天地,达到高水平;三个“先”,就是超越别人,持续领跑,勇当开路先锋;“三创三先”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都是一种抉择、智慧、勇气和胆识,这十二个字的高度概括将江苏人民对历史的继承、现实的关怀和未来的引领统一起来,全面体现了江苏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精神状态和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继往开来的文化延续性和开拓性,充分继承发展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涵,具有现实的张力与历史的深度,成为江苏人民高擎发展奋进的精神火炬,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江苏的具体体现,对于展示当代江苏人的新形象,推动江苏新一轮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观念发展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本文在研究最初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对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未成年人而言,短时间内完成大题量的问卷是不现实的,针对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课题组分别

设计了不同的访谈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面对面的交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分析、研究。

1. 基本现状

(1)在学习情感方面,被问及“是否喜欢学习”时,表示喜欢的小学生占到一半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学生存在讨厌学习的情绪。而初中的学生中回答喜欢学习的只有四成左右,将学习当作任务完成的占到一半,有百分之十的学生存在厌学情绪。显而易见,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厌学情绪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和过大的学习压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以升学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机制中,教育功利色彩过浓,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的内在兴趣、积极向上等情感以及健全人格等非智力因素的挖掘和培养。

(2)在生活习惯方面,对于是否会随手乱丢废弃物,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不会。对“坐车、买票时是否会排队”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一大半的学生是肯定的回答。但根据在学校及校外环境的观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表现出了乱扔垃圾、随意破坏公共设施、抢队、插队等不良行为,这种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不统一的表现,究其原因,是对道德行为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以及成人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在与学生的深入交流中,还发现初中学生里抽烟、喝酒等不良行为的发生率也比较高。

(3)在爱国情感方面,面对“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时,你是什么心情”的问题时,大部分小学生认为“很庄严、很神圣,自豪、骄傲”,只有个别小学生认为“没什么感觉”。而面对“假如受到外敌入侵,你会怎么做”的问题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学生表示要“积极报名参军保卫祖国”。

(4)在自主行为方面,当被问及“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你该怎么办”时,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回答“依靠自己努力,刻苦学习以取得好的成绩”,个别学生回答“烧香拜佛,求上帝保佑”,或者“找算命先生算一算”,这也说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对自己很有信心,自主意识很强。

(5)在被问到“如果遇到学习方面的困难,你与同学之间是否经常相互帮助”或者“班上有同学生病,落下了功课,你会主动帮助吗”等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都展现出了一颗助人为乐、团结同学的仁爱之心。

但在对“在公共汽车上看见老弱病残,你会让座吗”这个问题,回答“主动让座”的只占了一半左

右，“有可能让座”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余的学生则回答“有人让座我就让座”或者“装作没看见”。对“如果你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不少卡和钱，你该怎么办”时，一半以上的学生回答“归还失主或交给警察”，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很犹豫，最后还是上交了”，其余四分之一则是“最后没有上交”或者“没人知道就归自己”。显然，大多数未成年人都表现出较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但也有一些出现矛盾、犹豫，即行为相对于意识而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在被问及“如果你发现身边有小偷正在偷别人的钱包时，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一半以上的学生回答“装作没看见”，四分之一的学生说，“找个机会告诉他”，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回答“立即上前制止小偷”。在问及“如果你看到路上有老人摔倒，你会主动去搀扶吗”这一问题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成都回答，“应该扶，但爸妈交待过不能这么做，可以报警，或者离他远远的”。显然，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知行背离这种在成人社会出现的现象，已经逐渐地蔓延到未成人群体，但这种背离不仅有家庭影响的因素，更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通过访谈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规律，在小学四、五年级时表现思想道德水平较高，而在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呈现明显低谷，到了初中二、三年级又明显地呈现出回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社会主导思想道德体系较高程度的认同，他们并不主张完全脱离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个人绝对自由和纯粹的自我实现，而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整合和折中，兼顾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双向互利关系，具有了整合折中和理性务实的特点。他们试图在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与多种多样价值观念之间进行整合，因而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价值选择的痛苦，^{[4] (PP. 54-60)}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新时期“江苏精神”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融合有助于帮助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模式和行为规范。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校教育重智育轻德育。现代学校教育中，教师、家长们最关心的仍然是学生的成绩，智育教育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思想道德教育显得可有可无，高分和高的升学率是教师和家

长们追逐的目标，这导致学校更多的关注学习成绩，思想道德教育经常被忽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程的推进。

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我们应该明确，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既应该包括科学知识的传递，也应该包含思想道德意识和行为的传承。

(2)中小学校的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待改革。由于重智育、轻德育，中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大部分处于弱势地位，或者由主课老师兼任，教师专业性不足，教学形式单一，教材不规范，无完整的课程设置和规划，更没有相应的考核和监督。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应对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3)家庭教育重学习轻品行。家长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期望值都很高，在许多家长的心目中，学习好胜过一切，在如此家庭教育理念的潜移默化下，很多未成年人从小就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如：只会读书不知世间万事，孤陋寡闻；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关心他人，等等。^{[5] (PP. 176 - 179)}

(4)网络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不可小觑。访谈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喜欢上网，网络虽然在学业上和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量问题，但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不可小觑。同时网络文化的出现，对传统的学校德育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未成年人都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对新生事物充满兴趣，但他们大都身心未发育成熟，没有基本的分析、判断和辨别能力，在不良信息的引导下容易误入歧途。

(5)社会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一方面由于思想道德教育并不能够带来直接的效益，另一方面思想道德建设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出的成绩，所以在很多相关教育部门领导的心目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地位并不高，特别是在资金投入方面严重不足，往往只能依靠学校自身微薄的力量去维持。

(6)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建构。虽然学校和家庭的联系相比较传统的学校教育而言要紧密很多，但家庭与学校在很多方面，诸如教育价值取向、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学生

如何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社会教育是一种环境的氛围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不仅目标、内容、方法不确定、不系统,而且也缺乏硬性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随着城市社区化的进程逐步完善,如何发挥和加强社区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现实情况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小区建设中,我们很少能看到配套的社区教育和社区文化设施,如社区图书馆、文化娱乐设施等。仅有的几处社区教育中心也大多沦落为中小学生文化实习班和特长班的场所,收费赚钱。社区的未成年人教育被许多的培训机构以及“小课桌”、“小饭桌”所取代,既不能统一的管理和规范,也缺乏统一的指导和引领。显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对社区教育、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与管理,并进行有力的监控,加强组织网络、执行力度的保障,对学校、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才能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效果。

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

针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特提出如下对策。

1. 健全机制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和个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光荣艰巨的使命,应当认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2]要建设相互支持的系统:一是与学校协调一致的家庭支持系统;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支持系统。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大德育领域中的施教和受教双方的“互动”机制,并做到“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整体“联动”的有机结合。同时,要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以营造和优化道德互动的舆论环境,注意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并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实践相结合。^{[7] (PP. 187 - 188)}

首先必须依靠学校教育这个主阵地,改进思想道德建设课程的教学模式,从实践性和生活化两个角度提高思想道德建设课程的可操作性。

其次要重视家庭教育这个基础。由于家庭教育有着和学校教育不同的特征,比如家庭教育是随时随地的,是从学生的一出生就开始了的,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更加贴近学生的一言一行。所以,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帮助未成年人提高其思想道德品质,对辨别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爱国情感,确立远大的理想与抱负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应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采用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来促进未成年人的发展。

第三是要发挥社会教育的影响作用。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成长是在社会生活中完成的,随着日益现代化、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未成年人接受社会教育的渠道更加多样,因此集合社会的力量,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纯洁、净化的环境,包括为他们提供适合阅读的书籍,提供适合观赏的电影、电视剧、广播节目,创建专供未成年人浏览与交流的网站,特别是要加大对书籍的审查力度,同时严格禁止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有关暴力、恐怖、色情、吸毒、赌博等等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时,调查还表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体自我修养等因素都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因素中,社会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社会环境因素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影响变得日益复杂多样。而传统的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学校的作用,对家庭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十分忽视,比较强调通过教育的方式促进思想道德观念的发展,这样使得思想道德发展一直受到局限,因而有必要倡导一种新的全方位的社会教育观,把社会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形成和发展的主体,以此来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全面展开。

2. 营造氛围

“三创三先”是江苏精神的核心所在,把江苏精神纳入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来,就是将“三创三先”作为引领江苏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继承和发扬江苏精神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在前文已经列举了很多未成年人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究其根源,还在于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就像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潜在的教科书,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潜移默化地在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烙

印,并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体现出来。简单来说,社会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最主要的实践课堂,社会教育的正确引导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保障。因此,社会环境的优化和社区教育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充分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开展。

3. 教育引导

教育引导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江苏精神的深刻内涵去鼓舞未成年人,引导他们爱祖国、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伟大理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生活,不断促进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引导建立一个团结向上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把未成年人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良好的集体氛围,使同伴的认可成为未成年人前进的动力,让同伴关系成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积极影响力量。^{[7](PP. 63-64)}

在引导的过程中,要注意教育内容的选择。有的小学倡议的“大大方方问声好”活动,主动地向门卫叔叔问好、向食堂阿姨问好、向其他班级的老师问好,这种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又是一次很好的思想道德教育课;其次,要贴近未成年人的生活,如有的小学开展“能豆豆”活动,让学生在学校中管理自己的事务,解决学校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再次,要贴近学生的年龄段,学生们更喜欢立体的、形象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换句话说,道德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也不能局限于校园,如南京有小学开展的“我为青奥出份力”的活动,还有不少中学开展的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等活动,都产生了不错的教育效果。

4. 鼓励践行

思想道德教育不应局限于课堂的说教,简单教条式的说教让学生对思想道德课程很早就有了对抗情绪。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有组织有

计划地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走出课堂开展研究性学习,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和生产劳动,并形成系列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制。也可以尝试把义工服务纳入我国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必修课程。^{[8](PP. 29-3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未成年人的发展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国家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新时期“江苏精神”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探索学校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基础作用,以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为根本,努力创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 [1]郭奔胜,张展鹏,邓华宁.三创三先:“江苏精神”新定位 [EB/OL]. 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1月/7日/第001版.
-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S]. 中国教育报, 2004-03-23(1).
-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4]余双好.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发展特点的实证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5).
- [5]戴树根,王翠辉.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问题及对策探讨[J].社会科学家,2005(9).
- [6]杨邓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现状及趋势[J].湖北社会科学,2009(6).
- [7]熊孝梅.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与教育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6).
- [8]张金宝,翟晶,石秀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科学,2011(20).

(责任编辑 晨晓)

试论我国高校预算管理的现实诉求

章跃一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财务处,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预算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高校经济工作和事业发展的全局。目前,我国高校预算在体制、管理、技术、制度等层面上还存在着很多缺憾,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成功经验,根据高校的特点,进行深度的改革,加快预算管理转型,健全预算编制体系,完善预算执行机制,强化绩效考核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高校特色发展、自主发展。

[关键词] 高校; 预算管理;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43-05

预算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金的使用效益,关系到高校各项计划的完成情况和持续发展能力。然而,我国高校预算在体制、管理、技术、制度等层面上都存在着很多缺憾,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预算管理经验,根据高校特点,认真开展研究,进行深度改革,从而推进高校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促进高校特色发展、自主发展。

一、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彼此照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高校预算管理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系统,预算编制是工作基础,预算执行是核心环节,预算监督是重要保障。而在我国高校预算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预算体制不清、预算编制不精、预算执行不力、预算监督不严等问题。

1. 体制层面上的“越位”与“缺位”

(1)从预算管理的外部环境来看,政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越位”和“缺位”现象。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高校筹资渠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但资金来源仍然以财政资金为主。财政部门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共财政政策、

推进公共财政改革来约束和规范高校经费的使用方向及其比例,导致高校在预算编制、经费使用等方面缺乏自主性,高校特点被弱化,话语权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对高校是否按要求开展内部预算编制,是否依法依规使用经费,是否执行“三重一大”的要求,内部监管是否制度健全、措施到位,专项资金是否按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预算绩效考核是否落实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过程跟踪管理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政府部门在高校预算管理中的“越位”与“缺位”导致难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外部定期审计监督监管体系。

(2)从预算管理的内部环境来看,同样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在高校普遍存在着预算管理就是财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专门管理,预算编制、指标分解、预算执行、过程监管高度集中在财务部门,而相关业务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收支计划,且大多由行政部门直接编制提供,没有教职工的广泛参与;审计、纪检等监督部门也较少有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缺少第三方的稽核审计机制。这一方面造成财务部门包揽一切、越位管理,既是预算的制定主体,又是预算的执行主体,充当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收稿日期] 2015-07-18

[作者简介] 章跃一,男,江苏如皋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财务处处长,副研究员。

员”的双重角色；另一方面缺少全员参与，导致内部监督缺失。这种既没有预算主体参与编制和充分知晓的预算，又没有责任明确的可执行、可考核的预算，其管理过程难以进行具体有效控制。

2. 管理层面上的“依附”与“依赖”

(1) 依附型的预算管理模式。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决定了高校的预算管理始终是依附型的预算管理。高等教育资源由政府职能部门以行政化的方式配置，导致大学以行政化的方式获取资源，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和逻辑。大学成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成为实现国家即时目标的工具。^[1]高等学校依附于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相关要求而编制执行的预算管理，没有形成适应高校自身发展和现实管理所需的自主型预算管理。^[2]预算的编制原则（“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编制方法（“基数+增长”）、结构和内容体系、格式规范等千篇一律、要求一致，依附性特征明显，个性化特点缺乏。这种编制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束缚了高校自主管理和特色彰显。

(2) 依赖性的经费收入预算。当前，我国高校财务预算分别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构成，收入预算中国家财政是我国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由此导致了不少高校普遍认为预算管理的过程就是“要钱和分钱”的过程。而对如何科学地编制预算、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开源节流、勤俭办学等问题缺少思考、缺乏思路，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导致高校一些下属单位“年初争预算、年中加预算、年终超预算”现象的屡屡发生。

3. 技术层面上的“脱钩”与“脱节”

(1) 部门预算与学校预算存在“两张皮”现象。部门预算与学校预算应当保持一致，这是预算编制的基本要求。而事实上，不少高校先根据上级要求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类”、“款”、“项”编制部门预算，再根据学校办学实际按照支出用途编制学校综合财务收支预算。两者编制依据不同，编制方法有异，缺乏关联度，形成“两本预算两张皮”的现象。

(2) 预算编制与学校发展战略目标相互脱节。高校预算管理的过程，就是高校战略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3]而在当前我国高校的预算管理中，一方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短期行为，

处于年度事务性、低水平的预算收支平衡和保障重点、急需的支出预算管理思路，极少具有应对学校的长、短期发展目标进行整合的思想，^[4]导致预算编制战略性脱节；另一方面，我国高校都制定有五年事业发展规划，但在制定过程中往往不重视发展规划中的财务可持续保障问题，忽视了发展规划中的战略目标实现举措与高校预算管理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预算管理在学校资源配置与控制中的地位。^[5]预算缺乏可行性论证，编制的预算成了“数字游戏”，导致事业规划缺乏经费保障基础，严重影响了预算的可操作性和执行的实效性。

(3) 预算执行与工作目标达成缺少挂钩机制。预算执行和监管一直是不少高校的短板和软肋，预算意识淡薄，预算执行乏力，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重预算分配结果轻预算管理过程，随意支出预算资金，追加预算现象普遍，年底突击花钱现象严重，而对经费项目执行结果与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缺乏严格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追踪问效机制，致使资金浪费严重，使用效益不高。

4. 制度层面上的“虚化”与“弱化”

(1) 制度制订的“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可操作性是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不少高校预算管理制度宽泛、笼统，缺失、漏洞较多，操作性不强。有的虽有预算编制流程的规定，却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有的虽有预算执行的要求，却缺少相应的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的内容；有的没有对预算编制、决策、执行、调整、监督、考核等作相应的规定，导致预算管理职责不明确、权力不到位；有的没有预算、决算信息公开的要求。这样的预算制度必然导致其功能的失调和管理的失常。

(2) 制度执行的“弱”。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制度执行的不到位、不作为。目前，很多高校在预算下达之后无法进行有效的执行、控制、监督和评价，随意变更预算，频繁增加预算，使得预算管理流于形式，预算制度形同虚设。其主要原因，有人的因素，从决策者到管理部门执行意识普遍淡薄，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掺杂有较多的人为因素；有制度本身的缺憾，执行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严重影响了高校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国外高校预算管理的成功经验

在预算管理方面，国外高校积累了非常成功

的经验,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色,对改革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 严密的预算管理体系

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是国外高校预算管理的核心内容。如美国的高校董事会、校长、预算管理职能部门在预算管理中都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在其预算管理职能部门还分别设置有专门的预算办公室和控制办公室。预算办公室专门负责学校预算性资源的管理,即通过科学预算及时向学校管理部门提供准确而有意义的预算和财务信息;为学校提供财税、财务政策和财务管理与分析等的咨询服务;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支持学校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活动。控制办公室负责学校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控制和评价等工作。^[6]澳大利亚的高校除成立有财政委员会、预算执行委员会外,还有预算建议顾问委员会。委员会由分管预算管理工作的副校长、各学院教授、财务处长和教师代表组成,负责向分管校长和执行委员会提出学校总体预算政策与结构、目标规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和预算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等方面的意见和改进意见。英国则于1992年专门成立了非官方机构的高等学校拨款委员会 HEFCE,负责将财政拨款经费分配到各高校;并在高校内部,实行校、院、系三级预算管理模式,由校长、院长、系主任分别负责各自受托的财务管理范围。

2. 多元的经费筹措方式

美国高校有比较灵活而广泛的筹资渠道:一是政府拨款。高校经费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持续在4%以上,占高校收入的50%;二是社会捐赠。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私人机构向高校捐资办学,美国法律规定任何机构或个人向教育捐赠都可以抵扣所得税;三是学校集资。美国很多高校都设立了专门的筹资机构——集资办公室管理筹资事务,校董事会也是其学校筹集资金的机构;四是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美国政府允许高校发行债券,购买高校发行的债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7]日本国立大学经费来源包括高校的各项财政拨款和学费、入学金、审查费等学校自筹资金,其中政府资助占90%;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和社会捐款。英国高校除政府拨款外,还鼓励高校充分发挥自有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国家科研经费,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吸引企业对高校的经费支持。

3. 严格的预算编制程序

国外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高校,都有非常严格、规范的预算编制程序。预算编制的过程也是学校规划事业发展的过程,因此在美国高校预算编制程序相当严格。在编制的时间安排上,美国高校预算年度一般为每年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而编制预算要提前一年,即每年4月开始编制到6月州长批准下一年度预算。这样,既便于各部门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预算的编制、论证、审核和审批,也便于员工广泛参与。预算的编制公开、透明,编制的预算全面、合理。新西兰高校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都要经学术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再提交校委会通过方可实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高校预算需在全校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根据上一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测收入,编制综合财务计划的初步方案,经校董事会审定后,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4. 合理的预算经费分配

美国高校预算经费的分配比较科学合理,预算分别按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来进行。经常性预算主要以高校所开专业的学分小时的单价为标准计算,同时兼顾招生的人数。建设性预算以项目形式进行申报,州议会要根据财政状况和高校实际来审批,在建设性预算中需优先保障学校当年优先发展和重点的保证项目。^[6]澳大利亚、英国高校预算资金配置的主体是学院,而在预算资金配置中非常注重资金分配与工作体系挂钩,给院长和系主任以充分的自主管理权。德国高校一般实行集中管理模式,经费主要以各系的专业、学生、教授数量等来分配。

5. 健全的预算监控机制

国外高校对预算的控制都有一整套健全的行之有效办法,如美国高校对支出实行严格的预算控制,不得超预算支出、使用经费。英国、德国、荷兰高校规定,凡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年度预算,谁也无法调整或变更;如需调整预算,需经校务委员会研究批准。英国高校还实行严格的财务“问责制”——经济责任制或目标管理制,各部门每年年终时都要提交工作总结报告,以考核其是否完成承诺。

三、我国高校预算管理的现实诉求

针对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学习借鉴国外高校预算管理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高校预算管理进行改革是形成科学有效的高校预算管理

模式的现实诉求。

1. 加快预算管理转型, 推进高校自主发展

(1) 加强高校预算建章立制工作。我国高校预算的主要法律依据为《预算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而缺少专门的针对高校预算管理的行政法规。笔者认为, 应该由国务院制定并发布, 或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拟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类似于高等学校预算管理的行政法规, 对高校预算的编制原则与程序、内容与方法、执行与监督, 预算经费的下达与管理, 绩效考核、问效与奖惩措施, 以及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的职责权限等作出明确规定。

(2) 尽快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英国政府专门成立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是一个非官方机构, 由其负责把财政拨款经费分配到各高校。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的设立也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决定高校预算经费方面应有充分的话语权。

(3) 改革现有的高校财政拨款模式。我国高校依附性预算管理模式和依赖性经费收入预算有很多弊端, 不利于高校的特色发展和自主发展。借鉴国外高校预算管理经验, 应改革现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 将高等教育经费按其功能分为四类: 基本运行拨款、特色办学拨款、竞争性拨款和发展性拨款。这样, 有利于“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 引导高校合理定位, 克服同质化倾向, 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争创一流”。

(4) 不断健全高等教育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经费管理体制。在确保财政拨款逐年增加的情况下, 应该对高校筹措经费的情况加强考核, 认真分析我国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 认真研究我国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及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指标设计的内容、评价标准和计分方法, 构建科学、可行的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2. 健全预算编制体系, 推进预算科学管理

(1) 优化预算编制方法。高校的预算方法主要有零基预算、增量预算、弹性预算、滚动预算、固定预算、定期预算等, 使用比较多的主要有零基预算和增量预算。如, 编制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经费支出, 采取增量预算; 编制专项设备购置和其他

专项经费, 采用零基预算。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 每年学校的预算通常都是在三年滚动预算的基础上, 同时留有一定数量的经费作为应急经费和补充经费。这种预算不仅编得早、编得细, 而且论证充分, 便于严格执行。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根据事业发展规划, 正在积极探索零基预算与滚动预算相结合的预算方法, 形成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战略目标预算。

(2) 细化预算编制程序。我国高校预算编制在上一级财政管理层面实行了严格的“二上二下”编制程序, 但在学校层面就被人为的简化了, 编制的预算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我国高校的内部预算编制应该借鉴国外高校成功做法, 细化编制程序, 采取“二上二下三环节”的编制程序, 即在学校内部层面上除要实行严格的“二上二下”编制程序外, 应注重三个环节: 一是分析和预测环节。在编制本年度预算前, 应对以前年度学校的收支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认真分析, 对本年度学校总体收支规模进行细化分析和预测; 二是公示和公布环节。公示是在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年度预算控制数(“二下”)后, 财务部门汇总上报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前, 将本年度预算经费校内安排方案通过校园网进行公示, 再次听取广大教职工的建议和意见; 公布是将经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的校内预算方案, 通过文件形式或校园网进行公布, 实行“阳光编制”、公开预算, 以便让各经费控制部门有计划的使用经费, 接受公众监督。三是考核和奖惩环节。考核和奖惩是预算编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要把上一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作为安排本年度经费的重要依据之一, 预算执行好的, 应该有所奖励; 反之, 应有罚的措施, 充分体现责、权、利、绩(效)的相互结合。

(3) 量化定额支出标准体系。各项支出要在符合国家政策和学校分配制度的前提下, 制定统一的编制依据和合理的定额指标, 应收尽收, 该支则支; 同时对日常公用支出等实行指标量化管理。这样, 使各项预算编制有根有据, 经费支出有序有效。

3. 完善预算执行机制, 确保预算管理规范

(1) 建立预算执行预警机制。预算是否有效执行, 关键在过程控制。学校财务部门应充分承

担起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建立起上通学校决策层、下联各经费使用单位的信息传递与反馈系统。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对学校和各下属单位资金流向、使用进度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完善财务管理系统,一旦发现有超预算、无预算用款现象,及时发出预警提醒信息,严把经费支出管理关。

(2)健全预算执行责任制度。学校要有一套便于操作、行之有效的预算管理办法。学校领导应强化预算意识,带头执行预算,带头维护好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不断完善财务预算管理人员、经费使用单位负责人岗位责任制,强化“收支两条线”、经费审批“一支笔”制度,把对资金的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从而建立起制度规范事、责任约束人的长效机制,为预算的有效执行提供保证。

4. 强化绩效考核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建立科学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绩效指标体系 (performance indicators 或者 performance indicator system)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高等教育面临严重挑战的背景下,开发的一种特别适用于测量办学效率和效益的评价体系。^[9]绩效已经越来越成为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重要理念。我国新《预算法》也将“讲求绩效”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原则,且明确预算的编制应“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编制,实行绩效与预算挂钩。贯彻绩效理念,必须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科学地建立指标,科学地收集数据,科学地计算指标值,科学地设置指标权重。^[1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面评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年度预算考核评价与校长长远战略目标相结合。

(2)建立合理的预算管理绩效考核机制。考核应注重“三性”,即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每项经济活动、每笔经费支出,是否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效益性要进行考核;应兼顾“三个方面”,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项目投资的评价;应体现“三方结合”,即责、权、利的结合,将预算的编制、执行情

况与干部考核任用相挂钩,与预算管理单位和教职工的经济利益相挂钩,形成预算管理单位、教职工和学校责、权、利经济利益共同体。

(3)建立完善的预算支出追踪问效制度。突出绩效理念、强化资金使用的追踪问效是未来财政管理的重要趋势。而支出绩效则是编制、执行、监督“三位一体”预算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强化预算支出追踪问效制度,重点是要经常检查和定期评估预算执行过程中经费的使用情况和资金的主要流向,经费的支出与预算的编制是否相符,是否达成了既定的目标,资金的流向是否有偏差现象,以此作为评价预算管理单位工作的重要依据,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经费下达的重要参考。

[参 考 文 献]

- [1]王英杰.试论大学的领导与管理:孰重孰轻[J].江苏高教,2014(5).
- [2]李现宗,毕治军,颜敏.高校预算管理转型研究[J].会计研究,2012(12).
- [3]刘玉光.高等学校绩效预算管理问题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 [4]李瑛.关于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的研究及其建议[J].生产力研究,2012(5).
- [5]叶青松,赵娟,陆莹.高校预算管理改进的三维视角:组织、技术和制度保障[J].教育财会研究,2014(1).
- [6]何家臣.国外部分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经验与启示[J].人力资源管理·学校版,2009(12).
- [7]王珺.浅议美、英国高校财务管理特点及启示[J].企业导报,2011(13).
- [8]张晓岚,吴勋.国外高校预算绩效评价研究的背景、现状与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9]刘国斌,冀晶炎.基于 BSC 和 KPI 的高校绩效预算评价体系构建[J].会计之友,2015(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高校实施《内部控制规范》面临的困难与对策研究^{*}

毛成银 吴云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从2014年1月1日起,《内部控制规范》已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实施,这对于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事业单位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在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后会面临什么困难呢?为此,笔者经调查研究,对各类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高校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 《内部控制规范》; 高校; 实施; 困难;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48-05

财政部于2012年11月29日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以下简称《内部控制规范》),确立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由此拉开了在高校全面、系统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序幕。为配合内部控制规范于2014年1月1日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顺利施行,财政部、教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宣传和动员活动。其中,财政部于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动员视频会;紧接着,教育部于当年12月5日印发了《关于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财函[2013]142号)。从一文看出,无论是财政部或是教育部对内部控制规范在高校范围内尽快施行均寄予了殷切期望。

时至今日,内部控制规范已在作为我国事业单位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正式实施了将近一年时间,具体执行情况怎样?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此为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

一、高校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效果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笔者通过对大量资料分析,发现高校内部控制规范的具体执行情况并不太理想。尽管财政部、教育部对此事高度重视也寄予厚望,但各地在具体执行层面的工作还没到位,除组织少量培训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出台相应实施细则、操作办法、时间要求等具体举措。由于缺少执行层面的组织保障手段,内部控制规范在高校范围的施行可操作性并不强,这就导致了其实际执行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为此,笔者对内部控制规范在高校全面施行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1. 制度设计缺陷

由于是首次发布,内部控制规范毕竟未经实践检验,自身存在缺陷或瑕疵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 文件发布形式未能体现权威性

所谓“试行”也就是说还未成熟,表示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态度有所保留,对严密性不足的可能性留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 [基金项目]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高校内部控制体系构建”(项目编号:YK12-42-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预算法视角下我国高校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SJA008)。

[收稿日期] 2015-07-09

[作者简介] 毛成银,男,云南保山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处长,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吴云飞,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会计师。

的余地。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会让部分高校治理者对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误以为这项规范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2) 关键术语的定义缺少科学性

以第三条规定为例,文件中的原文表述为:“本规范所称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制定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1]这种表述既未能突出内部控制的“过程”属性,又忽视了主体“单位”中“人”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占主导地位的“非经济业务”的重要作用。这与 COSO 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存在较大程度的不一致性,根据 COSO 的原文定义,应该表述为:“内部控制是一个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旨在为经营的有效性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2]。由 COSO 的定义,内部控制应理解为“一个过程性控制”,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或一种特殊情形,应该是贯穿整个主体活动的全系列行为。事实上,关于内部控制规范的定义,我国也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2008 年,由五部委联合下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早已把内部控制明确为“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而本次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规范却未能借鉴其成功经验,在以人为本的时代,忽视“人”的能动作用,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

(3) 业务覆盖范围不全面,留有死角

内部控制规范的实施目标是通过建立并健全“所有人员均应接受监控,所有业务均需接受全过程控制”的管理制度,最终保障组织的运营安全。

根据这一实施目标,内部控制规范应该同时覆盖人员和业务这两个方面。但本次发布的内部控制规范却未能将“行政事务”纳入管控范围,这应该是一个性质比较严重的监控死角。

有鉴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行政事务”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我国高校普遍以教学、科研、人事、招生等非经济类业务为重要业务,若在“内部控制规范”中将这些业务排除在外显然不合适,甚至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类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频频揭露出来的高校经济腐败案件已经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曾在媒体中严正指出:“近年

来,高校腐败案件有增加势头,以北京为例,最近三年,查处案件近一半涉及招生、人事等问题”。笔者认为,缺少内部控制的单位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随时都有沉船的危险,高校内部控制不应留有死角。

(4) 严重忽视成本效益原则

尽管有些专家坚持认为:“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评价财务管理的合法、合规和财产安全,可以由预算实现控制目标”。在实务操作中,却存在一些不适用性:一是难于给出具体可行的评价指标;二是受人力资源和评价专家专业胜任能力的限制,导致实际的评价操作过程往往只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以预算执行率为例,实务操作时往往只会去关心“花了多少钱?”、“是否符合制度规定?”、“是否与当初预算相符?”等简单直观的评价内容,而对“花钱是否值得?”、“花钱的效果怎样?”、“效益产出怎样?”等关键评价内容却因为难于操作而被忽视了。

高校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若不重视成本效益原则,再加上评价制度的不完善,将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在预算申报的时候就刻意造假,自立项开始至结题的整个项目周期中始终处于带病运作状态,而以现有的评价制度仅通过财务记录是无法发现其中的隐患,必然因此造成财政资金的大量流失和浪费。由当前已经揭露出来的诸多科研腐败案件充分地说明了由此类问题引发不良后果的严重程度。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在内部控制规范中引入成本效益原则,才能根本解决高校项目资金的合理利用问题。

2. 忽视要素的重要性,丧失有效推进的源动力

财政部 2011 年 11 月 18 日印发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对内部控制要素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表述如下:“单位内部控制的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3]而这一非常重要的规定却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印发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 号)中被删除了,甚至在全文范围内都无法找到“要素”两字。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高校到底有没有必要设置内部控制要素”之类的疑惑。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高校等行政事业单位必须设置内部

控制要素。以“内部环境”要素为例，内部环境是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的总称，包括“治理职能”和“管理职能”。中国古代哲人晏子曾以“淮南为橘”和“淮北为枳”为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环境因素对事件发展最终结果的重要作用。美国 COSO 委员会在《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一文中也特别强调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原文表述如下：“内部环境为主体中的人们如何看待风险和着手控制确立了基础。所有企业的核心都是人——他们的个人品性，包括诚信、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以及经营所处的环境”^[4]。这两个事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却殊途同归地说明了内部环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包括内部环境在内的各类内部控制要素是内部控制的基石，更是有效推进内部控制工作的发动机。而内部控制规范若屏蔽了控制要素等重要内容，必然导致源动力的丧失，严重阻碍其推广实施进程。

3. 前期准备严重不足，具体措施不尽周详

为贯彻落实内部控制规范，财政部和教育部均强调了“治理”的重要性。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 2013 年 7 月 19 日的实施动员视频会上发言强调：“内部控制既是行政事业单位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又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是行政事业单位治理的基石”。紧接着，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的高校财务工作会议上也以“深化改革、科学理财、推动直属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为题做了专题报告，给高校内部控制规范出台和施行做宣传和动员。

上述两次重要会议之后，教育部随即下发了《关于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财函〔2013〕142 号），借此推进内部控制规范的具体实施工作。但这份通知明显准备不足，既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具体措施和实施节点计划。在缺少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内部控制规范”的具体落实必将成为“空头支票”，或许高校治理者并不是真正有意把“建立内部控制规范”当作第一要务。

二、推进高校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

1. 提升高校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高校是培养人才、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及文化传承的创新基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高校发展的关键要素是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而内部控制更是促进管理水平提升的核心价值所在。借用生物学术语，内部控制好比是高校的“免疫系统”。内部控制不仅是高校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更应该理解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管理制度，也是确保高校规范化治理的基石。推行内部控制规范对提升高校治理水平有如下几点重要意义：实施内控规范，有利于高校推动廉政建设；实施内控规范，有利于提升高校内部管理水平；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有利于高校从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向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转变。因此全面推行内部控制规范是提升高校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2. 加强教育经费监管、防范风险的需要

我国教育经费占 GDP 4% 的目标已于 2012 年落实到位，随着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加，高校经费和资产规模逐年扩大。伴随而生的是经费管理任务的加重，教育经费如何管？怎么用？全社会都在高度关注：“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人民群众不可能满意；有了教育经费，如果用不好，也不可能让人民群众满意”。近年发生的高校腐败案件屡屡被曝光，由此暴露出当前高校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由内控不健全导致的负面案例严重损害了高校的纯洁性，直接影响了高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央纪委和教育部已经充分注意到了高校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正着手通过多种手段加强教育经费的有效监管，其中在高校范围内全面推行内部控制规范是准备采取的最主要措施。为促进高校内控制度建设工作的快速推行，两部委高官纷纷为此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在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高校必须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工作，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教学、科研、后勤等业务工作和管理流程之中。”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高度重视高校内控制度建设工作并因此专门做出重要批示：“学校内控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是有效预防并减少高校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必要手段”。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在内部控制规范动员会上的讲话更是特别强调了高校内控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抓住内部控制规范正式施行的良好契机，把学校内控建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从领导们的讲话精神中，不难体会到高校内

部控制制度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全面推行内部控制规范是加强教育经费监管、预防高校经济犯罪的必然要求。

3. 达成“长效治理、标本兼治”目标的现实需求

内部控制应属于事前、事中的主动监督与控制，是预防性措施，有利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微杜渐，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而外部控制是事后监督，是补救措施，往往是在已经发生严重后果情况之下的被动之举，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也很难挽回。根据这一分析，不难看出内部控制的作用与外部控制相比实际上更为重要。而现实中发生的若干行政事业单位重大经济腐败案例，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结论。自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对各类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空前加大，坚决彻底、不留死角。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积极参与各类经济腐败案件的曝光与报道，对净化包括高校在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作风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但这些雷厉风行的举措毕竟是外部治理、外部控制手段，事实上只是起到了短时间的震慑作用，只是治标未能治本，并不能保证能起到长效治理的效果。值得指出的是，国家为此付出了非常高昂的治理成本。

若要真正实现对经济腐败、违法违纪行为的“长效治理、标本兼治”目标，同时又无需付出过高的社会成本，唯有积极推进内控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形象地把内控制度比喻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番讲话精神中充分肯定了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支持了“唯有制度才能保证长效性”的观点。

由此可见，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是实现对高校经济腐败、违法违纪行为的“长效治理、标本兼治”目标的现实需求和必然选择。

三、有效推进高校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1. 以会计控制为突破口

尽管现阶段内部控制的目标已呈多元化趋势，但作为内部控制最基本实施手段的会计控制在内控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动摇。以会计控制为基础逐步向管理控制方向延伸是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构建与实施的现实选择。这一观点在财政

部会计司副司长刘光忠的发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刘司长曾发言指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构建与实施要以会计控制为基础”。

高校的内部控制涉及到行政事务、教学与科研、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基建、后勤、人事、财务、审计等多方面，若同时考虑内部控制环境还应涉及大学治理结构、校园文化等内容。若完全依赖校长的管理职能，通过产生一个面面俱到的全盘方案，同时号召全员参与，借以实现对上述各项工作的全方位内部控制目标，其实施难度之大不言而喻。由财政部印发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财会[2001]41号），应该为高校有效推进内部控制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两个文件均以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为主，同时兼顾与会计相关的控制，非常贴近高校的实际情况。在当前情况下，高校应以会计控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行之有效、势在必行的。

2. 以财务信息公开为契机

基于“利益归全体股民所有”理念，上市公司的运营管理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为防止欺诈股民的不良行为，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在发布年报时，必须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证监会的这一做法对加强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督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可以被引入高校的内控制度建设中来。高校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是纳税人的钱。资金如何被利用？做了哪些事？纳税人应该有权知道，钱花得是否合理也需要接受社会监督。为切实做好财务信息公开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可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的通知》（教财函[2013]96号）和新修订的预算法，作出如下硬性规定：高校在公开财务信息时，必须同时披露专业评定机构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公开财务信息也许是倒逼高校建立、健全内控制度的有效方法。

3. 以内部牵制为基础

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内部牵制”原则非常重要，是有效实施组织机构控制及职务分离控制的理论基础。“内部牵制”原则明确规定了“任何个人或部门不能单独控制任何一项或一部分业务权力”的组织分工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各项业务通过正常发挥其他个人或部门的功能实现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内部牵制”原则因此可以理

解为内部控制中的精髓,是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进行流程设计的指导原则,也是对主要控制节点加强监督的最高准则。在高校构建和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显然不能忽视内部牵制的基础作用。财政部张少春副部长非常重视“内部牵制”原则的重要意义,他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动员视频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高校内控规范实施过程中,应该把制衡机制嵌入到各项管理工作中去,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近年来,随着风险管理、信息化等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认为“内部牵制是内部控制的初级阶段”,对“内部牵制”原则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错误观点,即便是风险管理、信息化理论也必须牢牢建立在内部牵制原则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严密的内部牵制处理程序,才能确保各项业务得到正确、完整的执行。同时说明“内部牵制”原则并未过时,而且是内部控制系统中永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制定高校内部控制规范等指导性文件过程中,还是在编制《高等学校内部控制手册》等具体实施细则过程中,均必须明确体现“内部牵制”原则。

4. 以提高认识为推动力

内部控制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高校的各项管理工作离不开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活动全程贯穿了高校日常管理过程的始终。与此同时高校治理者也应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任何形式的内部控制都不是万能的,其自身也会存在局限性。即便是再完美的内控制度也只能提供一种合理保证,不可能预见所有风险,更不可能实现对所有事情的全面监控”。这就要求高校治

理者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以提高认识为推动力,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除认真贯彻内控制度之外还应该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跟进并做出适应性调整,以获取“持续改进、与时俱进”的良好发展效果。

内部控制是高校内部治理的基本要素,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高校范围内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对防范风险、消除内部隐患、提高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本次印发的内部控制规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有待改进和提高,但瑕不掩瑜,全面实行内部控制规范对高校而言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各高校应借着内部控制规范施行的重大机遇,充分认识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性,以实际行动尽快建立、健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控制度,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内部控制目标值,最终为高校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EB/OL]. www.mof.gov.cn.
- [2] Tread way 委员会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征求意见稿)(财会便[2011]68号)[EB/OL]. www.mof.gov.cn.
- [4] 乔春华. 高校内部控制研究[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 [5] 毛成银,丁鸿利,鲁忆. 我国高校内部控制体系构建[J]. 财会通讯,2013(11).

(责任编辑 光 翟)

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 SWOT 分析^{*}

张英花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 泰州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后目前进入发展的瓶颈期。运用 SWOT 分析方法, 对其内部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 提出泰州高等教育发展由稳定型向发展型战略; 政府层面需要高度重视, 系统规划, 科学管理; 高等教育系统自身要通过合理定位、明确思路, 优化资源配置, 打造优势学科, 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及寻求多种支持来转化劣势, 抓住机遇, 提升内涵, 推进泰州高等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源作用的更好发挥。

[关键词] 泰州; 高等教育; SWOT 分析;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53-05

当今世界, 高等教育已由社会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 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中, 随着由中央政府管理为主体向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体的转变, 我国高等学校布局不断向地级市延伸, 使得地方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自 1996 年组建地级市以来, 泰州高等教育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但相比较江苏省其他地区而言, 泰州高等教育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当下, 泰州高等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之后的一个瓶颈期, 如何推动泰州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发挥高等教育这一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作用, 是实现泰州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良性互动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泰州高等教育发展竞争力的 SWOT 分析

来自麦肯锡咨询公司的 SWOT 分析目前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规划分析工具, 也称为态势分析法, 是通过对组织内部、外部条件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概括, 分析组织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的一种战略因素综合分析方法。它有助

于组织全面认识自身的实力及外部环境, 进而把资源和行动聚集在自己的强项和有最多机会的地方, 选择组织的最佳发展战略。因此,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美国学者韦里克提出后, 这一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组织的竞争对手分析、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

1. 优势分析

(1) 区位优势

泰州位于江苏省中部, 处在沿海与长江“T”型产业带的结合部。境内水、陆、空纵横全境。长江、淮河、引江河水上交通发达, 并有江阴和泰州两大跨江大桥沟通南北, 泰州港跨入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亿吨大港。高速公路、铁路、航线联通内外。泰州在江苏经济和社会布局上起着一个苏南向苏北传承、传递、传导的纽带作用, 既承接产业转移, 又承接科技创新, 是江苏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传递带。2010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按照区域总体布局的要求, 将八个核心城市之一的泰州定位于“长江南北联动发展的枢纽”, 这意味着泰州成为长江南北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若“十二五”规划中的沪泰宁城际铁路按计划建设通过, 在长三角一体化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泰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1SJD880026)。

[收稿日期] 2015-07-05

[作者简介] 张英花, 女, 河北唐山人,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与跨江联动战略之下,方便快捷的交通将使泰州的区位优势更为突出。

(2) 经济增长优势

近些年来,泰州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这不仅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而且也使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成为必需。以近四年为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依次为2422.61亿元、2701.67亿元、3006.91亿元、3300.89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2.1%、12.5%、11.8%、10.8%。三次产业结构依次为7.2:54.0:38.8、7.1:53.1:39.8、6.8:52.3:40.9、6.4:51.3:42.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装备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材料与制品业、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业五大优势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集约化的转型升级初见成效,逐步形成了“一城一区一园一带一块”的产业空间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电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3年、2014年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38.5%和40.2%。^[1]近两年,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加快,2013年、2014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3349.61亿元、4001.35亿元,分别增长23.7%、17.8%。其中,医药城产城一体化的增长极效应已初步显现。

(3) 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

近20年来,泰州的高等教育历经了以本土升格为特征创办高等专科教育的初创阶段、以外引办学为特征创办本科院校的快速发展阶段、以筹建公办本科院校为特征的结构调整阶段三个时期,沿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从量到质的轨迹,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目前,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已初具规模,截至2014年底,在泰高校共有七所:泰州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四所本科学院,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两所专科院校。共设有63个院(系)、126个本科专业、112个专科专业,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学生55275人,成人高等教育专科在校学生8285人。具有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不含泰兴市)包括了函授站、现代远程教育学习中心、中央电大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弘成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等多种教育机构。初步形成了专科、本科两个层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两种主要类型,全日制高等教

育、业余成人教育两种主要形式,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两个教育阶段并重的泰州高等教育格局。目前几所高校的专业设置已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12个学科门类。近些年,随着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已有师资的培训提升,高校教师队伍结构有所改善,整体素质有所提升。同时,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在原有两所依托名牌高校建立的民办本科院校的影响下,随着省管高校——泰州学院的设立,更多熟悉高等教育工作的管理人员加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中来,高等教育管理水平也在逐步提升。

(4) 发展图强的意识觉醒

自建市以来,泰州就坚定不移地“举全市之力”,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泰州区域发展的一项重要大事来抓。从无到有、从专科到本科的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泰州人民深切体会到了高等教育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在“借船出海”“借梯登高”的地方政府与名牌高校联合办学模式下,承载了泰州人民教育梦想的泰州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具有一定规模之后,目前的泰州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到质量提升阶段,如何不断加强自身高等教育办学实力成为当下泰州高等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泰州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与需求,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在泰州区域发展过程中,泰州现代产业支持体系、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智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需要经由高等教育培养;和谐社会的构建,更需要泰州高等教育以高层次的文化传承服务于泰州地区的文化建设。在苏中、苏北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之际,如何围绕泰州转型升级,突破高等教育发展现有瓶颈制约,提高泰州高等教育质量,在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中站稳、站好,成为推动泰州综合力提升的核心力量,是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劣势分析

作为发展历史不足20年的高等教育后发地区,泰州高等教育发展中还有着诸多的不足。

(1) 办学经费紧张

尽管近些年泰州的经济在迅猛增长,但相比较苏中其他地区而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教育经费总量不充足。政府财力薄弱,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有限,不仅导致高校办学所需要的教育资源的保障性缺乏,还会影响地方高校的生源和就业,导致高等教育的“入口”“出口”

不畅,这些对教育质量的提升都极其不利。

(2) 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偏低

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泰州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属于江苏高等教育的“洼地”。表现为整体规模偏小;办学层次偏低;缺乏高等教育管理及高校办学经验;管理体制不健全;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低水平重复设置现象突出;师资力量不足,高层次、有影响的师资匮乏等。泰州高校在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建设、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比例、科研成果获奖与转化率、学术论文质量比等方面均落后于周边地区。泰州高等教育总体竞争力明显不足。

(3) 高校综合实力弱

除外引的民办本科院校外,泰州的其他几所高校均是脱胎于中等专业学校,是在泰州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进程中升格的高等学校。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学校自身,都是在摸索中办学,各方面起点较低,再加上疏于对大学理念及大学制度的理解运用,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办学理念及定位、学科、专业、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缺乏长远的整体的眼光,导致高校办学缺乏特色和品牌效应,高校影响力较弱。

3. 机遇分析

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江苏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提出,都为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 苏中苏北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中提出“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强调发挥“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高水平大学对苏中、苏北高校的辐射牵引作用,同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要不断加大对高职院校的对口支援力度。对沿江沿海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增强其服务于沿江沿海开发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能力。为更好统筹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江苏实施了苏中、苏北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在培育高等教育新的增长点时给予优先考虑,优先扶持苏中、苏北地区新增立项建设的博士、硕士学位单位,在高校的招生、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及科技平台和项目对苏中、苏北地区予以倾斜。重点支持一批有特色的苏中苏北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综合实力的同时,加强苏南和苏中、苏北的结对帮扶、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实施区

域高等教育共同发展。^[2]

(2) 泰州经济转型升级

2012 年 10 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泰州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的出台是泰州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明确了泰州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而且还明确了对泰州转型升级的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提供优越的财政资金、土地等的政策支持,支持泰州创建国家级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2013 年 6 月,《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苏中融合发展特色发展提高整体发展水平的意见》中又根据苏中三市的区位条件、发展特点、比较优势和战略选择,明确泰州努力在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上取得重要突破,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建设现代特色产业名城。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发展特色产业,必须依赖科技的支撑、人才的支持,这为高等教育拓展专业、优化课程设置提供了良好时机和广阔空间。

(3) 学习型社会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更多地需要地方高校发挥作用,也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广的人群、空间,打开了广阔的继续教育市场。

4. 威胁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人才吸引力弱

目前,财政投入是泰州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进而制约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前往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使得高等教育投入随着毕业生的选择而无偿转移到发达地区。

(2) 高校间竞争的加剧

时下,高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总体实力强的名牌重点高校因其名牌效应,在办学资金的获得、高层次人才的吸纳、科研项目的获取、毕业生就业上更有优势,更易吸引大量的生源,形成良性循环圈。相比周边高校而言,泰州各高校的总体竞争力明显不足。

(3) 招生压力与就业压力并存

自2008年开始,高考生源数量下降,高校面临招生压力,这种压力已从专科迅速扩展到本科层次。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在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在逐年扩招与待业大学生累计数量不断增加的综合作用下,大学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挑战。

二、泰州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SWOT分析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在全面把握组织内部优劣势及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基础上,对具体的组织机构的综合环境进行系统的分析,本着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利用机会、化解威胁的原则,制定有利于组织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

基于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内部优势、劣势,以及外部机遇和可能威胁的分析,尽管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劣势较为突出,但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地区,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机会将多于威胁,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资本借鉴、制度借鉴及变革成本低等后发优势,宜采用由稳定型向发展战略,积极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环境条件,克服、转化自身劣势,巩固扩大优势,按发展战略来推动和实施高等教育系统和各高校的跨越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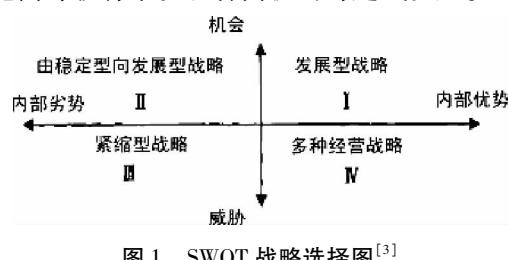


图1 SWOT战略选择图^[3]

1. 政府层面:高度重视,系统规划,科学管理

江苏省政府应该在对本省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和挑战等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基础上,统筹规划本省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勾画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在省域范围内进行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广大人民对高质量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专项资金,以支持、保障泰州等高等教育后发地区发展高等教育所需经费的合理投入。同时,更需要加强对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管理与指导,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多个层面扶持其高等事业发展。

泰州市政府要全面认识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将高等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

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立足现实、着眼长远、面向社会、服务地方的原则,结合构建“1+N”产业体系结构的规划,对本地高等教育发展进行统筹,确定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思路,为办好本地高等教育掌好舵。同时,还必须强化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准公益性的认识,切实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建立公共财政资助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依法广辟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保障并促进地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如,倡导多种方式的捐资和出资办学,鼓励、扶持民间社会力量办学;注重开发国内外各类资源,积极鼓励包括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多种社会力量及个人以联合或独立的形式参与到高等教育的举办中。^[4]支持、配合高校实行高水平人才引进与培养战略,为泰州高等教育的内涵提升提供人才支撑。

2. 高教系统自身:转化劣势,抓住机遇,提升内涵

面对挑战,泰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应对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外部环境保持清醒认识,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在向高等教育先发地区学习借鉴经验的同时,抓住机遇,自主创新,将理论上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优势,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1) 合理定位,明确思路

具有后发特点的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破除故步自封的“金字塔”理念,开阔眼界,吸收借鉴部分先发高校盲目追求大而全的教训,应立足区域,以服务地方为目标,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形成自身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形成优势,^[5]培养符合泰州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改革中讲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抓质量,在质量中显特色,在特色中上水平,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6]

(2) 优化资源配置

着眼于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全局,在有限的教育投入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争取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首先,提高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同时,合理调整院校间的专业设置,实行错位发展、差别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设置,力争使各院校形成自己的特色专业、优势学科领域。

其次,全方面实现高教园区资源共享。既包括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设备的共享,还包括课程、教师、管理人员的共享,尤其是优质高教资源的共享,既可避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复配备、引进,还可以通过共享促进互助共生、实现共赢,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打造优势学科,加强产学研用的结合

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在于学科建设。泰州高等教育规模、格局刚刚初步形成,目前处于结构调整阶段,要紧密结合经济的转型升级,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对接,着眼于泰州高等教育发展全局,对现有学科专业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实现各高校多学科协调发展。这要求各高校要基于学校自身的历史传统、师资力量、办学资源等具体情况,以开放、创新“双轮驱动”为动力,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并以优势学科为依托,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开展项目建设,在教学成果、科研成果上有所突破,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在科研创新中,要加大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加强产学研用的结合,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用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在形成研发优势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4) 寻求多种支持

一方面,泰州市政府和各院校要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中央和省政府的政策支持、经济援助;另

一方面,还要积极向周边乃至全国兄弟院校寻求高等教育管理、教学等各方面的业务支持。尤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作为全省高教师资的水流洼地的泰州高等教育更需要寻求多种制度支持,通过高起点引进合作等,实现借力提升,提高高校师资队伍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为泰州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泰州市统计局. 2011、2012、2013、2014 年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R/OL]. http://www.taizhou.gov.cn/art/2014/3/5/art_27_256609.html.
- [2]沈健. 江苏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 [J]. 江苏高教, 2013(6).
- [3]刘细发. 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环境的 SWOT 分析与战略选择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7).
- [4]杨天平. 科学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5).
- [5]陈小虎. 中教论坛:地方高校定位不怕“低一些” [N]. 中国教育报, 2011-09-26(02).
- [6]尚钢. 破解地方高校科学发展瓶颈的战略思考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1(3 中).

(责任编辑 师语)

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初探

——基于培养对象现状调查的研究

徐 宁 胡春妮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近年来,由于研究生扩招等原因,我国经济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一系列问题与弊端。国家提出今后要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应当认清我国目前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现状与问题。通过对跨区域的5所代表性高校500多份调查问卷的分析,提出了经济学科研究生的具体分类培养模式(“学术型”和“应用型”),并对两种模式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提出对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思考和有关建议。

[关键词] 经济学科; 分类培养; 学术型研究生; 应用型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G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58-05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特别是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弊端,对研究生进行分类培养已经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学是一门兼具较强理论性和广泛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其研究生培养目前还没有进行合理的分类并制定相应的培养机制,这既阻碍了经济学科创新性研究人才的培养,也造成了应用型人才的缺失,使得培养的“学生”呈现出“四不像”的尴尬局面。学术型研究生显得“学术不足”,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更缺乏作为学术型人才所必须的核心素质——学术研究与创新能力;而应用型人才却往往显得“应用不足”,缺乏经济建设与行业发展所必须的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科研究生实施分类培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该如何分类、每种类别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如何制定各类别的培养方案等此类具体问题还没有一个定论,国内各个高校都还处于摸索之中。

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祁晓庆^[1]、刘鸿^[2]对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

究,认为我国研究生的培养应兼顾“系统性”和“灵活多样性”,不能“一刀切”,应针对不同高校、不同学科制定不同培养方案。胡玲琳^[3]在对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做了系统梳理后,认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并存是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

相较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丰富成果而言,有关经济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尚属开创阶段。董克用^[4]从多角度分析了经济管理类硕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认为经济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也应该进行“学术型”与“应用型”分类培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成为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前期阶段,以课程学习为主,经过资格考试,从中选拔博士研究生;应用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在课程、实习、论文三个环节都需要改革,以加强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曹永菊^[5]和李文溥^[6]立足于各自学校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探讨了本校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做法与经验,并提出

[收稿日期] 2015-06-15

[作者简介] 徐 宁,男,贵州六盘水人,南京大学EMBA教育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讲师。
胡春妮,女,江苏宿迁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教务员。

了相应的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借鉴意义。

综观上述文献,国内此前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多集中在分类培养的必要性、培养模式以及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方面。针对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文献也多以理论探讨或实践经验总结为主,从中总结和提炼出的经验与结论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并不适合国内大部分高校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普遍规律与模式。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这些研究大多立足于一般的文献研究与经验研究,缺乏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实证研究与相应科学数据的支撑,因而通过实证的方法对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现状进行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研究设计

为了从培养主体的角度全面了解和把握经济学科当前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和弊端,为下一步具体分类培养模式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和数据支持,本课题组设计了《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现状调查问卷》(以下简称《问卷》),问卷由“培养目标、生源选拔、课程建设、导师指导、科研论文、学术道德、考核机制、去向发展”八个部分共61个选项组成,内容涵盖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各个方面。

本调查打破了地域、学校与各专业的限制,面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多所高校800名经济学科的硕博研究生发放问卷,既考虑到“985”与“211”代表性高校之间综合实力的差距性,又兼顾了各高校经济学科之间的可比性,从而从问卷发放对象的角度保障了样本的典型性与普遍性。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问卷595份,回收率为74.38%。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552份,问卷有效率为92.77%。

三、统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基于《问卷》的数据分析与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主要存在如下几大问题:

1. 培养目标模糊,个性化培养缺乏

在当前经济学科研究生未实行分类培养的大背景下,培养目标模糊是经济学科现行培养机制的最大也是最显见的弊端。关于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最主要的目标,28.30%被调查的研究生认为是培养学术领域研究型人才,52.20%的认为是培

养经济领域应用型人才,17.97%认为是培养行业内实用型人才(见图1);而关于经济学科研究生最应具备的核素质,20.27%学生认为是“学术研究与创新能力”25.62%认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3.35%的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目标的模糊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个性化缺失,更严重的导致研究生培养的“错置”现象,即适合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学生走上了应用领域,而有些适合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却从事学术研究,无法人尽其才,进一步约束了高端拔尖人才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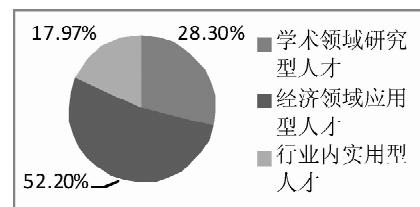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

2. 缺乏符合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特色的生源选拔机制

当前的研究生选拔机制主要有免试推荐与公开招考两种形式,就免试推荐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本科与研究生培养的连贯性,并且可以保障优秀的本科学生继续深造。但该选拔形式只占到目前研究生生源选拔机制的1/3,大大制约了对符合经济学研究生培养生源的甄选(见图2)。就公开招考机制而言,虽然确保了形式的平等与公平,但是由于考试形式的刻板以及考试内容的僵化往往导致“高分低能”的局面,很多优秀学生被阻挡在研究生教育的大门之外。同时也导致了进入经济学科各专业学习的学生经济学素养良莠不齐,经济学基础知识也相对缺乏的状况。在《问卷》中,26.65%的学生承认本科所学专业与经济学专业不同,对经济学学习帮助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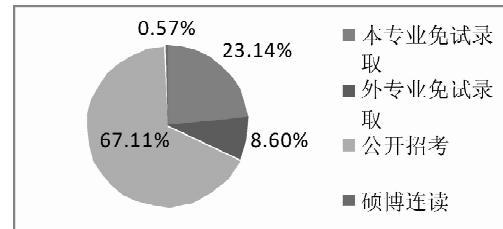


图2 经济学科研究生生源统计

3. 研究生学制不够灵活弹性,课程体系不够系统科学

目前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学制普遍分为三年制、两年半制、两年制以及弹性学制等几种形式,

经济学科也不例外。调查表明 72.66% 的研究生所在学科学制为三年制, 11.66% 为两年半制, 12.81% 为两年制, 仅 2.49% 为弹性学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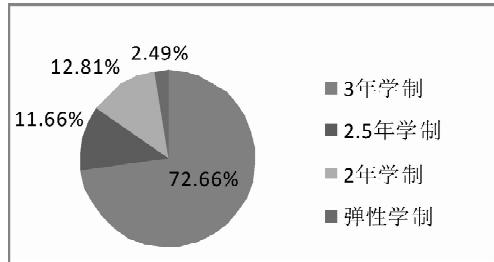


图 3 经济学科研究生学制统计

57.94% 的被调查研究生认为当前学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够弹性灵活, 40.92% 认为理想的学制为弹性学制。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对研究生学制的硬性规定, 更倾向选择弹性学制, 但是往往伴随严苛的实行条件, 比如必须在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等, 再加上弹性学制带来的管理效率的低下, 实际上弹性学制并未得以真正实行和推广。另外, 在当前经济学科研究生未实行分类培养的大背景下, 就研究生课程体系而言, 53.53% 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学科研究生课程应面向二级学科设置; 65.15% 的研究生认为所在经济学科研究生课程偏重理论, 实用性差; 80% 以上的学生认为“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无法实现师生之间充分的互动(见图 4)。总之当前经济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亟待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 否则将大大制约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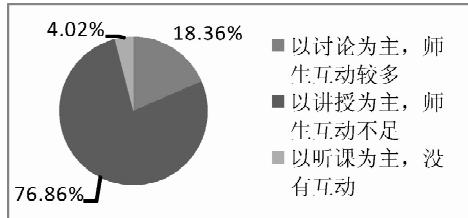


图 4 经济学科研究生授课方式统计

4. 导师选择机制较为合理但是指导形式单一、指导效果低下

目前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导师选择机制普遍为师生互选。但由于师资与学生数量对比悬殊, 作为稀缺教学资源的优质师资更是稀少, 导致目前研究生教育一直延用“一对多”的导师培养模式, 即平均一位研究生导师要带 3—5 名研究生, 一对一交流机会较少, 超过 70% 的被调查研究生认为参与导师课题的机会较少(见图 5)。其中讨论课形式占 42% 以上, 但导师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 师

生互动交流不足。经过调查发现, 导师指导研究生主要有讨论课、学位论文指导以及读书报告三种形式, 此外, 目前的导师制度缺乏结构合理的团队导师制, 除专任导师外, 90% 以上的研究生没有校内或校外兼职导师。以上种种必然导致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效率的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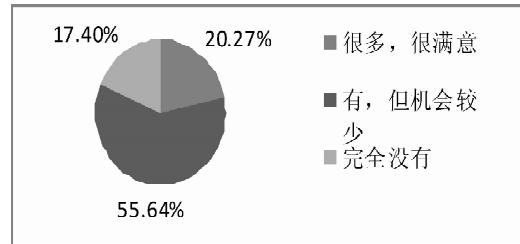


图 5 经济学科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情况统计

5. 考核机制单一的同时并未引入科学合理的淘汰机制

从横向看, 当前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考核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课程考核、研究课题考核与学位论文考核; 从纵向角度看, 则主要有入学考核、中期考核与最终的毕业考核。57.74% 的研究生认为应该建立以中期考核与学位论文考核为主的多种考核机制相结合的考核体系(见图 6)。一方面要加大中期考核的力度, 突出中期考核与学位论文考核之间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 严格学位论文考核, 应引入淘汰机制, 为考核不通过者提供另一种可行的选择, 但是在当前经济学科研究生未实行分类培养的前提下, 为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提出不同的培养方案与考核体系并在它们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轮转与一定比例的淘汰则无从谈起, 遑论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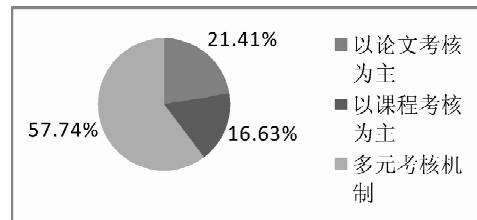


图 6 经济学科研究生考核机制

6. 去向发展领域相对集中, 缺乏“百花齐放”的格局

就经济学科研究生毕业去向发展而言, 所从事的领域与职业相对集中, 缺乏多层次多格局的“百花齐放”。通过调查发现, 认为应该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研究生只有 10% 左右, 另有 10% 左右的研究生会选择进一步求学

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博士后工作站继续从事学术研究,70%以上的研究生毕业后会仍直接去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工作(见图7)。虽然银行、证券等机构中仍不乏研究型的工作岗位,但比例较低,大部分的研究生仍从事应用型的工作。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很多有从事学术研究意向而且适合学术研究的同学往往因为就业压力、经济因素、婚姻家庭等原因最终选择放弃进一步求学深造。这也是因为经济学科研究生未实行分类培养所导致的弊端之一。如果经济学科研究生实行“学术型”与“应用型”分类培养,对前者从体制和经费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则不会存在因为就业与经济压力而导致的高端学术型人才的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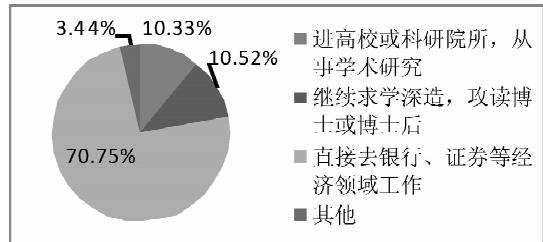


图7 经济学科研究生毕业去向统计

如上问题的产生,根本上讲是由于对经济学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模糊、类别不清和核心素质界定不清导致。在《问卷》的调查中,我们也设置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见表1),结果近八成的研究生认为有必要进行分类培养。而培养目标方面,硕士生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应用型人才,博士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各占一半。

表1 各类别研究生对培养模式基本看法统计表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平均水平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 ("985"高校)	北京大学 ("985"高校)	江苏省其他 高校("211"高校)
分类选择: 有必要	78.01%	82.46%	77.22%	77.34%	83.16%	75.78%
无必要	21.29%	17.54%	22.55%	22.33%	16.84%	24.22%
培养目标: 研究型人才	28.30%	52.63%	26.20%	29.33%	38.95%	17.97%
应用型人才	70.17%	47.36%	72.21%	69.67%	56.84%	81.25%
核心素质: 学术研究与创新能力	20.27%	43.86%	17.99%	22.33%	24.21%	12.50%
知识运用与实践能力	78.97%	56.14%	81.09%	77.00%	75.73%	86.72%

注:根据调查问卷数据整理所得。

上述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证明了培养目标模糊,定位不清晰、知识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个性化培养缺乏,学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最大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仔细分析,可以作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具体方案的起点,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思考

1. 经济学研究生应按“学术型”与“应用型”进行分类培养

对经济学科研究生进行分类培养势在必行,目前理论界有如下几种模式:学术性学位研究生

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与非学术型研究生、创新型、应用型与复合型研究生等等。从经济学科自身学科特点与发展规律来看,实行“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两种模式最为合适。

经济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社会学科。经济学科涵盖“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前者要求经济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必须注重系统理论的学习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则要求经济学科的研究生必须具备很强的知识运用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正是从经济学科学术性与应用性兼具的学科特点出发,并结合上述的调查问卷,我们认为经济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应实行“学术型”与“应用型”两类模式进行。

2. 需准确把握“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的概念内涵

关于“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内涵界定,胡玲琳已经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不再赘述。本文的研究需要对经济学科的“学术型研究生”和“应用型研究生”进行界定和描述,我们

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即对于经济学科来说,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分别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应到什么程度?分别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各是什么?笔者试用图表的形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见表2)。

表2 经济学“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概念内涵

类别 概念内涵	学术型研究生	应用型研究生
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经济学家、经济学者、教学科研人员,重点解决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问题	旨在培养经济建设各行各业需要的专门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重点解决经济建设领域内的各种问题
培养层面	硕士阶段具有过渡性质,终极目标是博士阶段	大多在硕士层面结束培养,少数进入博士层面
知识结构	扎实而系统地掌握基础理论,熟练运用相关学科(特别是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	能够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知识,能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分析方法,并且具有社会运用能力和实践经验
素质能力	具有独立从事教学、科学教研工作,对本门学科贡献创造性成果的能力;核心素质是理论构建能力与学术创新能力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核心能力是理论应用能力与实践创造能力
发展去向	毕业后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博士后工作站深造;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纯研究型岗位	走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各行各业,直接从事第一线经济管理岗位的实践工作

注:笔者根据各方面资料整理而成。

3. 应把握好两种模式的改革重点,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培养方案

在对经济学科“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的概念与内涵从培养目标、知识结构、素质能力与发展去向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与界定后,在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时,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围绕不同的改革重点进行。

具体来说,对于“学术型研究生”而言,改革应该紧密围绕“如何增强经济学学术研究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这一重点进行。例如,生源上要尽早选材,最好从本科就开始关注和引导;学制上应压缩硕士层面,延伸博士层面;教学上要更加注重对理论基础课程的授课,加上学术化和更加前沿的教学团队;考核机制要偏重于对学术化成果的考核等等,从而保障这一培养目标与核心素质的实现。对于“应用型研究生”而言,改革的重点则应从“如何增加经济学知识运用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角度出发,从而在生源选拔、学制设计、课程建设、导师制度、考核机制、发展去向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不同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这既是本课题研究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所在,也为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不同高校之间的师资队伍、生源选拔、区域社会环境等具体情况也都不同。因此,在具体制订经济学研究生分类培养方案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高校的具体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 [1]祁晓庆.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十年[J].中国高教研究,2006(9).
- [2]刘鸿.论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样化[J].江苏高教,2002(6).
- [3]胡玲琳.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模式[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 [4]董克用.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3).
- [5]曹永菊.浅谈经济管理类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与对策[J].江苏高教,2001(2).
- [6]李文博.厦门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07(6).

(责任编辑 晨晓)

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中的“双导师制”研究^{*}

王家华¹ 张杰²

(1.南京审计学院澄园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2.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 近年来,国内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研究生的培养为各领域科研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充分有效的保障依据。为强化研究生的实践性培养,目前各高校多采用校政企研联合培养模式,而“双导师制”是联合培养模式中通常会采用的一种培养制度。在通过分析“双导师制”优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导师地位进行分析,以期对优化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策略进行探究,为国内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些具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校政企研; 联合培养; 双导师制; 导师地位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63-04

引言

高校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在培养研究生时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还需要注重研究生所学知识的运用和转化。这就要求研究生培养不仅仅只依靠高校自身,还需要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合作,进行校政企研联合培养。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即为将教育、科研、生产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使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业的优势有效发挥出来,从而为培养研究生提供有效良机^[1]。实践表明,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可以提升人才培养价值,是培养研究生的一项有效举措。众所周知,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研究生占据主体地位,导师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从整体层面上来说,即使培养策略再优化,倘若没有导师的认真参与,培养研究生策略的有效性也难以提高。目前,各高校在实施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多采用“双导师制”的培养方式,本文拟对这一培养制度进行

分析与探究,以期对今后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有所裨益。

一、什么是“双导师制”

1. “双导师制”相关内容概述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仅有理论指导远远不够,还需要具备实践作支撑,这样才能够为应用型、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提供充分有效的保障依据。由于在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导师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近年来,各高校在导师制度上大多选用“双导师制”,即为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两者组合而成。其中,理论导师主要对研究生的相关课程学习负责,同时涵盖了课程选题以及学位论文理论指导等。实践导师主要对研究生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给予指导,并需在相关课题的实践中充分起到示范带头的作用。研究生培养方案,则由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共同完成。理论导师,通常由高等院校或者科研院所相关人员任职;实践导师,通常由在相关行业领域中具备丰富经验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及基础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GZZ14_07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教社政[2010]9号),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应用经济学(苏政办发[2014]37号)。

[收稿日期] 2015-07-06

[作者简介] 王家华,男,安徽宿松人,南京审计学院澄园书院院长,教授,博士。

张杰,男,湖南湘潭人,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副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的相关工作人员任职^[2]。从整体层面上而言，高校希望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模式，力图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研究生人才。

2.“双导师制”培养研究生的具体方式

高校对于“双导师制”的实施，通常将学生作为中心，然后将校内导师、校外导师作为主体部分，在国内高校采取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其培养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对于基础课程的学习，研究生主要集中于学校完成。对于研究生学习过程的监管，则属于学校内部导师的工作职责。与此同时，对于每一个培养阶段的监管，也是由学校内部导师完成。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研究生需进入企业进行学习，对于学位论文题目的确立来说，是由企业导师选取出来，同时需对研究生完成课题进行全过程的指导。在实习基地中，研究生主要需要完成论文的开题报告以及论文内容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企业导师加以指导，对研究生所写的论文的质量与进度进行严格掌控。在论文完成全过程中，学校内部导师需起辅助作用，例如论文的格式、理论深度等，均需要学校内部导师加以掌控^[5]。

其二，对于研究生而言，在高校学习过程中，以学习基础理论课为主。研究生学习情况，则由高校内导师进行监管，同时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加以明确，并指导研究生完成所选取的学位论文。研究生的实习在企业完成，企业需向研究生提供实习基地以及相关设备仪器等^[6]。开题报告以及学位论文需让研究生在校内完成，在研究课题以及试验方面，则需要两位导师共同指导完成。

其三，对于高校来说，倘若已经与企业或者科研院所存在合作，则需让研究生参与到相关研究项目当中，同时让学生以相关研究项目为依据，使研究选题更具科学性。对于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以及学位论文，则由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两者共同商讨加以决定^[7]。对于实验场所以及答辩场所来说，需以相关科研项目为依据。

其四，对于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倘若为在职攻读相关学位，例如学位硕士，那么不但能够以此类研究生所在单位有关的课程作为学位论文，而且还可选择由企业导师指导完成学位论文^[8]。学位论文的确立，也可由高校内部的导师加以确立，并指导研究生加以完成。

其五，将上述四类情况排除在外，对于研究生来说，还可以自身的喜好为依据，从而对进行研究的方向以及论文题目加以明确，同时以研究生所研究的方向为依据，对高校内部的导师加以选取。选择高校内部导师之后，研究生需与导师沟通交流，进而选择同领域的校外导师（即为企业导师），将高校内部导师视为第一导师，将企业导师视为第二导师。

二、“双导师制”的优缺点

1.“双导师制”的优点

高校在以往培养研究生通常采取的都是“单导师制”。一般是由高校相关人员或者科研院所相关人员任职研究生导师，由单个导师培养研究生。此种模式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一方面研究生与导师两方之间传统观念较为明显，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导师职责重大，有些单一导师会存在个人工作繁忙、“一带多”情况下工作负担过重等情况，从而出现了因为导师监督不力，其所带研究生发生学术论文剽窃、抄袭以及造假等学术不端的行为。除此之外，单个导师往往对理论研究十分重视，而轻视实践指导，这样便难以培养出实践型、应用型研究生。

在此现状下，“双导师制”的实施，为培养研究生提供了有效契机。此制度很好地将高校内部的导师与高校外部的导师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应用型、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大致上而言，“双导师制”的实施具有三方面的优点：（1）学校导师作为理论导师、企业或者科研院所导师作为实践导师，能够使高校实践教学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同时使社会对人才的复合需求得到有效满足。（2）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如生产繁忙、管理复杂以及人力资源匮乏等，而培养实践型研究生，能够为企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提供有效保障^[3]。（3）对于高等院校这一学术型个体来说，使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向生产成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与此同时还存在培养研究生导师队伍缺乏等问题，而“双导师制”的实施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2.“双导师制”的缺点

在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双导师制”的实施虽然具备诸多优点，但由于制度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一些困境，因此“双导师制”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双导师制”的实施与“单导师制”比较起来，会使教育成本加大，同时引发培养经费缺乏等问题，会导致“双导师制”的实施困难程度加大。

另一方面，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监督匮乏，致使“双导师制”的培养计划难以得到有效实现，大多数高校在该制度上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表现，高校外部的导师参与力度不足，很难使“双导师制”的作用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除此之外，高等院校与企业两者间在人才培养方面协调性差、缺乏沟通等，对于高校内部与高校外部导师的责任难以得到有效明确，实践型导师在培养研究生上的积极性偏低，这样便难以培养企业乃至社会所需的高端人才。在“双导师制”实施过程中，无论是高校内部导师，还是高校外部导师，均需要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4]。另一方面，高校、企业乃至科研院所，需要对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中相关导师的地位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够使导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研究生人才提供有效保障。

三、关于“双导师制”中两位导师地位的明确问题

1. 明确导师地位的相关标志

“双导师制”的实施解决了“单导师制”存在的诸多不足，但是“双导师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所获取的研究成果归属问题。对于导师地位的确立来说，这是一个较为鲜明的标志物。对于研究生所获取的成果来说，主要涵盖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所发表的论文的署名。对于研究生而言，在学习过程中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其第一署名通常为第一导师，而学生自身则为第二署名。倘若高校内部导师为培养研究生的第一导师，那么成果署名的第一单位则为高校，而校外导师所处的企业或者科研院所则为第二完成单位^[8]。倘若高校外部导师为第一导师，则成果署名的第一单位则为高校外部导师所在的企业或者科研院所，而学校则视为第二完成单位。

第二部分为专利的署名。对于处于学习过程中的研究生来说，在专利的署名方面，通常第一专利权人归属于第一导师，而第二专利权人归属于第二导师，那么第三专利权人则归属为研究生自己。对于第一、第二完成单位来说，和所发表的论

文的署名一样，哪类导师为第一导师，则由哪类导师所在的单位担任。

第三部分为股份、股权。对于研究生来说，基于在读过程中，倘若进行创业或者成立股份公司，那么其股份或者股权通常由第一导师占五成，研究生自己占三成，而第二导师则占剩下的两成。

2. 明确导师地位的相关策略

通常认为，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贡献值的高低，决定了导师的地位^[9]。本文认为对于“双导师制”中两位导师地位的明确，还需从以下几大方面加以完善：

其一，以研究方向指导为依据。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对研究生在校学习的综合考量，从选题、写作到最终完成都需以相应学科的培养计划为依据，并与培养目标保持统一。学位论文选题伊始，两位导师的地位便有所明确，即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来说，哪一位导师确定选题方向便由哪一位导师担任第一导师，另一位导师结合培养任务进行配合。

其二，以经费来源和使用为依据。在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校方需给予充足的经费，此类经费之所以需充分满足，是因为不但需要满足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还需要满足相关实验设施设备的购置等^[10]。对于导师地位的明确，需以学生完成学习研究的相关经费来源和使用为依据，即在第一导师的选择上，需参考哪一部分导师承担了费用，如完成论文的经费、相关实验器材的费用等，哪一类导师承担更多则将其视为第一导师。

其三，以与实习基地签订的相关合同书为依据。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但需要注重理论，而且还需要注重实践，唯有“理论加实践”才能够为培养出专业水准高的研究生提供充分有效的保障。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可与企业签订与实习基地相关的合同书，在合同书中对导师的地位加以明确，并详细列出导师所需承担的培养指导任务。

其四，以实际的应用指导效果为依据。导师倘若可以把研究所获取的创造性成果或者专利，以产业化的形式加以推广，那么第一导师则授予于此导师^[11]。而对于那些能够对研究生所获取的创新性成果进行指导并实现创业，那么第一导师应授予此导师。

三、完善“双导师制”的制度保障

“双导师制”是目前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制度,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加以完善。

1. 对“双导师制”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强化

高校需以“双导师制”为依据,进一步拟定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使校、政、企三方能够明确自身的责权,对高校与企业双方导师给予足够的尊重,使导师的地位得到有效明确。同时应“双导师制”构建完善的考核体系,融入激励机制,使导师在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有效保障。

2. 对培养方案进行科学修订,同时对教学策略进行优化

首先高校应对培养方案进行科学修订。在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相关课程设置过程中,不但需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还需要注重实践课程的开展,使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有效培养。与此同时,校内、校外导师需明确分工,在指导教学过程中,需注重研究生对相关课题知识的掌握能力培养。师生之间需密切沟通,通过沟通交流增进师生情谊,同时导师应在沟通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一步为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提供充分的依据。

其次,采取优化的教学策略,改善传统模式下的灌输式教学法与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思想,融入现代化教学方法,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研究生提供良机。

3. 对研究生培养经费筹措渠道进行拓宽

要想使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工作制度保障得到有效完善,还需要对研究生培养经费筹措渠道进行拓宽。对于高校而言,可对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的构建进一步强化,同时对研究生工作站加以构建,对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研究生进行密切联系,签署联合培养研究生合同书^[12]。与政府部门、相关企业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使合作的机构或者企业能够为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有利资源,从而降低高校培养研究生的成本。

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中的“双导师

制”与以往的“单导师制”对比起来,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针对问题需要强化“双导师制”相关管理制度、科学修订培养方案等,通过校、企、研等多方面的努力,不断完善校政企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进一步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专业水平高以及综合素质强的研究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乐长高,谢宗波.产学研联合培养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研究生[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 [2]高兴武,王华荣.北京市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调查问卷(导师卷)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1(19).
- [3]王秀红,廖春发,聂华平.产学研合作培养应用型冶金工程专业研究生的探索[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2(2).
- [4]潘志宏,谢凌燕.工科研究生基于校际合作的产学研多元化联合培养方式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2(14).
- [5]胡涌,田露,柳小玲,高兴武.北京市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的类型分析与选择[J].中国林业教育,2012(4).
- [6]陈力.地质工程专业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机制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2(10).
- [7]汤琦瑾,刘文翠,黄镭.新疆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运营中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2(33).
- [8]刘文翠,汤琦瑾,黄镭.新疆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选择[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2(4).
- [9]杨霄玉,于兴华.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对策研究[J].大学教育,2014(16).
- [10]胡立,罗尧成,田蔚风,徐琳,林佳.英国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主要特点及经验借鉴——KTP计划的实践[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3).
- [11]郭向明,邓戎,殷立雄,郝亮,田清章.陕西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探索与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8).
- [12]周伟萌,丁爱薇.信息法学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研究——以研究生培养为例[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责任编辑 晨晓)

以权利义务对等观为导向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构建研究^{*}

庄素娟 甘 谱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构建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导向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有利于贫困生理性看待自己的贫困和接受资助的事实,增强贫困生的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对等意识,有利于培养贫困生的付出和奉献精神,有利于培养贫困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利于增强贫困生的技能和能力,提升贫困生的择业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

[关键词] 权利义务; 对等; 高校贫困生; 贫困生资助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67-03

贫困生通常是指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导致难以支付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的学生。但是,现实中的贫困生往往面对的并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贫困。因此,应当全面理解贫困的内涵,除了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外,还应包括权利、机会、心理、情感、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缺乏或缺失。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仅仅意味着经济的贫困,而经济、政治、文化和情感、心理、人格等方面缺乏则是全面的贫困。^{[1](P.946)}单纯的经济资助往往忽视了贫困生的心理、意识、能力、以及责任感的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困扰着高校贫困生如何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顺利成长。在对贫困生经济资助的同时,应当注重培养贫困生的权利义务对等观念,增强贫困生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强化其义务观念和责任感、使命感,使贫困生综合全面发展,毕业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一、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述评

1. 实践中经济资助为主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

1997 年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高等学校开始全面统一实行收费制度,延续 40 余年的大学生公费制

的时代宣告终结,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正式实行自费培养模式。由于收费制度的实施,大学生中的贫困群体面临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为了解决高校贫困生受教育的经济障碍,1998 年,国家正式出台了助学贷款制度后,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完善贫困生资助方式,逐步形成了奖、贷、助、补、减五位一体的大学生综合资助体系。2005 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从中央财政收入中每年专项拨款 10 亿元,设立国家助学奖学金,用以资助高校贫困学生。相关资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体现了国家层面上对贫困生的关心、关注和资助,对于贫困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也在逐年加大对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这在总体上也为贫困生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加大经济资助的同时,国家也在注重对贫困生的励志教育和责任感的培养,例如提高助学贷款的比例,让贫困生为自己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并督促其完成目标,注重感恩教育等。

2. 多元化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理论

随着高等教育公费制的废除和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尝试与开展,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的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标导向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贫困生资助育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FDY030),江苏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新生学习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B-6/2013/01/003)。

[收稿日期] 2015-07-09

[作者简介] 庄素娟,女,江苏淮安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甘 谱,女,河北石家庄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反思和探索越来越深入,一些从事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构建和完善的设想和建议。

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构建资助与自助一体化救助模式,倡议应健全贫困生的资助激励机制,提高资助工作者的业务能力,营造资助—自助政策和谐运行的氛围,唤起贫困生的自助意识以及培养其自助能力。^[2]有的学者则倡导建构能力本位型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模式,通过各种措施使贫困大学生真正成为健康、有活力、有能力的社会主体。^[3]有的学者则提出借用PDCA(过程管理)循环思想来管理贫困生资助中的相关问题。^[4]有的学者建议树立高校贫困生资助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资助模式转变的理念,认为单纯资助为主的“输血型”资助模式存在着资助目标单一化、资金自我造血功能薄弱、个人解困能力相对不足等弊端。^[5]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构建“济困·扶志·强能”三维立体型资助模式的建议。^[6]

纵观各种贫困生资助模式构建的观点,都是主张在经济资助的同时应当注重培养贫困生的各种能力,关注贫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鲜有学者从权利义务对等为导向的角度探讨贫困生资助模式的构建。而权利义务相统一意识的确立恰恰是心理健康保证、能力自觉培养和责任意识形成的根本,确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是正确看待自身和社会、他人的起点,也是贫困生综合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思想营养。

3. 权利义务对等意识导向的必要性

贫困生资助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和任务,不是单纯的经济资助问题,培养贫困生的能力、关注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等策略也只是具体的手段和策略。单纯的济困行为往往带来负面效应,使贫困生产生懒惰依赖和消极等待帮助的思想;一些扶志行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强能行为由于财力、机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也难以实现。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培养将会使贫困生正确认识自身贫困和被资助事实,既不因自身贫困而妄自菲薄,也不因接受资助而滋生依赖思想。

二、权利义务对等观为导向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的价值

1. 有利于增强贫困生的自信心,形成自主意识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受教育权是国

家应予保障的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获得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公民顺利完成学习是国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应当让贫困生明白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资助他们完成高等教育。树立这种权利意识有利于他们克服因为贫困而带来的自卑等心理障碍,挺起腰杆好好学习,甩掉低人一等的心理阴影,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活动,充分展示自己,形成自信的、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

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高校学生基本都已是成年人,应当培养他们的义务意识,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树立有利于帮助贫困生形成自主、自立的意识,自觉能动的接受高等教育,完成自己因享受资助权利而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

2. 有利于培养贫困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培养有利于树立贫困生的主人翁意识。让贫困生明白接受高等教育是自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通过经济资助予以保证这项权利,但是也要让贫困生明白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力所能及的为社会、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将会使贫困生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贫困生的关心、关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贫困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培养他们的自助意识,增强自立能力。

3. 有利于贫困生正确看待自身现状,形成积极良好的心态

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培养有利于贫困生正确看待自身的贫困现状,辩证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权利义务对等观的确立,将帮助贫困生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理清自己和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理性看待自己被资助的事实,培养感恩和回报社会的义务感,防止因贫困而嫉恨国家、社会和他人,从而成为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因素之一。义务意识的确立,将使贫困生认识到自己受教育权利的来源、受资助的根源,激发其艰苦奋斗、努力学习的精神,树立积极良好的心态。

4. 有利于贫困生技能和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在权利义务对等观的指导下,可以促使贫困生自主、自觉、自愿的参与勤工助学活动、社会义工活动等,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技能锻炼,培养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提高他们将来

走向社会后的工作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更有利于他们尽快摆脱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现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权利义务对等观为导向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构建的路径

1. 不断改进和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

经济资助是贫困生资助的核心,不解决贫困生的经济贫困问题就无法保障其基本的生活,也就无法继续其大学期间的学习,更谈不上其他能力的培养。因此,经济上的资助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基本上形成了以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杂费减免(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

因为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贫困生的所有要求,应在解决贫困生生存困难的前提下,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导向,培养贫困生的权利义务意识,降低“不劳而获”的资助比例。贫困生在获取资助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倡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使贫困生资助的投入和产出效益最大化,这也是“确保公平,实现效益”原则的重要体现。

2. 矫正高校贫困生歪曲的权利义务观念

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主要包括奖、贷、助、补、减等方式,实践中奖、补、减成为了主要的资助模式,这种情况直接导致部分贫困生产生惰性思想,认为自己就应该从国家无偿获得帮助,无需任何付出。甚至于一些获得助学贷款的同学毕业之后也千方百计拖延、逃避归还银行贷款。等、靠、要的思想在贫困生中间比较普遍,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认为获得任何资助都是自己的权利,而付出、回报的义务观念却非常淡薄,形成了只求权利、逃避义务的歪曲的权利义务观念。高校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增强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让他们认识到没有绝对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义务。通过讲座、志愿活动、感恩教育等手段和方式,引导贫困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正确的认识付出和奉献行为,培养贫困生既有权利意识又勇于担当义务的积极心态。

3. 加强助学贷款主导地位,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强化贫困生义务意识

应当通过加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导地位,归并助学金和勤工助学资金,提升勤工助学金在所

有资助中的比例,强化贫困生的义务意识,形成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塑造贫困生成为社会可用之才。高校应当联系社会资源,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在不影响学习主业的前提下,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降低对学生的普遍赠予式资助,加大有偿性资助。贫困生在付出一定劳动代价的同时,获得相应的资助,这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义务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资助。通过付出获得资助在强化贫困生义务意识的同时,将有利于贫困生正确看待自己的贫困状况,正确看待自己的劳动,使他们产生自豪感、自信心。通过勤工助学,还可以锻炼贫困生的业务技能、沟通能力、动手能力等,提升他们的择业竞争力,同时也反向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对等观念。

4. 培训专业工作人员,提高贫困生资助工作水平

高校应当提高资助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普及资助者的法律常识,一方面依法资助,一方面便于引导学生养成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正确看待资助事宜。通过资助工作者的努力,唤起贫困生的权利意识,让他们自信、自主的努力学习,克服妄自菲薄的心理;同时,培养他们付出、奉献的义务意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增强自己的择业竞争力、走向工作岗位后的工作竞争力,做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努力回报社会的有用之才。

[参考文献]

-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 [2]张人崧.高校贫困生“资助—资助”一体化救助模式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3(2).
- [3]张瑞芝,张香村.建构能力本位型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模式[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4).
- [4]刘敏.高校贫困生资助过程管理理论框架与PDCA模式构建研究[J].社科纵横,2012(3).
- [5]梁军,何丽萍.高校贫困生资助的根本出路:“输血型”向“造血型”资助模式的转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4).
- [6]莫飞平.“济困·扶志·强能”三维立体型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的构建策略[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2).

(责任编辑 光 翟)

关于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思考^{*}

彭 云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系, 江苏南通 226006)

[摘要] 由于免费男幼师生将来所从事的是长期以女性为主导的幼教工作, 所以关于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结构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 每个维度又可以分为逐级递进的 3 个层次。影响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个性特性与他人影响、自我体验与角色适应、工资待遇与专业发展等几个方面。为了帮助免费男幼师生走出角色认同的困境, 除了需要其自身做出主体努力以外, 更需要政府部门、培养院校和用人单位从物质待遇、课程设置和岗位安排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免费男幼师生; 角色认同; 因性施教

[中图分类号] G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70-05

2007 年, 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在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示范引领下, 江苏省于 2010 年启动了师范生免费教育定向培养试点工作。《江苏省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规定, “鉴于当前我省幼儿师资队伍性别结构矛盾突出, 男教师稀缺的状况, 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以培养幼儿园男教师为切入点, 计划在‘十二五’时期招收一批五年制高职免费幼儿师范男生(报考对象为应届初中毕业生), 推动改善我省幼儿师资队伍性别结构, 提高我省幼儿师资队伍质量”^[1]。目前, 全省首批免费男幼师生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师范生的角色认同“是影响师范生学习以及今后教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有师范生认同自己的教师身份, 并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好教师, 他们才会有强大的学习动力, 愿意投入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到学习中去”^[2]。长期以来, 幼教工作一直是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幼教事业的发展, 虽然有男性教师逐渐走上了幼教工作的岗位, 但男性在幼儿教师队伍中的占

比仍然很小。所以, 在免费男幼师生定向培养试点的过程中, 首先必须解决学生的角色认同问题, 才能实现江苏省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初衷。基于此, 本文拟结合实践就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内涵及角色认同的结构、影响因素和强化策略等问题进行一些理性思考。

一、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内涵

角色认同是综合角色理论和认同理论而形成的。从角色理论看, 社会是由许多具有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所组成的, 当一个人履行某种身份和地位的权利与义务, 并按照社会的期望做出相应的行动时, 说明他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有着正确的意识, 或者说他就在扮演一个角色。^[3]对于免费男幼师生这一角色, 其内涵可以从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两个方面进行描述。

首先, 免费男幼师生实际是其目前身份

按照《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 免费男幼师生是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 经过“培养院校组织的面试”、“按省辖市定向招生和提前批次录取”的“五年制高职”类学生, 入学前已经“与录取学校和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专业标准的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D/2013/02/710)。

[收稿日期] 2015-03-11

[作者简介] 彭 云, 女, 江苏南通人,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系教授。

所在省辖市教育局签订协议书”，承诺毕业后回“所在省辖市从事幼儿园教学工作不少于5年”，“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获得生活费补助，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等形式就业，所在省辖市确保其有编制的工作岗位。如果未按协议从事幼儿园教学工作或工作未满服务年限，要退还已享受的相应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同时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限内，只能在职进修高层次学历。^[1]由此可见，免费男幼师生与直属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以下简称“免费师范生”）一样，因为享受免费教育、确保就业等待遇，所以必须做出相应的承诺，而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但是两者对自身身份的承诺不完全相同，免费师范生是在高中毕业时承诺本科学历、农村任教、中小学岗位，而国家又给予一年后经考核合格“可录取为教育硕士（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待遇^[4]；免费男幼师生在初中毕业时承诺大专学历、幼教岗位，但进修问题还得自己解决。相对而言，免费男幼师生承诺时的年龄偏小，入职时的学历偏低。

其次，免费男幼师生的未来职业是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准》）规定“幼儿园教师是履行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5]由于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幼儿园教师要安排本班幼儿一日生活，对本班工作全面负责，所以，《专业标准》还从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4个基本理念出发，用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3个维度、14个领域和62项基本要求厘定了幼儿园教师的合格标准。免费男幼师生要成长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必须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按照《专业标准》对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具体规定，结合培养学校的课程安排，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所规划和设计，并且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反思与改进，逐步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免费师范生的未来职业是中小学教师，国家对中小学教师也都有相应专业标准，免费师范生要成长为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规划和努力，所不同的是对免费师范生没有性别规定，而免费男幼师生则必须是男

性，将来所从事的又是长期以女性为主导的幼教工作。

二、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结构

角色认同是在对角色内涵有正确意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一定社会结构中能正确意识自己所处的特定位置，或能正确扮演一个角色，并不说明他就能认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一名免费男幼师生，入职前能认真完成所有的课程学习任务，入职后又能积极完成班级的保教工作，但他总是伺机更换工种，一旦时机成熟就离开幼儿园去从事其他岗位的工作。这说明他能认识或理解免费男幼师生或男性幼儿教师的角色内涵，但心理上并不能接受这一角色，或者说这一角色不能满足他的心理需要。所以，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

1. 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认知维度

认知是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中的认知就是通过心理活动对免费男幼师生角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在认知维度上，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可以分为感性、理性和同化3个逐级递进的层次：（1）感性层次。建立在感知经验基础上，对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特征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自己是免费男幼师生，将来是男性幼儿教师；了解到幼儿教师需要能说会道、能歌善舞的专业技能；幼儿教师既要对幼儿进行生活照料，又要对他们进行课程教学；幼儿教师需要较强的环境创设与游戏指导等能力。（2）理性层次。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上，从本质属性层面认识与把握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知道自己是未来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要为儿童的身心发展创设和组织合适的环境与活动，理解幼儿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与儿童身心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懂得幼儿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3）同化层次。从免费男幼师生到男性幼儿教师的专业化进程中，外部影响和原有观念之间经常存在矛盾或距离。同化就是外部影响与原有观念之间不断碰撞最终实现统一的过程。在同化前个体对角色的认识主要是“说教”的结果，而同化后个体对角色的认识则是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矫正的结果。

2. 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情感维度

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中的情感就是对免费男幼师生这一角色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在情感维度上,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可以分为接受、喜欢和满意3个逐级递进的层次:(1)接受层次。接受是指个体对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表现出愿意接纳的意向。如某初中毕业男生在填报升学志愿时,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将免费男幼师生作为升学志愿;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愿意按照培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幼儿教师的职业要求塑造自己;毕业时,愿意按照入学前签订的协议到相应的幼教岗位工作。(2)喜欢层次。喜欢是指个体对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表现出主动适应的意向,能对相关活动做出主动反应并积极参与。如某免费男幼师生在进入师范院校之后,积极参加学校有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见实习等实践活动;入职之后,能努力完成保教等工作任务,积极参与业务学习,主动适应岗位要求。(3)满意层次。个体对目前身份和未来职业感到满意,立志长期或终身从事幼教工作。如某免费男幼师生在进入师范院校之后,能够按照专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定位、规划并进行自我塑造;入职之后,在课程教学、班级管理、教育研究等诸多方面孜孜以求,将自己纳入教坛新秀、骨干教师等专业发展的轨道。

由于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有“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而且每个维度又可以分为逐级递进的3个层次,所以,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是一个二维的动态结构,每个免费男幼师生都能从中找到自己角色认同所对应的位置和发展的方向。

三、影响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因素

关于角色认同,有些学者在研究中是用职业认同或身份认同等进行描述的。自2007年有了首批免费师范生以来,许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对免费师范生角色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6]但免费男幼师生的实际情况与免费师范生的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影响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个性特性与他人影响、自我体验与角色适应、工资待遇与专业发展等几个方面。

1. 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

社会舆论是指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

语或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而传统观念是指依据以往的经验或知识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社会舆论的产生和传统观念的形成往往都与一定时期的政府决策有关,因为政府决策会影响“多数人”的知觉和意志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观念。政府的免费男幼师生政策直接影响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的导向。政府决策偏向免费男幼师生或男性幼儿教师,社会就会产生有关免费男幼师生或男性幼儿教师的积极舆论,并逐渐修正幼儿教育只需女性教师的传统观念,从而促进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

2. 个性特性与他人影响

个性特性就是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成分,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个性特征具有先天性和后天性、共同性和差异性、稳定性和可变性、独立性和统一性、客观性和能动性等特点。他人影响则是指家人、师长或同学等人对个体的影响。个性特性和他人影响最终都要通过主体的思维和体验形成结果。有些免费男幼师生是由于自己喜爱或适合从事教育工作而选择成为师范生;有些则主要是因为受到家人、师长或同学的影响才选择成为师范生。而重要他人所持有的对“免费男幼师生”和“男性幼儿教师”角色内涵的认识与看法,直接影响着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他们是否会选“免费男幼师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自我体验与角色适应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识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是主我对客我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反映了主我的需要与客我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客我满足了主我的要求,就会产生积极肯定的自我体验;反之,则会产生消极否定的自我体验。免费男幼师生在进入师范院校接受专业知识的传授、教育技能的训练以及教育见习或实习的锻炼过程中,对幼儿教师角色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这时由于有社会舆论、重要他人的积极影响,特别是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矫正,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作为未来幼儿教师的满足和幸福,并在学习生活中获得进步和成功,这些积极的体验就能促进免费男幼师生角色

认同的强化。如果因为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因为一些现实或功利的原因选择了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但是由于不能适应师范学习生活，或无法通过调节和矫正使自己从中获得积极体验，这时他们的角色认同就可能不断地弱化。

4. 工资待遇与专业发展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由低到高逐级递升的5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工资待遇与专业发展就是来自需要层面的影响因素，位于马斯洛五层次需要理论的两个极端，其中工资待遇决定了生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专业发展决定了自我实现需要的可能性。一个人在工作中能获得比较满意的或与个人付出相匹配的工资待遇，就能强化他的角色认同；同时人又是一种有思维的动物，都有各自精神层面的追求，如能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获得一定层次的专业发展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也能促进角色认同感的增强。学生自己或在重要他人的指导下，综合幼儿教师的专业特点、工资待遇以及自身的个性特征、学习能力等情况，如果感到从事幼教工作能使自己获得满意的报酬和理想的发展，就能促进他们对免费男幼师生角色的认同。

四、强化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策略

有多项研究表明，不仅入职前“女生较男生更喜欢从事教师职业”^{[1][7]}，而且入职后男女教师的角色认同之间仍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女教师的角色认同程度远高于男教师。^[8]还有研究表明，免费师范生的角色认同大体需要经历“个体认知、社会比较、群体认同”3个发展阶段，即使个体对角色有积极的认知，在社会比较或群体认同阶段还可能出现“消极的认同感”。^[9]况且免费男幼师生都是男性学生，将来要去从事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工作。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艰巨性。为了帮助免费男幼师生走出角色认同的困境，除了需要免费男幼师生自身做出主体努力以外，更需要政府部门、培养院校和用人单位从物质待遇、课程设置和岗位安排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全力营造有利于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外部环境。

1. 政府部门：提高物质待遇

有研究者认为，女生教师的角色认同水平明显好于男生的首要原因是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期

以来“不少女性认为教师职业稳定、风险少，同时又拥有寒暑假等空闲时间照顾家庭。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职业又显得比较繁琐，在权力、声誉、金钱等社会资源占有上比政府行政人员、企业家等人相对较少”^[12]。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所谓文化环境的影响，关键在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要落实社会交换的公平原则。霍曼斯认为，社会交换实质是平等、公正的，要是一个人在社会互动中给予别人的多，他就要设法从别人那里多获取一些报酬。^{[10](P.298)}也就是说，人们都希望自己得到的报酬或利润与付出的成本或投资成正比，这就是社会交换中的“公平分配”原则。而且调查还表明，“不同工资满意度教师的职业认同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工资满意度越高，职业认同程度越高”^[8]。所以，政府部门除了通过舆论手段改造文化环境以外，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物质待遇，让免费男幼师生在入职前享受免费教育、确保就业等待遇的基础上，优先安排职后在职学历进修，并根据在岗工作时间给予一定的奖励性报酬，从而使免费男幼师生以及整个社会真切地感受到男性幼儿教师职业和地位的崇高。

2. 培养院校：优化课程设置

为了提高师范生对从事教师职业的兴趣和认同感，有学者建议首先加强入学前的筛选工作，严把“入口关”。对报考师范教师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师职业人格适应性测试和职业兴趣测试，“把真正适合当教师、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并具备教师基本素质的人挑选进教师队伍中来”^[11]。其实师范生的角色认同是动态的，特别是免费男幼师生在承诺大专学历、幼教岗位时，还只是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初中毕业生，虽然免费男幼师生在招生录取时也有“培养院校组织的面试”，但难免在成长过程中会产生消极的认同感。有学者曾经指出，“要提高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首先必须理性分析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在培养模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正确认识不合理的培养模式产生的消极影响”^[12]。对于免费男幼师生的培养试点工作，培养院校更应该优化课程设置，及时调整已有的主要针对女幼师生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在保证从事幼儿教育所必须课程的基础上，为免费男幼师生提供更适合其性别特点的学习内容，以支持他们习得有别于女生的专业技能，从而促使他们在努力学好幼教课程、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突显自身从事幼教工作的优势，改变幼儿教

育只需女性教师的传统观念,同时达到强化免费男幼师生角色认同的目的。

3. 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岗位

教育部最近出台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指出,“幼儿园应根据服务类型、幼儿年龄和班级规模配备数量适宜的专任教师和保育员……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备2名专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或配备3名专任教师……对所辖社区或村级幼儿园(班)负有管理和指导职责的中心幼儿园,应根据实际工作任务和需要增配巡回指导教师”^[13]。这不仅规定了各类幼儿园班级教师的配备数目,而且给幼儿园安排免费男幼师生的岗位提供了启示,那就是不固定在某一班级担任保教工作,而是作为有关课程的专职教师到一定数目的班级巡回教学。其实,这也是江苏免费男幼师生培养试点工作的初衷。因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通过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招收培养一批幼儿园男教师,力争在3—5年内使全省每所幼儿园拥有1名以上男教师……对于形成良好的幼儿教育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14]。幼儿园只有将“3—5年”才等到的“1名男教师”作为健康、科学等有关领域的专职教师安排到全园的多个班级巡回教学,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幼儿教育生态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回避免费男幼师生在保育方面可能的短板而发扬他们的性别优势,以确保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功体验的同时强化自己的角色认同意识。

总之,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关键在其自身的主体努力,只有当他们将区别于女性的优秀幼儿教师作为职业理想的时候,他们才会在对角色内涵从感性、理性到同化认识的过程中,产生从接受、喜欢到满意的态度体验和精神升华。当然,政府部门、培养院校和用人单位也要认清角色认同的动态性和影响角色认同的客观因素,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为免费男幼师生的角色认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 [1]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办法》的通知

[EB/OL]. (2011-06-02) [2015-03-08].
http://www.ec.js.edu.cn/art/2011/6/2/art_4267_30710.html.

- [2]林一钢,冯虹.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3(10).
- [3]张宇.论角色认同的重新定位[J].求索,2008(3).
- [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 (2007-05-14) [2015-03-08].
http://www.gov.cn/zwgk/2007-05/14/content_614039.htm.
-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EB/OL]. (2012-09-14) [2015-03-08]. http://www.gov.cn/zwgk/2012-09/14/content_2224534.htm.
- [6]滕媛.国内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现状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2(5).
- [7]程巍,王在勇,王瑶.高等师范教育专业学生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现状调查[J].教师教育研究,2008(9).
- [8]宋广文,魏淑华.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1).
- [9]石艳.免费师范生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对某师范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免费师范生的调查[J].教育发展研究,2010(4).
- [10]贾增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11]郭韶明.职业认同:教师成长的内动力[J].中国青年报,2006-09-24(3).
- [12]齐佩芳.关于培育高师生教师职业认同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7(7-8B).
- [13]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EB/OL]. (2013-01-23) [2015-03-08]. http://www.gov.cn/zwgk/2013-01/23/content_2318295.htm.
- [14]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 (2010-05-17) [2015-03-08].
http://www.ec.js.edu.cn/art/2010/5/17/art_4267_30191.html.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我国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研究述评^{*}

徐 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儿童群体。社会支持系统作为一种保护机制, 对学前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前已有研究虽初步形成了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理论框架, 但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分散的理论描述状态, 有待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深度的动态研究; 只关注某些远端支持子系统, 未触及核心问题——家庭教育近端子系统; 缺少对构建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干预方案和政策建议。未来研究必须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协调运行、整体统筹、利益合理分配的促进农村学前儿童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

[关键词] 农村学前留守儿童; 社会支持系统; 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75-06

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儿童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 外出打工, 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 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他们却被迫留在了农村家里, 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由于“留守儿童”特殊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引发的生活、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自本世纪初,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各方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部门和机构认识到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群体,^[1] 从而以不同视角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不同规模的调查研究, 包括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结构、留守类型、地区分布、所面临的问题等。但现有研究存在普遍化、整体化倾向, 较多关注的是未随父母流动留守在户籍地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而相对忽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儿童身心特征的区别, 从中较难以深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的生存发展状况和问题。

一直以来, 关于农村留守幼儿群体, 官方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因缺少相关数据档案机制, 全国和地方性数据信息的收集具有较大的滞后性, 影响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幼儿总体状况的准确把握, 难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可操作的改善措施。2012 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组成课题组, 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支持, 开展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最为权威的数据发布, 为我们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数量及整体状况提供了客观依据。该研究在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抽取 126 万人口样本量, 根据样本数据推算出,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 6000 万, 占农村儿童 37.7%, 占全国儿童 21.88%, 其中, 学前农村留守儿童(0—6 岁)达 2342 万, 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 38.37%。农村留守儿童广泛分布于中西部省份,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2013 年立项课题“3—6 岁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项目编号:D/2013/01/076)。

[收稿日期] 2015-07-15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同时也分布于江苏、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内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规模快速膨胀,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减少,大龄留守儿童规模明显收缩。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逐渐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体。^[2]

近五年间,农村留守幼儿的教育问题逐渐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研究者的视线范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众多研究也揭示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留守”处境比学龄留守儿童更为艰难,农村留守幼儿在身心发展和学习能力诸多方面明显落后于非留守幼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症结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特别是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社会转型、大量人口流动和信息时代的渗透,传统的文化范式发生了嬗变,原生态的乡村文化的稳定性和封闭性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农村既丧失了本土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尚未能出现兼顾传统与现代的良性过渡,表现出凋零、断裂、缺失的文化状态。这种文化状态带来了农村家庭的居住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突变,对新型城镇发展的未来主体——早期儿童的发展更是产生了难以表述的影响。哈佛大学儿童中心的研究指出,早期经验改变基因表达并长期影响人的发展,并从生物发展观解释早期经验如何渗入学前儿童的身体及其过程,证实了消极的早期经验可以在客观的物质的生理的层面削弱儿童健康发展基础,可能造成对儿童发展某个方面的摧残性打击,而儿童与家庭以及周围关系所构成人际环境的不利条件则是消极因素之首位。^[3]

因此,研究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不仅直接关系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近十几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力图总结并澄清一些关键问题,为今后深入的研究做一些铺垫。

二、社会支持系统研究

社会支持的初衷及目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帮助。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支持是基于“支持需求是从人类基因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本能的福

利”的观点,以心理失调的社会原因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病原学所采用的一种理论,用以说明互动、社会网络和社会环境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受挫折感和剥夺感所产生的影响,着重对社会生活有困难者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Kaplan Cassel,1977)。

1. 社会支持的内涵

一直以来,社会支持的界定还存在分歧,其内涵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解:其一,从社会学的人际互动角度理解,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以及动态的人际历程。与社会网络、社会整合观点相提并论,依赖于人际资源的建立,强调个体与关系之间的互动及其所获得的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刘军,2004;罗家德,2005)。其二,从心理学的社会关系主观体验的角度理解,社会支持即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心理量化表征,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陈旭,2013)。

社会支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由个人、群体、社区和社会实际提供或可以察觉到的支持性资源之间的关系。社会用以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方式表示肯定和支持,从而影响个体日后行为方式的动力系统。具体来说,它一般是由政府支持、组织单位支持、社区支持、个人社会网络支持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服务和支持系统。

2. 社会支持的构成要素

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行为和社会支持对象是社会支持的三大要素。社会支持主体即社会支持的施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应包括各种层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对象是指社会支持的受者,就国内绝大多数研究来看,仅限于弱势群体(徐莉,2012)。

3. 社会支持的内容和形式

社会支持行为即社会支持的介体,连接主体和对象的社会支持内容和形式。社会支持系统是指由若干社会支持要素以一定连接方式构成的具有社会支持功能的有机整体。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又构成不同的社会支持系统,我国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分类研究。

从主体角度分,社会支持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正式支持、社区提供的“准正式支

持”、个人社会支持网提供的“非正式支持”以及社会工作提供的“专业技术性支持”(林顺利,2010),亦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主要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正式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主要包括家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无名小团体等非正式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肖昊,2012)。

从客体角度分,可分为客观性社会支持系统(由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社会支持行为构成,如物质援助、帮扶行为等)和主观性社会支持系统(由以社会支持对象主体的感知为认定前提的社会支持行为构成,如安抚、同情、尊重等);从客体所处环境系统来分,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宏观(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社区委员会等)、中观(家庭和学校)和微观(个体从外界得到的物质或精神帮助,或者是个体对外界支持的感知等)三个层面(雷鹏,2010);依据社会支持与客体的远近程度,可分为与个体及个体日常生活紧密接触的近端支持(如儿童日常生活、学习中紧密接触到的同伴、同学、老师、抚养人等儿童可以与之面对面交流的支持源),以及与个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远端支持(既有可能是直接支持,如在外务工的父母的情感或物质关怀;也可能是间接支持,如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构成。

以内容为依据,社会支持有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支持和评价支持四种类型(卢德平,2009),可分为社会支持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信息、技术和心理等等系统。也有学者从构成要素着手,认为社会支持系统至少包括支持源、支持行为或活动、被支持者对支持活动的主观感知和评价三个方面(邹泓,1999)。

4. 社会支持的测量方法

由于学者对社会支持的内涵理解各不相同,在研究中也各有侧重,出现了较多的社会支持的测量方法。Sarason 等人的社会支持问卷、Henderson 等人编制的社会交往调查表、肖水源改编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Furman 等人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 Zimet 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都被广泛使用(雷鹏,2010)。

三、学前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教育研究

1. 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特别是对义务教育阶段(6—15 周岁)的留守儿童研究,早已广泛开展,但

对农村学前留守儿童(0—6 周岁)的研究是近十年才开始关注的热点问题。

相当多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我国中西部农村某个区域范围内的留守幼儿的生存与发展现状,这些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幼儿是幼儿中的弱势群体,大多具有生活隐患较多、生存状况不佳等问题。由于家庭教育中父母的缺席、隔代教育的不足以及缺乏适宜的农村幼儿教育,从而造成农村留守幼儿的处境比学龄留守儿童更为艰难。^[4]目前社会各界对留守幼儿群体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同情(王青,2007;蔡迎旗,2007;牛桂红,2009;和建花等,2009;张家勇等,2012)。

更多的研究者将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进行了发展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幼儿在身心发展和学习能力诸多方面明显落后于非留守幼儿,由于家庭教育特别是父母育儿的缺失对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化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体质健康方面,通过 13 项测试项目测查发现留守幼儿的体质指标与国家儿童同年龄段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贾邵辉等,2012)。

在认知发展和学习能力方面,农村留守幼儿在思维发展、安全认知发展、社会认知发展、言语发展等方面明显落后于非留守幼儿。例如在安全认知和自我保护、卫生等方面水平较低,倾听和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不懂礼节,缺乏爱心和同情心,艺术活动兴趣和科学探究兴趣缺乏,感知觉能力和已有知识经验与城市非留守幼儿相比存在很大差别。幼儿园性质与对留守幼儿的重视程度、家长与留守幼儿互动的质量及监护者的学历等因素都会对留守幼儿认知发展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吴凡等,2009;徐新华等,2009;史爱华,2012)。

由于缺乏情感交流,农村留守幼儿在社会性发展方面表现异常:性格缺陷、情感淡漠、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差、行为偏差、生活习惯差。其社会化发展水平普遍低于非留守幼儿,与城镇幼儿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周念丽等,2012)。在人际冲突方面带有负面情绪、肢体冲突频率较高、冲突解决消极被动等特点(刘海,2012)。农村留守幼儿的抑制性控制能力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攻击行为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留守幼儿的抑制性控制与身体攻击、总攻击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留守幼儿的抑制性控制对其身体攻击和总攻击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曹晓君等,2012)。

但是,目前学界对留守幼儿的概念界定特别是年龄的划分还存在分歧,对农村留守幼儿问题的区分性理解还需要深入;对农村留守幼儿自身的价值理解、儿童权利、儿童福利的探讨有待加强;以农村留守幼儿为代表的学前弱势群体的政策体系研究应是重中之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同对象的比较研究、先进经验的借鉴研究、新型视角的引入研究仍需要加强(陈世海等,2012)。为此,研究者呼吁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任云昌,2008)。

2.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

当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涉及“现状调查”“问题探讨”“家庭教育缺位、功能缺失对留守儿童心理的影响研究”“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家庭生态系统的考察”五个方面。这些研究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是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由于家庭人伦情感和家庭功能缺失,导致家庭教育缺乏或失衡;其家庭教养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亲子关系的残缺或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情绪情感、道德和人格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研究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变迁是其三大教育困境之一(崔丽娟等,2007);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意识较为传统,家庭情感需求强烈,对家庭冲突敏感,对家庭应对困难的能力及方式感受深刻,并存在年龄差异(符太胜等,2011)。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和教养模式类型大致可分为“单亲教育”型、“隔代教育”型、“寄养教育”型和“同辈或自我教育”型(陈焕达,2007;李孝川,2012)。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可分为“亲子教育”和“监护人教育”两部分。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对其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社交焦虑及孤独感有负面影响(张介平,2012);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差异,且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主观方面,与父亲分离对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一定的影响(唐有财,2011)。分离后,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比非留守儿童的差(张艳,2013),其频率与方式显著影响安全感的发展(李翠英,2011)。亲子教育沟通方式单一,主要是“远程式”电话教育,交流多集中于学习情况,而缺乏情感、思想的交流。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交流也较缺乏(张胜等,2012),多数监护人能实现对孩子的“监护”职责,但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教育意识

薄弱等问题,将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寄托于学校教育,更忽视同学、朋友对其的影响(孔炜莉,2009;王如冰,2009)。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及沟通方面的困难与需求存在。存在差异祖辈和亲友监护的留守儿童面临更多生活、学习及沟通方面的困难与需求,而单亲监护的留守儿童与普通幼儿在面对的困难与需求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张娜等,2009)。单、双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的相同变化有物质生活、生活照顾、监护人学习管理、家庭气氛、父母关爱五方面;不同变化有双留守儿童与祖辈缺少沟通、祖辈监管不力、祖辈放任管教,单留守儿童的母亲心情变差、命令与训斥增多、严厉惩罚增多。除物质生活变化外,其他变化均为消极变化(范兴华,2012)。

有研究者指出,儿童早期家庭养育方式与留守后的教养环境比较,两者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影响是有差异的,早期家庭养育方式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因子与儿童留守后的心理发展有不同程度相关,儿童留守后的教养环境所有因子与他们留守期间的心理发展或多或少均有不同程度相关。留守后的教养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似乎更广泛也更显著(李如齐,2012)。留守儿童处在相对不良家庭环境中,不良的家庭环境因素与不良人格特质、行为问题、学业不良高相关,且后三者密切关联,相互加剧(范方,2005)。不良的家庭环境因素也与留守儿童消极的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相关,且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相互影响(洪恬等,2012)。家庭育子目标和教养角色错位,缺乏完整的家庭教养及有效的介入,再加上一些农村经济落后、文化荒芜、治安混乱等外部环境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导致家长期望目标失效,另一方面导致留守儿童价值体系扭曲,品行失范;影响其生活生存技能的养成;心理健康水平低下,易出现性格问题、人格缺陷和心理失衡(张礼,2008;杨邓红,2009)。

从家庭生态系统来看,农村留守幼儿社会化面临的环境系统不完备,其中家庭微系统缺损,由此导致与其相互作用的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要使农村留守幼儿社会化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其所处的已缺损的环境系统进行修复(寇冬泉,2007)。

因此,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家庭教育,依托社会支持理论,将其放置于社会支持系统中考察,了解留守

幼儿生存和家庭教育现状以及需要的社会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四、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研究

当前,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主要涉及“现状调查”“因素分析”“理论建构”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问题行为的关系”四个方面。这些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既包含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支持、公益组织等,还包括微观系统的个人社会网络支持,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微系统的失衡,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会波及其社会支持中的其他系统;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考察,认为社会支持系统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主张构建适宜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对留守儿童的生活进行全面的支持与干预。^[5]

研究者测量发现,客观支持项目上,非留守儿童显著大于留守儿童;在主观支持项目上,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支持的利用是影响留守儿童采用合理化、自责等不成熟型应付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支持总分上不呈显著性差异(段玉香,2008)。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非正式支持构成,即血缘支持和私人支持所构成(杨竹,2010)。作为社会支持客体,留守儿童所在家庭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回应社会变迁的冲击,并在留守儿童学龄前和学龄期的生命历程中,分别作出“重生活抚养、轻社会抚养”和“双系生活抚养,单系社会抚养”的策略。留守儿童家庭抚养的决策时机不仅与留守儿童个体生命历程的“标准时间表”保持一致,而且其决策过程和时机往往依托留守儿童与他人构成的关系网络和抚养资源,来回应社会历史力量的冲击(杨汇泉,2011)。

在学前教育领域,冯晓霞(1997)最早提出建构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即为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与支持问题。有研究者主张通过建立政策调控机制、专业支持机制、社区参与机制、传播媒介规范机制等策略以构建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颜雪梅,2005)。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社会支持主体角度提出了解决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政府职能本身不仅是重要的社会支持因素,政府职能定位还会影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支

持系统的发育。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支持的可持续成长,有赖于政府职能对教育社会支持的引导作用的重新定位(陈华,2013)。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从投资、制度调整、各部门协调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改革,协调推进,以解决农村“留守幼儿”问题(刘璐等,2007)。

幼儿园作为留守幼儿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应主动承担教育责任。通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提高幼儿园办学质量,举办各类培训活动以提升监护人教育观念,开展家园互动活动以满足幼儿亲子依恋等措施,探寻农村留守幼儿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张亭亭等,2012)。应探索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补偿留守儿童情感缺失的途径(段雪景,2011);心理干预对留守儿童亲子沟通质量的提高有一定效果(张艳,2013)。

一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对留守幼儿的家庭教育进行了支持。例如,北京市四环游戏小组在流入地借助社会力量组织读书会来激发留守儿童家长的教育责任和意识,进行了改进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实践(李慧英,2010);南京晓庄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留守幼儿支教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形成了留守幼儿支教的“晓庄模式”(何文秋等,2012)。

由于留守儿童属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有现象,国外相关研究极少,但有大量对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支持研究。各国为保障低幼儿童具有公平、良好的开端,都在探索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强调社区和志愿组织的帮助和政府的扶持与协调作用(Kay Tisdall,2000),包括美国的“提前开端计划”、英国的“国家儿童看护战略”、OECD国家的儿童教育和看护补助项目等(蔡迎旗,2010)。

自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者开始关注学前教育质量(child care quality),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挪威等都对此进行过大规模的追踪研究。研究者确认,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带来不同的儿童发展结果(NICHD ECCRN, 2005; Sylva, K. 等,2006),其积极影响在处境不利背景儿童身上表现最为显著。因其对儿童短期发展和后期学校适应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处境不利儿童学前教育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问题成为国际研究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美国(Peisner-Feinberg, E. S. 等,2001)、孟加拉国(Anna C. Moore 等,2007)和印度(Nirmala Rao, 2009)等国的研究发现,即使

这些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是中等甚至是低的，学前教育仍对其学习和成就有显著性影响。在父母受教育水平非常低、儿童所处环境贫乏和缺乏刺激的情况下，哪怕只给予最少的输入（包括食物补充和成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活动），也对年幼儿童有积极的影响。201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人口计生委联合向中国政府建议将0—6岁儿童早期教育发展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同时建议特别关注贫困儿童的早期发展并纳入政府扶贫计划，以均衡发展机遇，提高国家的未来竞争力（World Bank, 2011）。

国外有效的学前教育干预项目例如美国的开端计划和手牵手项目、英国的确保开端等，都非常重视提供健康、教育、家庭咨询等领域的综合服务，整合了卫生保健、教育、父母教养指导等项目，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Neuman, 2009）。这些经验表明针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干预必须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协调社会各种服务：为儿童提供健康发展甄别和检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服务支持家庭；通过提供信息和亲职教育，将家庭支持和为儿童提供有力的教育干预相结合，必须认识到孩子在健康和安全的环境中，在亲密的、相互包容的家庭关系中才能够学得最好。

国外相关研究揭示了建构社会支持系统对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也强调在这个社会体系中设计针对生活处境不利儿童的干预项目，不管是社会服务还是学前机构教育都离不开与家庭的合作，离不开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干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初步形成了农村学前留

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框架，但为数不多的已有的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成果尚处于浅层和零散的前理论状态，有待更加充分系统的理论综合和深度的动态研究；它们主要关注留守幼儿的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某些远端支持子系统，且未触及其实质核心问题——家庭教育近端子系统来调查论证，无法解决留守儿童发展问题的根本；缺少对构建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干预方案和政策建议。解决留守儿童的发展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职能、经济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舆论、公众文化与社会群体、幼儿园的影响等各个方面整体性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将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个小系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筹协调运行、利益职责合理分配，以期最终提高其生存和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 [1] 卢德平. 中国弱势儿童群体: 问题与对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2] 段成荣等.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3).
- [3] 王坚红, 尹坚勤. 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机构评估标准 [S].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4] 蔡迎旗. 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 [5] 雷鹏, 陈旭, 关幼萌. 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干预模型的建构 [J]. 教育导刊, 2010(12).

(责任编辑 师语)

专业标准背景下幼儿教师职前培养路径^{*}

——以绍兴文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孙 燕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浙江上虞 312300)

[摘要] 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师范生树立坚定的专业信念,通过课程教学和技能训练引导师范生掌握正确的专业理念,通过实践感悟和文化熏陶引导师范生成独特专业气质,实现师德养成教育。加强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体系的构建,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加强实践过程指导,开展反思性实践,以此加强实践智慧与反思能力训练。开展学生职业素质综合评价的探索,激发学生树立综合发展的目标导向,提高自我修养,主动学习,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专业标准; 幼儿教师; 职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81-04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幼儿园教师队伍,教育部于 2012 年 9 月颁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专业标准”以师德为先、幼儿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为理念,分别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度分 14 个领域和 62 项基本要求强调了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专业标准”的颁布反映了国家对建设高质量幼儿教师队伍的热切期待,为高师院校进一步加强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环节的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纲领性的指导。近几年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使学前师资的需求缺口变大,学前教育专业扩招导致幼儿教师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幼儿教师是幼儿保教事业发展的基石,加强高素质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是幼教事业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绍兴文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深化专业标准的要求,通过开展专业信念教育、师德养成教育、构建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体系、实践智慧与反思能力训练、实施学生职业素质综合

评价等途径积极探索高素质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基本具备良好的师德修养、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毕业生以适岗能力强、成就动机高、专业发展有后劲等特点受到社会欢迎。本文从人才培养工作的实践经验出发,探讨专业标准背景下高素质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路径。

一、重视师德养成教育

幼儿教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是幼儿模仿学习的对象,教师的言行举止、仪表形象、心理健康、情绪变化、对待幼儿的态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幼儿的发展。这要求幼儿教师热爱幼儿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师德修养是幼儿教师对幼儿教育事业的信念、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融合,是一名优秀教师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其专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良好的师德修养是教师的一种品格与修养,这种品格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既离不开外在教育和引

* [基金项目] 浙江省绍兴市 2013 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专业标准背景下的高质量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路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1311511),绍兴市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训”(项目编号:201036660214)。

[收稿日期] 2015-07-29

[作者简介] 孙 燕,女,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副教授。

导,更离不开自我修炼和养成,既需要时间的滋养,又需要环境的浸濡。职前阶段师德养成教育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引导师范生树立坚定的专业信念、掌握正确的专业理念、养成独特的专业气质。

1. 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师范生树立坚定的专业信念。信念是深埋在内心深处的力量,具备无与伦比的活力。信念一旦确立就会给人的心理和行为以深远的影响。^[1]教师专业信念是指教师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认同和价值深信。是教师坚持职业理想和专业发展的精神内驱力。^[2]专业信念是个人于长期专业学习、文化背景及相关教育经验影响下所逐渐产生的概念系统,教师信念不应该是一个只在职后阶段才被重视和讨论的概念。^[3]职前培养阶段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培养他们对专业、对儿童、对幼儿教师职业的热爱之情,从而自觉加强学习和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水平。

职业规划教育的第一步是围绕新生入学教育开展“新生问卷调查”和“新生家长座谈会”。问卷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了解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对今后将要从事的幼儿教师职业的认识程度和情感态度,为制订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提供依据;家长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家长介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本专业教学情况,让家长了解学前专业学习的特点,做好配合工作。从实践来看,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对学生专业学习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职业规划教育第二步是邀请幼儿园知名园长、资深幼教教研员和优秀毕业生开设“我的成长之路”专题讲座,学生通过分享她们的心路历程理解她们对幼教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坚定信念,在获得心灵共鸣的过程中实现情感迁移,坚定学好本专业的信心和决心。实践中发现,多年以后仍有不少学生对讲座内容印象深刻,并认为对自己职业信念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职业规划教育第三步是配合人才方案中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通过第二课堂开设职业规划专题讲座。讲座一般由市、县专职幼教干部担任主讲,内容为结合形势变化分析幼儿教师的职业现状和前景、社会需求及教育部门政策等。通过讲座,学生能理性认识幼教职业,明确职业发

展愿景,找准自身定位和方向,从而坚定在校期间的学习目标。

随着教师信念理论研究的发展,研究者认为,教师信念是一个系统,可以归纳为五个领域,包括学习者和学习的信念、教学的信念、学科的信念、怎样教学的信念、自我和教师角色的信念。^[4]由此可知,教师信念的逐步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始终。职前培养阶段的专业信念教育是教师信念发展的起步阶段。职前阶段树立的专业信念可以对未来教师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导向作用,它是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2. 通过课程教学和技能训练引导师范生掌握正确的专业理念。通过教育基础理论课程,如“学前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等课程教学使师范生了解幼儿园教师职业的特点和工作要求,了解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和教育要求,理解幼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通过课程学习初步认同关爱幼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尊重幼儿人格、耐心细致开展保育工作等基本职业理念。通过五大领域活动设计、“学前儿童游戏”“幼儿园实践指导”等教育实践课程引导师范生理解科学的保育和教育过程对幼儿发展的深刻影响,理解幼儿认知发展、个性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懂得保护幼儿的好奇心、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尊重幼儿的自主选择等教育观念,并学习组织游戏活动、创设教育环境、加强家校沟通的基本方法。通过专业课程的全面学习,师范生可掌握系统而清晰的专业理念,为今后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幼儿教师专业实践性极强,职前培养阶段应开设音乐、舞蹈、美术、口语、书法等多方面的教师技能课程。要达到较高水准的教师技能,只有靠花费大量时间持续不断地练习,因此大多数师范生的课余时间是忙碌而充实的。为了促进专业技能的训练,学校可定期举办讲故事大赛、演讲比赛、文艺晚会、手工制作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除了能营造勤学苦练的氛围以外,还可培养师范生积极健康的情趣、脚踏实地的品性,有利于师德修养的进一步提升。

3. 通过实践感悟和文化熏陶引导师范生养成独特的专业气质。学前教育专业建立了校内外一体化的全程实践教育体系,学生在三年的专业学习过程中要经过共计 10 周的“一日实

践活动”(每周一天下幼儿园)、一周的回乡专业见习、两周的五大领域教学见习、八周的毕业实习和14周的顶岗实习。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三年学习生涯,对学生的观察能力、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不同要求。在耳濡目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师范生从感知幼儿到真正与幼儿交往,从理解和感受幼师的日常工作到进一步体会幼师的爱心、耐心和童心再到开展教育活动的尝试,通过自身的经历、体验、感悟、反思逐步完成师德的内化,把概念化的师德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并逐步树立关于幼儿、关于教学、关于教师角色等正确的教育观念。

重视专业文化的建设,充分挖掘各种资源,为人才培养服务。上虞是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家乡,当地以“鹤琴”命名的小学和幼儿园在践行“活教育”思想、开展教育改革等方面在省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可组织学生参观鹤琴幼儿园和鹤琴小学,理解“一切为了儿童”的教育观;组织学生开展陈鹤琴教育思想学习和研讨活动,体会陈鹤琴先生“活教育”思想在当今教育实践中的传承与发展。动员全系师生征集系训,提炼作为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专业取向。久之,专业教育文化氛围的浸濡和熏陶在高素质幼儿教师的师德养成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师范生经过三年系统的学习和专业训练,不但能熟练掌握教育理论和技能,而且开始具备学前专业特有的品德心性和气质修养,并通过言谈举止、个性风度等表现出由内而外的独特的专业气质,为成长为高素质的幼儿教师作好准备。

二、加强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体系的构建

构建高效实用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有助于学生掌握幼儿发展知识、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通识性知识,为培养高素质的幼儿教师奠定全面而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在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认真研究、吃透精神的基础上,制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新的人才方案突出了对学生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大实践课程的内容和学时,使实践课程(含校内实训课程)所占比重达到总教学学时的58.75%。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体规划,建立以“一日教育实践”活动为主

体,“回乡专业见习”和“活动设计见实习”为补充,毕业和顶岗实习为提升的“三段螺旋式”教育实践体系。即一、二年级以“一日教育实践活动”为主,学生每周一天去幼儿园观摩保教活动,同时辅以回乡专业见习和活动设计见习等方式,使学生尽早熟悉和适应幼儿教育;三年级以毕业集中实习、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等为载体,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机会,提高对未来职业岗位的胜任能力。

重视教学技能的训练。从有利于幼儿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角度对各门教育理论课程进行重新整合,进一步梳理各门课程和各年级教学内容、教育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教学技能项目的学科整合,既重视教学活动设计能力、环境创设能力、一日生活保教能力、游戏活动组织能力等综合能力的教学和训练,又重视说、唱、弹、画、舞、做等基本功训练,重视教师口语、声乐、钢琴、美术、舞蹈等课程的实践性展示和考核,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学技能考核方案》。

三、加强实践智慧与反思能力训练

美国教育家舒尔曼认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的专业”,是“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5]幼儿教师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职前教育阶段是奠定教育实践智慧的重要阶段,培养师范生的实践性反思能力有助于实践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1. 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传统的课堂由教师主宰,以教师为本位,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主动思考较少,能够发现问题并主动提问的更少。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可尝试通过改变教学设计,尝试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辅助手段去改变教学的程序和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课堂更生动活泼,让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反思。如“教育概论”课程可开设网上课堂,存放大量与课程相关的文献资料、教育视频、教学案例,开通网上课堂手机版,学生随时可以浏览教师新上传的材料,方便留言,将课堂延伸到课外。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预习习惯,学生在上课前预习内容,在第二天的课堂上,教师不需要将理论知识以传统的方式一讲到底,而是引导学生围绕学习内容开展案例分析和讨论,开放性地发表意见,最后通过教师梳理和总结,将讨论中感性的、零散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为严谨的概念、科学的观念或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在参与讨论、交流、总结的过程中,学生

对实践性问题的思维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反思能力得到良好训练,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观念在多次的激烈撞击中将慢慢内化为个人的实践智慧。

2. 加强实践过程指导,开展反思性实践。教育实践现场的多变性、丰富性和生成性是培育实践智慧的重要方式,但有效的实践必须与反思和审视相结合。学校可开设“幼儿园实践指导”课程。该课程每两周一次课,用两节课的时间讨论学生在“一日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困惑,提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策略,通过观察和分析教育现场中真实发生的各种场景,唤醒学生头脑中学过的教育理论,辨识教育直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门课程的开设一方面加强了对教育实践环节的关注,进一步提升了教育实践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对教育实践持续而直接的支持解决了学生的困惑,满足了学生的内心需求,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对亲身经历的教育场景展开讨论和反思,促进了反思习惯的形成和反思能力的提高,对提升实践智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课程的设计理念是以实践者为中心,贯彻实践问题导向的原则。课程没有教材,课程内容随着学生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不断生成。比如刚开始学生聚焦的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如何进行一次面对全班幼儿的自我介绍,如何记听课笔记,如何就某一具体问题向带班老师请教等。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学生开始关注一些出现频率较高且需要较强的实践处理能力的教育问题:如何处理幼儿之间的争执,如何评价带班老师某次教育幼儿的具体行为,为什么带班老师一离开实习生就管不好班级等。因此,围绕实践场景的各种问题就构成了“幼儿园实践指导”课程的丰富教学资源。问题来自学生的实践记录,来自学生的深刻体会,来自学生追寻教育理论之后的思考。通过实践探索,授课教师从积累的大量素材中梳理出一些比较典型、有意义的实践主题与学生展开课内与课外的研讨,这对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实践智慧将起到良好的效果。

教师是反思性实践者,^[6]职前阶段的课程教学重视反思能力和实践智慧的培养,为学生今后的专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开展学生职业素质综合评价的探索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颁布为幼儿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以及资格认定等工作提供了

重要依据。探索建立以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位一体的学生职业素质综合评价方案,既能体现国家和社会对幼儿教师职业素质的要求,又能产生指导和激励作用,激发学生树立综合发展的目标导向,使其提高自我修养,主动学习,全面发展。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综合评价方案》中,综合评价内容包括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其中专业理念又分为职业认知、专业学习态度、师德修养与行为三个指标共10项具体内容;专业知识部分由本学期的文化素质课程、教育理论课程成绩折算成学分绩点后以排名赋分;专业能力部分分成基础项和加分项,基础项包括教学技能课程成绩、专业见(实)习成绩、毕业设计成绩,加分项中包括学生参加各项技能大赛、学科竞赛成绩,考取各类资格证书及等级证书情况,因技能突出参加演出、展览展示等情况。

每学年进行一次职业素质综合评价。评价以班级为单位,在第二学年开学后第一周进行。毕业学年于学期结束前进行。综合职业素质评价遵循评价内容综合性、评价过程可操作性、评价结果发展性的原则,由各班成立职业素质综合评价小组,其成员由班干部和学生代表5—7人组成(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为当然成员),负责评价工作的实施、结果审定等工作。班主任全程参与评价工作,对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负责。评价结果由各班公示无异议、经系务会议审议后由系办存档。评价结果用作优秀毕业生评选的重要参考材料,并作为就业推荐的重要依据,供用人单位参考。

[参考文献]

- [1]杨艳玲.教师信念及其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0(4).
- [2]贾健,刘赣洪.论教师专业信念的功能[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4(4).
- [3]秦立霞.免费师范教育背景下教师信念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 [4] Berli Nerdc, Calfeerc. *Handbook of Education Psychology*[C]. New York:Macmillan,1996.
- [5]钟启泉.“教师专业化”的误区及其批判[J].教育发展研究,2003(4).
- [6]赵昌木.教师成长:实践知识和智慧的形成及发展[J].教育研究,2004(5).

(责任编辑 师语)

新型师生关系的当代伦理建构

张 勤^{1,2} 赵 敏 奇²

(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2.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46000)

[摘要] 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关系。建构新型、有序、和谐的师生关系需要坚持文化自信,拓宽文化视野,形成伦理自觉。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者需要坚持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培养为目的。有了这一使命意识,才能通过平等关系的建立,关注情境性教育,突出主体性教育,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才能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尊重、仁爱、有效互动,促进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增进师生的获得感。

[关键词] 新型; 师生关系; 伦理自觉

[中图分类号] G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85-05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关系,也是决定教育生态系统生命力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教师中心论”“儿童中心论”以及“教师和学生互为主客体”的争论虽然不断,均没有超越主客体的认识范畴,也未能逃脱传统哲学包括笛卡尔的主体哲学的影响,深陷二元对立的思维而难以自拔。就教育、伦理而言,师生关系之“应当”的探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它需要历经理论认知、行为自觉和精神境界提升,并形成一定的理论自觉。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反思·对话·文化自觉》等文章中强烈呼吁重视自己的文化传承。他认为,文化自觉离不开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同时需要接触多种文化,才能“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后“取长补短”。费孝通先生有关“文化自觉”的论述,对探讨新型师生关系之“应当”,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因此,从伦理的视角梳理中外师生关系的有关内容有利于解决师生关系中的一些困惑,增强教师道德自觉,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形成。

一、新型师生关系的文化自信

“教育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1](P.8)}。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不仅有丰富的教人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艺术,还有研究教育艺术产生的基础探究,即关注教育的依据、教育从何入手、教育走向何处等问题。这些追问为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成为增强当代教师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1. 以人原点,探寻教育依据

教育从何入手,教育的依据是什么,历代不同学家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先秦儒家的探讨对今天的影响比较深远。他们立足人本身,进行人性研究,使教育依据人性特点展开。孔子曾在《论语》中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的观点,有着对人性向善的可能性的判断。只要路径合适,个体通过自身的体悟和外在的学习与践行,最终能达到至善的高度。孟子“四心”说,关注人的社会性、社会公利等问题,强调重义轻利人性观的塑造,把人性研究与扩展人性的教育艺术追问有机结合起

[收稿日期] 2015-07-12

[作者简介] 张 勤,女,江苏盐城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

赵敏奇,女,安徽安庆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力求改善和丰富人性。荀子从另一视角探究人性,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点提出了性恶论的命题,通过人性改造完善达到善。“善”是人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先秦儒家虽然对人性关注的方位和视角不同,但都对人本身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假设。他们关于人性的假设恰恰成为教育追踪的依据,有了这些依据,才有追踪教育终极价值的可能,相应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等问题不断衍生,如为师之道在于使人知“礼义”,行“孝悌”,塑造至善之性,通过教育促进人性、人格日趋完善。

2. 以教育为基点,凸显教育本真

依据人性特点对人进行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的反观,思考教育意义之所在。先贤先哲的思考有的细化到如何进行教育,如何做才能体现教育的价值。儒家教育思想有重修身立人的传统。通过教育,要让人明晰人的存在是关系的存在。“人生不能无群”已成为其处理群己关系的基调。孔子认为,人只能与人相“与”,在人群和人的共同体中生活。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与他物的不同是教育关注的基点,教育更需要关注人的共同体遵循的规范,关注如何通过教育显现人的道德、遵守人伦的要求。儒家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修养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研究教育如何依据人的地位与角色的不同构建一套完善的人格理论体系,实施“君子”人格的总体培育。历代教育家自身追寻的道德理想,如“重义轻利”的修身传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自强精神、“仁者爱人”的宽容坦荡品性、刚强坚毅的高尚气节等,不仅成为道德教育的经典内容,而且反映了教育深切的人文关怀。他们经过历朝历代的道德实践的洗礼,越发显现教育伦理的勃勃生机和道德教育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守教育的本真,造就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支撑、有责任感和健全人格的新时代青年正是教育的最大价值,也是教育的本真。

3. 追问人的意义,关注教育使命

人的本源是什么?人如何能在浩瀚的宇宙中安身立命?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解决这些本源性的问题。德是儒家对人的本源的基本定位,以德为基点构建了严密的“以德立命”的理论体系,德化的生命成为芸芸众生的精神归依。孔子的道德立人、道德立命、修己安人等思想经过历朝历代

的演绎和发展,成为滋养心性、润泽人生的依照,不仅恩泽泱泱华夏,也以不同的形式和途径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教育领域,关于教育的主旨是什么,如何教以及教育的使命等命题恒古日新,尽管有许多不同视角的争论,但是儒家“以德立命”的精神大厦的构建,更加凸显出道德塑造对引领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师者“传道”的使命和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无疑,这些都是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的文化源泉,我们有理由去丰富和发展“好老师”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二、新型师生关系的文化视野

把握“好老师”的价值取向,建构新型师生关系离不开汲取世界先进的文化。关于教育思想的更新、教育角色的转化和学科边界的打破等方面值得关注。对此应采取“洋为中用”、进行本土化适应的态度,是建构和发展新型师生关系所需。

1. 颠覆传统观念,建构平等的教育

平等的教育观念的出现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包括哲学认识的改变。“世界是个体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2]个体的认识活动是一个过程,而认识活动一开始并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只是所有在教育活动中产生作用的因素发生相互关系并进入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时,它们才会成为教育活动中的主客体。在传统的教育视域,夸大了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忽视或者小视被教者的作用,出现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怀特海对教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论述对转变主体与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主客体作用在教育过程中是变化的,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主要国家掀起的第三次课程改革的浪潮有助于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转向。“建构主义学习观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精神”^[3],强调知识的获取是建立在对已有概念建构的基础之上,学生由被动学习、被动接受、被灌输者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认识的改变引领教育的转向。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杜威认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不是教师而是学生。他强调,“传统教育”中的教师具有独断性、命令式等特点。现代教育要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展教育活动,尽可能让学生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教师的权威来自和学生的互动,而不是“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来自和

学生的共同体验,而不是反对学生的质疑;来自“探讨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和“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所获得的共识”^{[4](P.228)},而不是单向度的教育。那种“填鸭式灌输的知识、呆滞的思想往往极其有害”^{[1](P.2)}。一种平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在改变着教育的走向。这种转向也昭示着新的师生关系的伦理呼唤,它要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向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与促进者。这一转向客观上消解了教师的绝对权威,促进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2. 转变教师角色,关注情境性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角色的变化事关师生关系的处理,即要求教师由教育权威走向参与教育过程。教师教育权威的消解促使教师通过改革教育活动,通过情境性教育让学生真实体验主动性学习的效果。约翰·西利·布朗、阿伦·柯林斯与保尔·杜吉德联合发表的《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则被视为系统而完整地论述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之作。^{[5](P.91)}美国鲍里奇编著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对情境教育理论和实施策略也有专门论述。从某种程度而言,情境性教育反映了学习的本质过程。它强调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是什么”,更重要的思考“如何是”。学习过程需要置于知识产生的特定的物理或社会情境中,使学习者在现实世界中体验现实有的生成过程。同时,通过文化实践去检验知识和真理。恰当的检验不是检验最终结果,而是取得进步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中验证的理论性知识才能使学生得到内化。具象的实践可以使学生获得对外部世界的一系列看法,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知识与活动、一定的背景和文化产品不可分割,知识不断被运用着、发展着。当学习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时,容易结合现实情况解决问题。此过程是学生亲身体验知识内在价值,了解知识应用的条件,以合适方式去建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效的教育往往是教师注意利用情境,或者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习知识,恰当地运用学习成果。情境性教育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处理师生关系的态度和能力,也反映教师引导学生解决生活实际问题、获取知识的水平和智慧。

3. 超越学科边界,强化主体性教育

主体性教育一方面需要明晰教育活动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需要解决如何运用教育

智慧调动学习主体参与教育以取得教育的最佳效果。它涉及学科领域。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拘泥于某一领域进行封闭的教育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是主张跨学科的教育。学科的边界化要求教育打破学科之间的差别、分离和排斥性格局,从不同学科视角、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进行教育。打破学科边界不仅能拓展教育思想,综合教育内容,培养创新思维,激发教育者进行创造性学习,更能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发挥学习的主体性作用。早在17世纪,科学极其繁荣,思维特别活跃,气氛宽松,此时,数学、几何学、哲学和文学共同繁荣。有丰富阅历的老师都能体会到,教育的过程需要注重教育的多样性,同时不失关心个体化教育;注重教育的多元性,同时允许差异化;注重教育的多维性,同时关注教育的内在性。斯腾伯格的“三元理论”正是强调教育应当做什么、如何让学生学会它们、如何实际执行它们。^{[6](P.43)}类似的教育往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智力,而不是培养单一的、单项的、线性式的能力。如果只局限于单学科的教育,学生往往见树不见林。而跨学科边界的教育倡导引导学生通过一棵树去认识整片森林。教育哲学的观点是要打消学科间的边界划分,根除学科之间毫无关联的状态。知识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人为地将其整体分割为大大小小的学科部分,既违背了知识的融贯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性思维。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有利于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形成,更利于促进学生整体思维的培育,启发学生把不同知识的作用由不融贯转变为融贯一致,自我创造而不失去同一性,达到主体性创造的效果,为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奠定广阔的基础。

三、新型师生关系的伦理自觉

新时代的“好老师”已成为社会的期待、家长的期盼。越是在如此情境下,越需要当代教师注重新型师生关系的伦理构建。好老师的师生关系体现尊重、关爱、和谐互动的特点,它是新型师生关系的常态、生态、智慧型的要求。

1. 由权威到参与:尊重的关系

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尊重的关系。师生关系的伦理尊重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平等式。平等性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放下身段,和学生平等交流,平等相处。这一教学过程要求教者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要求教师善于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好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二是对话式。放下身段是一种态度,对话式表征具体的教育样态。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教师需要细化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如,可以通过对话形式开展教育,也可以通过讨论式、问题式进行研究性教育和学习,它充分演绎着尊重的师生关系。三是因材施教。尊重的教育关系并非平均的、千遍一律式的教育,而是依据不同教育对象特点和个性情况进行分类教育、分类指导,让每一位学生都有长进,让优秀的学生更加优秀。一种思维训练方式不可能适合所有学生。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把握好学习的本质,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方案,实施不同的教育。尊重的师生关系可以变教育霸权、教学权威为调动学习者参与教学设计、参与教育研究,体现教育的尊重。

2. 由传授到解惑:仁爱的关系

教育伦理视域中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不仅要传授书本知识,还要结合生活图景帮助学习者解决具体问题,以关注学生的人性发展、人格完善和人生幸福,体现“仁爱”的关怀。这里所说的人性发展,就是要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挖掘学生的潜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让其更好地发展心性和智慧,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人格完善,主要是指学生的成长不仅仅是获取知识、发展心智,还包括道德的涵养、心灵的建设以及审美水平的提升。学习者的德、智、体、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人格的完善和人才的健康成长。人的幸福离不开道德的丰满、创造幸福生活能力的提升和贡献社会价值的不断增大。当学习者具有生存的本领,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懂得创造幸福生活,努力为社会和人类作贡献时,没有理由不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教育的仁爱是一种大爱的教育,它从伦理上要求教育关爱人性的发展,关心人格的完善,关注人生的幸福。要在每一个维度上寻找与生活的“结合部”^{[7](P.138)},“达到提高自我的最重要的境界”。“教育是生活的过程”,“教育正是生活本身”^{[8](PP.9-10)}。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坚持立足生活原点,促进学生在“生活场”上不断积累和提升。

3. 由线性到多维:互动的关系

传统的师生关系大多是单向度的、线性式的关系,即我教你学、我讲你听,而新型的师生关系

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

(1) 在教学活动中获得感——教学相长

教育活动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伴随着师生互动及其相互作用而愈发丰富且充满生机。新型的师生关系利于设计和实施多维的、多边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容易起到互动的效果。那种单向度的、线性式的教育活动难以让学生有空间、有机会参与教学和自我发挥。在信息化时代,这种互动的教育活动不仅使教师有机会从教育对象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促使教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还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增强自信,提升自我教育的水平。另外,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也是教师开展教育活动的助手,能帮助教师开展有声有色的教育活动。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利于增进师生的获得感,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2) 在教育活动中获得感——共同成长。

教育过程是需要不断反思和不断实践的过程。教师往往是在这“不断”获得的过程中成长的。而帮助教师获得感悟和灵感的正是学生。很多名家、大师的日志中都有此类的记载。这些记载有的表达了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的心迹,有的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什么感悟,都与教育对象的促进和帮助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教育对象成就了教师的事业。另外,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教育家的思想,包括教育灵感的迸发等等,离不开教育生活的源泉。而教育生活的主要对象还是学生。教育家关注的教育现象同样离不开教育对象。那些有思想、有个性、有情感的每一位学生构成的丰富的教育生活世界为教师的发展、大师的生成提供了生活基础,也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活水。“好的教育利于好的师生关系形成,好的师生关系利于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利于促进未来好公民的培育”^{[9](P.159)},利于促进教育的现代化。

(3) 在发展中有获得感——自我教育。

教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教师的自我教育,不断自省自律而获得的。教育伦理要求教师有较强的自律意识和自律精神,它要求教师时时、处处践行教师道德,加强自我教育。越是注意自我教育,教师发展的可能性越大。在新型的师生关系中,对教师的自律情况最有发言权、评价最具体的往往是学生。学生既是教师得以迅速发展的间接推动力,也是促进教师迅速发展的义务监督人。新时期“好老师”的自我教育往往促进其收获成功、

收获喜悦。这种获得感往往是其他从业者无法体验的,当然要求也是最“苛刻”的。它是一种高度的伦理自觉。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点点滴滴都能引起教师的反思和触动,都能促使教师深刻反思并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新型的师生关系中,学生成为教师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鞭策者,也是促进教师不断创新和超越的驱动力。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教学思想、先进的教学理念;不仅要与时俱进,创新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还要有服务学生成长的奉献精神和大爱情怀。教师的自我教育一方面是教师伦理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对象的鼓励和鞭策;既与教师职业特点有关,也与教学对象的期待和“评价”有关。新时期的教师只有面向未来,立足实际,追求卓越,才能超越当下。首先,超越单纯追求通用答案的知识教学,逐步进行探究型、研究型教学。其次,超越单纯讲授、灌输,逐步翻转为互动、体验的多样化教育范式,激发师生在互动中产生碰撞,生发新思想。第三,超越死读书、读死书的具象,形成教书育人、合力育人的教育生态,让更多的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如此超越,表征教师对“好”有新的“觉解”^{[10](PP.291-292)},达到一种伦理自觉,它对建构新型的师生关系、促进师生共同成长具有全新意义。

[参考文献]

- [1][英]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 [2]杨富斌. 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评述[J]. 国外社会科学,2003(4).
- [3] Applefield, James, M. Huber, Richard, Mahnaz. Constru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J]. High School Journal, 2000 (12)/2001(1).
- [4][加]小威廉姆·E. 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 [5][美]戴维·H. 乔纳森.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美]鲍里奇. 有效教学方法[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7]朱小蔓. 情感教育论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8][美]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9]Kerry J. Kennedy, Gregory P. Fairbrother, and Zhao Zhenzhou.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China: preparing citizens for the Chinese century [M]. New York: Routledge 711 Third Avenue, 2014.
- [10]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师语)

(上接第 12 页)

- [8][奥]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谈本能与成功[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 [9][英]洛克. 人类理解论(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0]习近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843368.html>, 2010-09-28.
- [11]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EB/OL]. <http://www.xinli110.com/xxlp/xwsp/ljjs/200706/32733.html>, 2007-06-21.
- [12]习近平. 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 [N]. 人民日报,2014-02-28(01).
- [13]季拥政. 泛在信息社会及其基本特征[J]. 图书馆学研究,2011(10).
- [14][俄]康斯坦丁·科林. 信息科学发展前景展望[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
- [15]王小东. 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16]未来智能终端的通知趋势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6/27/c_133441171.htm, 2014-6-27.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视角下的教师教学力研究^{*}

石 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 教学力是一种包括教学能力在内的教学合力。它是衡量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一项综合指标, 透过大学教师教学力, 可以综合评价大学整体教学水平。大学教师教学力主要由教学动力、教学能力、教师影响力、教学管理力等要素构成, 它们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力和谐发展。

[关键词] 普通高校; 教学; 教学力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90-04

为了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提高普通高校本科教学水平, 教育部针对普通高等学校提出了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意见(教育[2011]9号文), 随后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年底, 提出在普通高校内开展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相关办法, 其目的就是要以评估来促进普通高校的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1][2][3]}。教师教学活动始终是所有学校的中心工作, 因此大学教师素质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发展, 而如何科学评价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则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为视角, 借助“教学力”这一概念, 来探讨有关大学教师教学相关问题。

一、研究背景

对普通高校而言, 教学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学校的正常发展。一方面, 学校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进一步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使命感,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优化教学方法, 加强各类教学技能和专业水平的锻炼, 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 包括学校相关专业部门及上

级主管部门在内的管理机构, 要通过制定科学的教学效能评估机制, 来科学评价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质量和水平, 从而引导学校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 以深化教学改革并有效推动教育工作高效发展。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贯穿于大学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不仅包括了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察评估, 还包括针对办学思路、教学条件利用、质量管理、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等系列内容的评估, 目的就是为了有效促进整个教学活动的科学发展。

当前, 对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评价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教学能力”这一范畴。事实上, “教学能力”一词更多的是反映教师的教学技能, 即教师为了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而具备的个人特质、专门知识、技巧及特定的教学方法等, 往往围绕课堂教学而展开。随着社会的发展, 教师教学的内容、形式和要求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对大学教师而言, 不仅需要传授学生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 而且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交往、就业指导、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均担负着重要使命。因此, 传统的“教学能力”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大学教师的教学素质和教学质量。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教师教学力评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2013SJD880088)。

[收稿日期] 2015-06-10

[作者简介] 石 丽, 女, 江苏仪征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二、大学教师教学力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在我国相关研究文献中，“教学力”一词出现的频次并不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教学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包括教师对理论和实际深入研究的功底，也包括其教学艺术的高低和教学手段的好坏，还包括学员配合的程度”；“教学力就是指学校在教学活动中所具有的教学理论研究与应用能力、教师的教学力、学生的学习力、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教学模式、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等要素所整合而成的教学力量”；“教学力涉及到教师的性格、意志、生活经验、社会关系、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等要素，教师在改造教学活动和实施教学过程中一切关系和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6]等等。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将“教学能力”即视为“教学力”。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结合目前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理解，大学教师教学力应该是一种包括教学能力在内的教学合力，是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教学动力、教学效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不仅包含大学教师自身的业务知识面，如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新知识的学习能力；也包含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培养水平，如传授学生各类知识的能力和指导学生适应社会及后续科研等能力；还包含大学教师的教学持续力，如教师教学的理念、教学效果的保障措施及教学研究与创新能力等。大学教师教学力的大小取决于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与发展所产生的综合力，它是衡量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一项综合指标，透过大学教师教学力，可以综合评价整个大学整体教学水平。

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为视角，利用“教学力”这一特定概念研究大学教师教学全过程，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1]。对教学质量评判的科学性，将直接影响到大学教育的定位方向和教师教学的发展轨道。传统的以“教学能力”为主线的评价体系，依然是集中在课堂教学方面，往往是单方面的，或者是多方面但彼此孤立的，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当代大学教育质量。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教育就是力的表现”，教学力是整个教学活动中各个“力”的合力，是各个“力”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因此，利用教学力来研究大学教师教育综合水平，显得更为客观与全面。

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点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评价、监督、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通过教学评估不仅能鉴定学校教学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具有激励和督促作用。无论是新建还是原有普通高等学校，其相应的本科教学工作的合格评估、水平评估及审核评估，均明确了一系列评估范围和指标体系。因此，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为视角来研究大学教师教学力，确保大学教师教学力这一概念内涵更加具备针对性和导向性，同样对理解并构建大学教师教学力要素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教师教学力的构成要素分析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主要有学校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人才培养过程、学生发展、教学效果等几个方面。透过这些评估指标，结合具体的大学教学活动特点，本文认为，大学教师教学力主要由教学动力、教学能力、教师影响力、教学管理力等要素构成。

教学动力，是对大学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确保教学过程持续发展、实现大学教学目标起促进作用的一股力量。从动力来源看，大学教师教学动力可以分为外部教学动力和个人内部教学动力。外部教学动力主要是指大学对教师教学的规划定位、方案政策、鼓励措施及管理方式等，以及社会对大学教师教学的支持与肯定等内容；个人内部教学动力主要涉及到大学教师个人对教学职业追求、目标发展规划以及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是保障教学力提升的一种内在力量。外部动力只有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方案来看，大学教师教学动力主要涉及大学的办学定位、发展目标、学校领导的办学理念、学校规划、教学地位、人才培养的思路、教师任职经历培养措施、青年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规划与措施、教学经费的投入等方面。

教学能力，是大学教师顺利完成教学目标或者教学任务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素质与技巧。从教学过程和形式来看，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一般包括教学准备能力、课堂教学能力、课后辅导与跟踪管理能力等。教学准备能力是指大学教师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具备的教学内容分析能力、

教学设计能力、教学方法选择与创新能力等;课堂教学能力是指大学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课堂讲课及语言表达能力、因材施教能力等;课后辅导与跟踪管理能力是指大学教师的作业批改和辅导能力、教学测试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能力等。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为视角,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涵盖了教学大纲制定与执行、教材建设与选用、课程教学规划与执行、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能力、信息化及其他教学设施的利用能力、实验教学和实习实训的指导能力、考试考核方式方法、学生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能力、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能力、第二课堂教育能力、教学方法与评价能力等方面。

教师影响力,是大学教师基于自身的职业权威、人格魅力、自我形象魅力及自身教学技能等,并通过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学生、学校、社会等对教师教学活动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能力。构成教师影响力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主要是源于教师的职业权威及为了保障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一些强制性要求等;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大学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如个人形象、教学艺术、教学情感等^[6]。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过程中,大学教师的师德师风、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经历、职业资格、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师生评价等均属大学教师教学力中教师影响力的范畴。

教学管理力,是大学教师在教学环境下,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与创新等手段,制定适当的教学决策,使得教学活动完成得更为有效的一种能力。从根本上说,大学教师的教学管理力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能力,就是要求大学教师具备教学应变能力、教学决策能力、承受教学压力的能力、激励学生学习的能力以及明确教学效果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与大学教师教学管理力相关的指标有:教学质量保障能力、课堂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质量监控能力、教学质量信息利用能力、教学质量改进能力以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措施、学生学习范围的营造、校园文化的开展等方面的能力。

四、大学教师教学力的要素关系分析

大学教师教学力的几个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教学力的发展,其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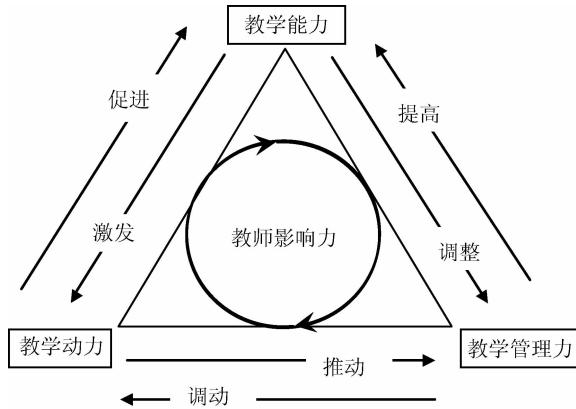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教师教学力结构关系

其中,教学动力为教学能力和教学管理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与推动作用,教学动力越强,教师教学热情就会更加高涨,自身求知与教学专门技能的培训与提高的欲望也更高,包括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协调、教学方式创新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教学能力也将得到持续不断的支持;而随着教学管理力和教学能力的提升,大学教师也能充分享受到教学成效带来的成就感和被认同感,从而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发和调动教学动力。另一方面,教学管理力的提升,促使大学教师在教学计划、教学组织、教学协调、教学评估、教学研究、教学创新等诸方面的能力素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发展;而教学能力的提升也会反过来不断优化调整教学管理力,使得大学教师在教学执行力、决策力、亲和力等方面的教学管理力不断得到加强。教学动力的持续保持、教学管理力和教学能力的不断发展,使得教师影响力不断扩大,学生、学校以及社会对大学教师教学工作更加易于接受和肯定,从而形成良好的教学发展氛围,并对教学动力、教学管理力和教学能力施以潜在的催化作用。整体上,大学教师教学力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谐发展,使大学教师教学力形成良性的递进式提升与发展模式。

五、总结

教学评估是国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在促进高等教育学校树立现代教育观念、规范办学活动、落实教学工作中心地位、提高教学整体素质等诸方面,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教学理论研究及大学教学实际工作中,往往依旧习惯于通过教学能力、教学绩效等指标来反映和评价教师素质、教学水平及整个教学活动,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已经表现出不相适应。

“教学力”这一概念内涵极其构成要素,可以全面反映大学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综合水平,是衡量大学教师教学工作和学校整体教学活动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通过教师个体教学力的合力,能够反映整个学校的整体教学力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部对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活动的持续开展,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大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评估体系的重要性,并根据对大学教学行为的理解和教学活动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评估指标体系,确保各类评估体系更加科学和实际,有效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力发展,并促进大学教学成效整体提升;同时,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为视角研究大学教师教学力,对促进大学教师素质、教师教学水平以及大学办学水平的提升以及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均有着其特定意义,可以更好的推进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和大学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强化大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能够从不同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大学教师教学力的理论和解释方法,使得大学教师教学力也逐渐成为大学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接第 23 页)

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身时,其中美德之有无及水平之高下就凸显了美德资本的差异及其对个人、组织和社会利益的增益的显著差异。这样,我们可以大体得出“教育—知识—美德—资本”这一相互支持增益的关系路线。

[参考文献]

-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2]唐任伍.哲学学习小百科[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
- [3]宋洁人.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EB/OL].[2011-10-13].<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68/201403/165450.html>.
- [2]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EB/OL].[2011-12-23].<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68/201403/165457.html>.
-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EB/OL].[2013-12-5].<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68/201312/160919.html>.
- [4]周明生.科研是第一教学力[J].唯实,1999(11).
- [5]马必学,刘晓欢.提升学校教学力 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建设[J].中国高等教育,2008(21).
- [6]樊泽恒.论大学教师的教学力[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责任编辑 晨 晓)

-
- [5]李石.重温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反驳与辩解[J].道德与文明,2003(1).
 - [6][西]西松.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为什么美德如此重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7]王小锡,华桂宏,郭建新,等.道德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8]王小锡.道德力与社会进步[J].阅江学刊,2009(10).
 - [9]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0][美]里德雷.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11]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师语)

关于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朱 韩 兵

(宿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安徽宿州 234000)

[摘要] 在分析当前高校教师教育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方法,对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教师教育实践教学除了实现工具理性之外,更应该关注价值理性;教师教育实践教学要为教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使高校教师最终成为反思型实践者;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要注重师范生实践性知识的获取,并将实践性知识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关键词] 高校教师教育; 实践教学; 价值理性; 实践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 G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94-04

高等教育承担着文化传递和知识创新的使命,教师教育更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文明传承人。在高校教师教育过程中,普通科学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是师范生学习和掌握的重点,在未来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不管是教师还是在校师范生,都更偏爱所学专业的课程文本和精深理论,有意或无意忽视教育实践生活本身。高校师生不约而同地选择性回避教育现实问题,远离中小学校和中小学生,更愿意在大学课堂里就“理论”论“理论”,或玩弄文字游戏,在享受精英教育崇高的同时,与真实的教育生态渐行渐远。究其原因,除了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涉及理论认知层面的问题。追根溯源,本文将从几个理论问题展开论述,以厘清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方面的认知困惑。

一、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的价值理性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单纯追求行为的功利性动机,借助理性工具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实现绩效最大化。而价值理性更为关注行为的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关怀人性世界和人文精神。西

方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工具理性不断挤压价值理性,致使价值理性逐渐边缘化。工具理性不断衍生出科技崇拜思想,造成现代职业形态对科技的偏执追求,却对人生意义产生麻木感和漠然态。结果必然导致现代生活的文化危机以及对自由人性的约束和禁锢,而这一问题在教师教育领域尤为严重。如果说工程师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相对而言危害性较小,因为其工作对象是“机器”,是“物”,但中小学教师职业面对的是成长过程中有思想、有精神活动的未成年人,价值理性和人文情怀的缺失则是致命的。

当前普遍的观念认为,教师教育过程中,实践教学主要为了让师范生获取专业技能,提高未来从事教育教学必备的实践性知识。这种观点反映出指导和约束教学实践的理性出现了问题,存在实践教学价值理性迷失、工具理性独大的现象,强调的是师范生教学技巧和教学能力至上的倾向。^[1]从价值理性层面进行观照,教师教育既是职业教育,也是养成教育。教育教学实践与教育的价值追求应该是自洽的,实践教学不仅能提高师范生的实践知识和实践能力,也是职业精神、职业

* [基金项目] 宿州学院校级教研项目“基于实践教学范式的高校教师教育理论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zxyjyxm201243),宿州学院校级教研项目“团体辅导技术在应用型地方高校公共心理学教学中的运用研究”(项目编号:szxyjyxm201244)。

[收稿日期] 2015-07-20

[作者简介] 朱韩兵,男,安徽安庆人,宿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讲师。

道德和职业理想形成的重要途径。师范生在实习见习过程中,通过与所教学生的接触和互动,逐渐形成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群体的尊重;在赢得教育教学成绩的同时,不断强化从事教育事业的愿望和信心。所以,高校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实现师范生对教育教学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学生的爱与尊重,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追求和忠诚信念。

二、实践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十多年来,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要求,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而改革成败的关键点在于教师的整体素质是否提高。在基础教育新课改的大背景下,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要求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单凭普通文化功底和精深学科知识驰骋课堂已不合时宜,它还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素质、广阔的职业情感以及一定的科学精神和能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教师职业可持续的、健康的专业发展。

传统教师教育强调能力本位,强调学科知识、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的批量生产,使中小学教师失去了批判地分析、思考复杂的教学背景和过程的愿望与能力,逐渐沦为每日重复业务的技术员或教书匠。即使在短时间内教学效果良好,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将逐渐失去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的机会和能力,最终会被教育改革的现实所淘汰。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呢?虽然职后的学习和培训也是重要途径和手段,但高校职前教师教育应该是首要选择,而加强实践教学则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不二法门。在高校教师教育阶段,应加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化实践性课程,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师实习制度,为师范生未来的专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2](P.163)}首先,在大学课堂教学环节,为了加强实践教学,教师应运用案例教学和临床教学,向师范生呈现中小学教育教学真实案例,通过模拟教育教学场景,让师范生进入案例现场,通过讨论或研讨,以及各种信息、知识、经验和观点的互动以达到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PP.14-15)}而此种能力是教师职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其次,在高校教师教育实习阶段,师范生作为实习教师直接参与中小学教学和管理工作,在此过程

中,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行为逐渐由习得性理论知识的支持转变为由理性经验所支持,这种理性经验不仅包括在课堂教学中所获取的书本理论和操作技能,更应该包括经由反思而形成的案例性知识和个人化的实践知识,还应包含关于教学策略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的环境知识等。^[4]事实证明,这类理性经验是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的重要区别之一。再次,在实践反思环节,师范生往往会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行为进行总结和思考。实现途径既可以采取个体独自反思,也可以形成反思实践共同体,还可以将个体反思与群体反思两种方式相结合。^{[5](P.200)}实践反思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写反思日记,除此之外,也包括与其他同伴的反思对话、实施微格教学、创建档案袋和开展行动研究等方法。通过实践性反思,师范生可以不断发现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获取最佳的解决方法,同时对自己的教学观念予以价值澄清,理性审视教学行为并进行自我完善。实践证明,反思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智慧来源。^{[6](P.95)}

通过实践教学,师范生从具备理论、知识和技能最终上升到具备实践智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善于把握自己专业发展状况的反思者实践者。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师范生的专业发展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使其尽快从新手教师走向成熟的专家级教师。

三、实践性知识

1. 何为实践性知识

舒尔曼(LEE S. SHULMAN)提出三种形态的知识: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案例知识(case knowledge)和策略性知识(strategic knowledge),过去一直关注和讨论的常规领域和特定知识类型基本都是命题知识,包括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和课程知识。^{[7](PP.139-140)}命题知识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之为陈述性知识,类似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所说的显性知识,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这类知识可以统称为理论性知识,其优点不言而喻,它是将某一领域里的知识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简洁呈现,包容和简化了很多复杂要素。然而命题知识也有明显的不足。首先,当一系列知识内容聚合在一起时,难以记忆;其次,命题知识虽然简洁明了,但它们是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ed)

的,只具有实质性内容,却缺乏时空性和现场感。然而,从便于记忆和合理运用的角度出发,情景和气氛等脉络都是必要的。

相对于理论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则能很好解决其存在的问题。顾名思义,实践性知识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并非仅停留于书本,它更多表现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传递出来的动态知识,突出其实用性,支配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行为,包括教师的教育理想和信念、自我意识、教育机智、策略性知识、人际知识和批判性知识等。实践性知识通常呈现内隐和缄默状态,它难以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与理论知识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适性等特点相比,实践性知识则具有个体性、价值负载性、情境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实践性知识基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个性特征,紧密结合日常教育教学情境和行为,并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功能。^[8]实践性知识既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备知识,更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保证。

2. 教师教育过程中如何获取实践性知识

教师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让学业成绩优秀的师范生将其在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专长转变为未来中小学生所能理解的东西,在理论知识与现实教学实际需要方面达到良好的统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要素便是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在教师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实现其中介效应。那么,师范生如何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有效获取实践性知识呢?获取实践性知识的路径又有哪些?

(1) 高校课堂教学

在教师教育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师范生不仅仅学习到教师传达的静态理论知识,同时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师教学风格和教学行为的影响,它包括教师教学设计风格、课堂教学组织风格、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丰富的身体语言。这些影响往往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得以实现,尤其是非常优秀并备受推崇的教学行为更为学生青睐,从而在无形中内化为师范生的实践性知识。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之后很多教学行为都会有意或无意保留以前授业恩师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师范生的大学学习期间,实践性知识像内隐知识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未来

教师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案例教学同样也是课堂教学实践性知识的丰富来源。在教育学和学科教学法的课程教学中,为了取得足够明显的教学效果,将理论联系实际,教师会列举一定量的教学案例供学生分析和思考。在此过程中,师范生不断接近现实的教学情境,体验教学现场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批判性思维,提高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并逐渐取得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

(2) 中小学教育实习实训

实践性知识离不开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它是教师在工作情境中所建构,与教师本人的个性特点、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所学理论知识紧密联系。因此,师范生实践性知识获取的途径之一便是教育实习实训环节。

师范生在实习实训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获取大量个人化的实践性知识。由于每个人的个性、经验、才能和观点的不同,师范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伴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产生认识冲突,进一步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重构自己的实践性知识,最终实现实践性知识的循环更新与优化。

另一方面,师范生观摩其他教师——尤其是实习指导老师——的教学实践,也是获取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渠道。在观摩他人教学的过程中,或认同,或质疑,都有利于教学经验的分享,借鉴优秀教师的教育智慧,站在他者的立场,反思教学实践。

除此之外,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也成为实践性知识的来源。师范生在实习见习阶段,要善于利用网络平台,收集网络上的教学录像、教学课件、教学案例和教学体会等,积极吸收专家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智慧,进而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最终实现实践性知识的延伸。

(3) 微格教学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是一种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来培训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学技能的系统方法。通常利用技术手段将教师教学的真实情况录制下来,再让教师以学生的身份观摩自己的教学录像,经过专家教师的指导,教师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以此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教师教育过程中,学校利用软硬件资源,鼓励师范生尝试小型的课程教学,将其录制,之后,要求师范生对自己的教学全过程进行认真观摩、分析与思考,甚至对自己说话的严谨性,以及体态、表情等方面反

复揣摩,以求精益求精,如此反复训练,师范生将会获取丰富的关于教学情境和教学策略等方面实践性知识。

(4) 日常实践性反思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教师成长的经典公式:“成长 = 实践 + 反思”。^{[9](P.211)}通过实践后的反思,师范生实现主体我与客体我的对话。对话内容主要涉及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感到满意,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如何解决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通常表现在师范生个人的教育札记和教学日志当中。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与反思,师范生懂得如何与学生相处,如何发挥学生的潜力,如何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策略,如何让自己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信,如何应对教学过程的突发事件等等,从而促进实践性知识的结构优化。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高校教师教育实践教学还存在着诸多困惑和问题,除了实践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困境之外,职前教师教育有着其他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因此对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澄清显得尤为重要。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教育实践教学还会有很多、更新的问题需要面对,高校应该以

与时俱进的心态和更广阔的视野认真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为教育教学实践扫清认识上的障碍,促进中小学优秀师资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索磊.教学价值理性的迷失与恢复[J].教育科学,2014(6).
- [2]丁锦宏.教育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3]郑金洲.案例教学指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4]朱元春.对教师教育中教育实践的重新审视[J].教师教育研究,2007(5).
- [5]朱旭东.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6]顾明远,梁忠义.世界教育大系·教师教育[Z].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 [7][美]舒尔曼.实践智慧——论教学、学习与学会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8]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5).
- [9]王洁,顾泠沅.行动教育——教师在职学习的范式革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师语)

基于教师政策的“好老师”培育路径研究^{*}

王共蒙¹ 黄 荣²

(1.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2.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如何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是教育政策的焦点问题。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不但是教师自身的问题,更是国家教育体系构建的结果,通过对教师政策演变的回望,结合当下社会转型期教师这一社会角色面临的现实际遇,试图探寻出培育好老师的路径。

[关键词] “好老师”; 建构历程; 现实际遇;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098-05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当代,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使命。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职业被赋予更多的社会价值,在当代社会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在回顾我国教师政策基础之上,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教师这一社会角色面临的现实际遇,尝试提出“好老师”的塑造路径,为“好老师”的培育提供借鉴。

一、学界研究现状回顾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因时代诉求而常谈常新。学界研究现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是分类别研究好老师,如根据教育目的可以将教师群体分为幼儿、小学、中学、大学、职业等教师。胡伶认为义务教育均衡背景下,教师政策分“数量补充”、“地位保障”、“素质提升”三种类型^[1];杨旭华从组织公民行为视角^[2],对大学好老师的多重角色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二是国别比较教师差别,徐富明^[3]、汪明帅^[4]比较了中美两国

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的形象,认为好老师的标准聚焦于能力范畴、人格范畴和职业道德范畴。第三类是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一些经验丰富的教育者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概述了好老师的特质。也有研究者从事实层面出发,通过调查问卷方式研究了教育对象心中的好老师的形象,如李影^[5]的硕士论文从家长的角度阐述了好老师的標準,黄琼同样从家长视角进行了研究^[6],陈春勇具体研究了中小学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形象^[7],沈祖樾同样研究了中学生对好老师的认识^[8],但他主要侧重比较角度,刘良华为避免个人知识被公共语言遮掩,用教师写教育自传的方式探查“好教师”的个人知识^[9],颇为新颖。另外,朱旭东研究了教师教育标准体系^[10],李霞等学者则透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变迁^[11]。

二、关于教师政策的文本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学生受教育权利,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这一成果取得离不开教师的默默奉献。而教师政策的实施关系到教师工作

* [基金项目]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思政专项课题一般项目“西藏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大学生主体意识培育研究”(项目编号:SZ-Z201501),西藏大学2015年思政课题“主体意识培育视野下的西藏大学‘概论’课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05),西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团队项目基金支持。

[收稿日期] 2015-06-01

[作者简介] 王共蒙,男,山东泰安人,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黄 荣,女,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国家必须制定合理的教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政策日趋灵活,尊重教师、依靠教师、激发教师成为政策制定着力点,而这一历程大体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拨乱反正阶段(1977年—1985年)。之前“左”的错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较大影响,一些教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帽子,社会声望扫地。而教育在国家现代化中居优先地位,若要教育重新步入正轨需要调整教师政策,以重建教育秩序。1977年5月至1978年4月,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工作拨乱反正的谈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他指出: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2](P.40)},强调尊重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12](P.50)}。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好的教师就是人才”、“珍视人才,人才难得”^{[12](P.50)}、“关键在教师”^{[12](P.108)}等。在好教师培育方法上,他强调:重在鼓励、重在奖;多劳多得;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提高教师水平^{[12](PP.50-55)}。在这一系列谈话指导下,教育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师范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对“文革”后各级各类教师工作做了相关规定。自此,教师成为工人阶级劳动者的一部分,名誉开始恢复,社会声望开始提高,教师工作也开始回归正常轨道。

第二,改革加速阶段(1985年—1993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教师工作呈现平稳局面,各级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整体仍十分落后、教育体制弊端突出,仍需要作出较大幅度的调整。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计;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育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1986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教育专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对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民办和公办教师问题作了具体安排。为了营造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1985年1月,全国人大将每年的9月10日确立为教师节,肯定教师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贡献。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因而教师待遇得到提高,这也是教师工作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国家通过设立人民助学奖、艰苦

地区补贴、青年科研基金等,促进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但是,教师队伍的历史欠账仍然没有偿清,教育投入有限、教师学历偏低、教学质量偏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此制约下国家制定的教师政策表现出“数量满足型”取向。

第三,法制化阶段(1993年—2003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对教师工作法治化、制度化,教师队伍规范化提出了要求。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建设一支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精心组织教学,积极参加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对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意识职业素养的要求更加凸显,教育界更加强调一个“好老师”首先必须思想政治合格。同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详细界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和任用、培养和培训、考核、待遇等内容,标志着教师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阶段。此后,国家先后制定了《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年)等政策法规,在法律上确认教师专业人员地位。如《教师法》第一条所言: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建设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修养和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13],这些教师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教师的培育开始有法可依。

第四,以人为本新阶段(2003年至今)。21世纪以来,教育体系内利益分化,教育事业潜在矛盾突显。为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化解教育体系矛盾,教育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仍然是“好老师”培育。一方面,重视教师发展业务上为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高水平教师培养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千人计划、国培计划、硕师计划、特岗教师计划等,对大中小学教师发展提供支持。但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国家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力度缩小城乡师资差距。教育部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

知》(2005年)等文件,将更多资源向义务教育、农村、西部边远地区等教师倾斜,促进教师队伍结构优化,更好地实现教师队伍平衡。另一方面,重视师德建设。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给教师师德建设带来很大挑战,教育部在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师德建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高度强调师德建设: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

“好教师”培养愈加体现教师主体性和个体性,既强调教师职业内在的发展性,又开始关注教师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从教育政策体系构建的外向维度看,教师个体价值愈加突出。在我国,教师肩负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使命。在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师大发表《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讲话,他认为一个“好老师”应当具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四种必不可少的特质^[14]。可见,从教与学、师与生关系出发,提出了“好老师”的养成之路,符合教育和育人规律。

以上从国家政策层面梳理了教师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而从政策角度研究教师的文献并不丰富^[15],阐释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的文献少之又少。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呈现“知识分子定位”向“专业技术人员定位”过渡,不再强调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和阶级属性,将其视为理性的社会角色,国家对教师的角色表现出较强建构性,即教师的社会价值和职业声望不但是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通过诸多政策给予价值输入和规范导入的结果。这表现在国家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输入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同时不断地赋予教师更高价值属性,提高教师角色定位。而社会对“好老师”的建构,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教师的期望值提高,同时默认社会对教师贡献的回馈。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对“好教师”内向要求越来越高,却忽视了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外向物质需求,忽视“好老师”养成的外部困境。比如我们十分关注教师职业道德要求,却在社会层面没有认识到教师劳动及其贡献而给予相应的

待遇,还有存在重教师道德要求而轻教等^[16]情况。

三、社会转型期“好老师”养成的现实际遇

我国处于深度社会转型时期,追求个体利益的动机得到体制认可,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相应地引起了价值观多元的局面。教育在个体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重要,对教师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好老师”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面临复杂的现实境遇。

1. 教师的政治价值输入与教师发展之间存在张力

教师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组成之一。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教师政策长期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有机构成来实行。如果追溯知识分子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命运轨迹,俨然是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剧。知识分子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个主要社会行动者,“他们通过挑战现状来为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们努力创设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17] (P. 277–278)},而今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业已建立之后其作用不再明确,“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机会增多——一旦所处的地位与他们的技能相当,构成不满的主要来源就会消失”^{[17] (P. 279)}。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的肩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认同政治体系所输入的价值观念,因此教师若想有自身价值的实现必须同业已置身的政治体系达成妥协,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可能会存在适度的张力,这一痕迹隐约可见于建国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

2. 社会环境功利化,教师面临物质利益诱惑

计划经济时期,教师由于其社会声望好、收入来源稳定、福利保障健全等原因成为大家公认的“铁饭碗”。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利益格局多元化,工作方式也日渐多样化,“铁饭碗”逐渐被聘任制、考核注册新制度打破,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往“铁饭碗”的优势逐渐丧失。同时,“教师也扮演着社会人的角色,承担着更为宽泛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18]教师也是“现实中的人”,根据现有调查,高等学校教师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在价值取向上主体意识渐强^[19],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同样面临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家庭责任。所以教师在执行国家教育政策和日常教学活动时,“教师政策执

行过程中的教师,有着足够的理性与判断力,因此教师群体不是教育决策想当然的执行者”^[18]。这说明,一方面是职业价值观对教师角色的自我规约,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造成教师群体内部价值冲突。然而,外部社会环境却对教师职业奉献精神高度期许,假如对教师现实境遇没有清醒认识,不可避免将造成教师群体内部的社会不适应和社会理想与教师现状的脱节,最终造成教师社会声望的每况愈下。这就不难理解网络上对教师的质疑不断,学校、教师负面新闻频频发生,教师在公众心中“形象下滑”等现象。

3. 教师的专业化理解错位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也是引领学生建立正确“三观”的道德楷模。在信息化时代,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教师专业发展的呼声也水涨船高。然而,现实情况是对教师专业化的理解有失偏颇,即片面地理解成提高教师的知识层面、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等,提高学生学科成绩、提升自己的职称成为教师职业规划中重要部分,而逐渐忽视了教师为人师表该有的道德情操、精神涵养、人格魅力等,即忽视了教学的德性。这就使得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趋向工具理性主义,使得原本纯粹的教育本身也越来越功利化,利己主义观念使得相当一部分教师将提高教学能力作为找工作、拿高薪的筹码,而忽视了对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而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期望的全面人才。

4. 教师职业压力增大

教师“体面”观感背后是职业压力,诸如升学率、科研任务压力、学历职称压力、社会期望隐形压力、家庭负担等,使得教师长期处于高工作强度、高压力负担的状态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教师的职业压力有增无减。因为教育改革往往产生教学环境非稳定化、教学内容与方法革新、教育政策变动幅度剧烈等副产品,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的应激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传输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习惯和思想道德情操,更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提升创新能力,探究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的规律和方法,同时对教师的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要求一方面能够促使教师与时俱进、提高职业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教师的职

业压力,也成为阻碍教师成为“好老师”的原因之一。

四、“好老师”塑造途径

1. 通过国家立法、行政等方式,提升教师地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

教师的社会价值体现在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提供社会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但所提供的精神文化产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一定滞后性和隐含性。与市场中的其他社会生产形式不同,教师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教师劳动成果难以量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师劳动的价值难以在市场中货币化。所以,在浮躁的社会风气裹挟下,教师劳动被轻视,教师社会地位被矮化,教师生活待遇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乃至其对自身职业价值的认知。要想塑造更多的好老师,关键在于改善教师发展的社会环境。立法部门应加强教师立法,在法律层面给予教师更多的权利空间和教学自主性,以此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政府部门应通过行政手段,切实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关心广大老师特别是生活工作有困难的老师,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12] (P.109)} 坐实财政对教育和教师的投入,提升教师工作待遇,优化教师工作环境。

2. 学校做好教师服务和管理工作,为“好老师”养成提供条件

“好老师”养成有赖于承载教师角色的载体——学校,但功利化的社会环境导致学校在教师发展中存在问题,有学者指出,“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教师专业发展消解了教师的文化身份和对教师人生的终极关怀,遮蔽了教师发展的内在价值,使教师发展从原本的主体性异化为客体性”^[21]。学校作为管理部门,应加强“做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好老师”的宣传工作,组织专题活动和丰富的教师活动,帮助教师学习最新的国家教育政策和精神,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学校职能部门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者,对教师负有管理的责任,但是同时破除学校管理对教师的“效率为本”的桎梏,将学校管理看作是教师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一个内在环节和阶梯^[22]。学校应通过“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理念为“好老师”的培养提供载体,管理要发挥服务的作用。另外,学校可以设立教师发展中心,参考美国 75% 以上的大

学与学院设置了大学教师发展项目及组织机构、国家性与国际性的大学教师发展组织与联盟的做法^[22],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发展途径,诸如带薪休假、学术研讨、学历提升等机会。

3. 更新教师发展理念,及时排解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好教师是教师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结果,教师首先是作为“现实中的人”存在,其次作为“师”存在,因此国家、社会、学院应提供更多的客观条件满足教师自我发展的要求和获悉人生价值的诉求。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显著进步,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教师队伍的薪金水平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发展性需求不可能全部满足。如果教师个人对这一点不能清醒认识的话,那么很可能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挫伤。所以,一方面政府做好教师提高待遇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的教育与引导。“老师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兢兢业业做好工作。”^[14]应让教师意识到教师地位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教师素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取决于能否培养更多的社会专业人才。

教师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是一座冰山,那么“好老师”的养成就需要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等浮在“冰山”下面的隐性素养支持^[24]。应引导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奉献,真正赢得社会的尊重,实现自身的价值,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好老师”。

[参考文献]

- [1]胡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农村教师政策的问题与改进[J].教育发展研究,2009(22).
- [2]杨旭华,仇勇.“大学好老师”多重角色的质性分析——基于组织公民行为的视角[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21).
- [3]徐富明.中美好教师的标准比较[J].中国教育学刊,1999(12).
- [4]汪明帅.好教师的关键特征——2003—2012美国年度教师解读[J].教育发展研究,2012(24).

- [5]李影.“好教师”基于家长视角的调查和分析[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2011.
- [6]黄琼.中大班幼儿、家长眼中“好老师”形象调查[J].早期教育·教科研,2013(10).
- [7]陈春勇.中小学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形象[J].中国德育,2013(15).
- [8]沈祖樾.当前中学师生心目中好教师形象的比较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1990(4).
- [9]刘良华.教育自传中的个人知识:关于好教师的调查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1).
- [10]朱旭东.教师教育标准体系的建立:未来教师教育的方向[J].教育研究,2010(6).
- [11]李霞,符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变迁与特征分析[J].教育与管理,2012(12).
-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EB/DL].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937.htm
- [14]新华网.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EB/D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9/10/c_133631483.htm
- [15]石长林.中国教师政策研究——基于教育政策内容的视角[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 [16]吴文胜.教师政策变迁视野下的教师价值[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11).
- [17][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8]邓旭.我国教师政策执行问题及路径选择[J].辽宁教育研究,2007(7).
- [19]杨启富.当前地方性高校青年教师价值观调查与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0).
- [20]伍叶琴,李森,戴宏才.教师发展的客体性异化与主体性回归[J].教育研究,2013(1).
- [21]侯桂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J].社会科学战线,2008(1).
- [22]刘济良,王振存.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教育研究,2011(11).
- [23]陈正国.职业意识浅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6).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教师文化探索与实践^{*}

——以无锡市江溪小学为例

杨伟光

(无锡市新区江溪小学, 江苏无锡 214026)

[摘要] 教师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对于学校、学生以及教师自身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江南燕”是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江溪小学打造的一种独特校园文化, 以瞿秋白的精神——自觉、向上、执着、创新为核心。在“江南燕”校园文化的创建过程中, 尤其注重对教师的培养与提高, 形成了学校独特的教师文化。

[关键词] 校园文化; 教师文化; 江南燕

[中图分类号] G6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103-03

苏联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曾提出: 影响个体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 个体自出生时起直至死亡为止, 就一直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等的影响。因此, 教育需要十分重视文化背景。^{[1](P.131)}而人类文化活动以符号为中介, 其传承发展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 学校及教师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教师文化与校园文化

教师文化, 即教师作为特定社会职业群体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教师群体的文化积淀和生成, 教师文化是教师群体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的观念抽象, 它通过有关教师的教育教学、学习培训、组织管理、人际交往, 构建和传达教师文化的内容和个性。^{[2](P.50)}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总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以学校丰富的文化活动为主体, 由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创建的文化氛围。它以良好的校风为标志, 包括制度、课程、教师、学生文化等方面。^[3]教师作为学校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宝贵的人力资源, 其文化的建

设在校园整体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反之, 对教师文化的建设也有助于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江南燕”校园文化是江溪小学以瞿秋白精神为指引全力打造的特色校园文化, 其中蕴含了瞿秋白的理想、信念、品德、智慧、人格、情操、风范和精神世界等要素, 旨在培养具有“瞿秋白精神”的人, 促进全体师生的全面发展。在对发展教师文化的过程中, 学校充分发展教师的“江南燕”品质, 为教师提供各种学习和研究的平台, 帮助教师成长, 努力形成积极向上的教师文化氛围。

二、“江南燕”教师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教师文化具体表现在教师的价值取向(角色意识、教育理念、职业信念等)、思维定势(职业思维方式)、情感倾向(体现职业态度)和行为方式(人际关系、行为作风)等方面, 是支配教师思想行为的整体性因素。其中, 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居于核心地位, 属于深层隐性文化, 而情感倾向与行为方式发于外表, 属于表层显性文化。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是瞿秋白一生的光辉写照, 他不畏艰难, 像春燕一样, 用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瞿秋白精神引领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B-a/2011/02/066)。

[收稿日期] 2015-07-15

[作者简介] 杨伟光, 男, 江苏无锡人, 无锡市新区江溪小学校长, 高级教师。

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光辉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在“江南燕”文化的召唤下,学校结合教师这一职业特征对其精神进行了阐释,也为现代化教师文化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第一,教师要拥有燕子顽强的拼搏精神:燕子不厌苦,不厌累,在日积月累中用坚持铸就了成功,用细节创造了完美。而教师应意识到在其整个教育生涯中,要树立吃苦耐劳的职业信念,要不畏惧教学过程中的繁琐和艰辛,善待学生,在坚持中求进步,求发展,铸就教师的顽强人生。

第二,教师要拥有燕子自信的乐观精神:燕子不畏风雨,不惧艰难,坚守着自己的目标,坚韧地、乐此不疲地奋斗着。而教师,也要有如燕子般的自信、乐观精神。教育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定量,能看到开始,也能预计结果,它充满着动态的、变化的因素,有学生进步所带来的欢乐,也有遇到问题时的烦恼。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树立积极乐观的职业态度,朝着自己的教育目标带领学生前进,学会感受路途中的愉悦。

第三,教师要拥有燕子自立的奋斗精神:燕子不会寄身于别处,不愿依靠恩赐生存,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搭建自己的栖身之所,为美好的未来全力奋斗。教师,作为文化精神的传播者,要在充分肯定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将藏于内心的自我意识行诸于外。要有独立的探索精神和开发精神,不以外界环境好坏为依据做出努力,而是以内心的价值取向、教育信念为宗旨,把握生命,尽力书写教育生命的华章。

第四,教师要拥有燕子协作的团队精神:每年出生的雏燕,总是由雌雄两燕共同喂养照顾,呵护长大。燕子为了生儿育女,团结互助,相互勉励,付出许多关爱和温情。新课程的有效实施,需要群策群力的团队精神,教学范式的革新需要教师间的相互协作和共同促进。随着教育视野的拓展,教师若仅局限于自身,而不求外拓和合作,必然会被社会所淘汰。

第五,教师要拥有燕子细致的精品意识:燕子是天生的建筑设计师,它们的窝巢不仅造型别致精巧,而且经得起风雨甚至寒冷的考验。教师,也可堪称“设计师”,他们以学生的心灵为基托,谨慎地于其上添加一砖一瓦。教师必须具备细致和认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态度,来培育踏实向上、勇敢前行的具有多样化品质的学生。

综合以上“江南燕”教师文化的内涵,可以总

结出我们倡导的“江南燕”式的教师应具有融合性、精神性和可塑性三个特点。融合性是指教师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融合了多种品质,形成教师群体共同认可的准则;精神性是就教师价值取向而言的,乐观向上、积极奋斗、精品设计的价值观念应对教师具有引导作用;可塑性是指教师文化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长期的实践必然会产生新的、有价值的教师文化,而人本身拥有的可塑性为教师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

三、“江南燕”教师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1. 学习秋白精神,提高教师道德水准

传统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在西方教育史上,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性教学”的思想,把道德作为教育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教育中的道德教育非常重要。而教师的工作是灵魂对灵魂的塑造,所以更要注重师德的培养。“热爱祖国,坚毅执着,自觉向上”是瞿秋白精神的主要体现之一,也是师德之灵魂。现代教师,要像瞿秋白一样爱国爱校,对待学生做到三心——细心、耐心、贴心;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严谨;同事之间相互尊重,团结协作。热爱集体、关心学校,为学校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2. 学习秋白精神,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教师文化以教师扎实的教学功底、专业的教学水平为依托。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仍有一些教师满足于充当“教书匠”的角色,缺少创新意识,缺乏科研能力,被动适应教学。而新课改的进行,则要求教师要由教学实施者变为开发者,由执行者变为决策者、建构者。教师不仅要懂得“怎么教”,也要考虑“教什么”,学会开发、挖掘教学资源,要对比不同的教学资料,并及时地补充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教师要勇于承担“研究者”的角色,从学生发展、社会需要等出发,开发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逐步提高研究能力,促进内生式专业发展。

教师在“江南燕”文化引领下的新课程中,应像瞿秋白一样发扬执着的探索精神,促进自身专业发展,形成新的教育观念。学校应为教师全面提高专业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积极搭建教师成长、成名、成家的平台,邀请名师亲临课堂,对课堂研究作出指导。借助名师的力量,学校应为青年教师创造机会,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进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师文化建设。

3. 学习秋白精神,提高教师协作素质

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作基础,在高尚的道德引导下,现代教师文化更要注重教师之间的协作。现代化的教师文化是社会主导条件下教育亚文化的整合,体现于教师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是融合民族的、地域的、外来的以及校园的各种文化所形成的校本精神,所以教师协作日显重要。^[5]

就教师职业环境来说,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交流必然会产生更多新思想,教师进行同专业和跨专业的协作也成为了现代学校的发展趋势之一。为此,教师首先要保持开放、合作的文化心态。只有教师自身打开心扉,乐意尝试新的教学方式,主动进行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已有知识相结合,而生成新理念;其次,教师要建立良好的心理安全感。教师之间的坦诚与交流,必然会伴随批判思维的出现,教师自身若建立起心理安全感,便会敞开心扉,谈论教学过程中的困惑,也会乐于接受别人的建议,进而转向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再次,教师要保持对学习的积极性,视其他教师为自己成长的动力,在与他人的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取得进步。

此外,对于教师来说,学生也是其需要协作的对象之一。所谓教学相长,教师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活动,教师要树立现代学生观,注重学生的独特性与主体性,并与学生确立良好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生这个协作对象。

“江南燕”校园文化的打造使学校更加注重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从校本培训入手,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任务,致力于创新校本培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使教师之间协作、互助。教师在学校中,不仅是管理者,也是合作者,教师要学会协调好各种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教师要通过协作,产生“共生效应”,通过互助,取得进步。^[6]

4. 学习秋白精神,重塑教师职业信念

如果把学校文化比喻成“冰山”,显性部分即“学校成员的做事方式”,隐性部分即“信念、价值观和假设”。隐性部分决定着显性部分的高度,教师的信念则决定着学校成员的“做事方式”,也影响着教师自身的 behavior。^{[7] (pp. 357–358)} 在教师文化的塑造中,教师对于职业的信念非常重要。第一,教师要确立对“教育”的信念。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教师要树立崇高的教育理念,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教书匠”的角色,不思进取,而应当对教育充满

敬畏,充满信心,敢于探索,乐于实践,努力去成就教育事业。第二,教师要树立对“学校”的信念。学校,作为一个文化环境,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场所。学校,同时也是一个由教师组成的团队,汇聚了每个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当教师始终保持对学校的信心和热情,学校事业才能日渐繁荣,才能为教师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氛围。第三,教师要树立对“自己”的信念。信念引领着行为,指导着实践。在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现状下,教师要善于寻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所,主动应对社会的变化和要求,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四,教师要树立对“学生”的信念。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即使教育中难以避免学困生的出现,每一个学生也都有其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充满信心,善于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帮助他们实现价值最大化。

文化是知识的依托,繁荣发展的校园文化能够为教师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教师文化也能推动着校园文化的进程。“江南燕”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教师文化也需随之逐步推进,这要求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共同参与,转换思维视角,创新工作方法,以获取不断的进步和成就。

[参 考 文 献]

- [1] 汪凤炎,燕良轼. 教育心理学新编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 [2] 吴玲,葛金国. 职业使命与教师文化建设 [M].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3] 蒋晓雯. 重塑教师文化 助力学校发展 [J]. 教育管理研究,2011(7).
- [4] 杨小敏. 我国教师文化研究综述:现状、问题及展望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34).
- [5] 赵复查. 现代教师文化:理念、特征与建构 [J]. 武汉大学学报,2005(4).
- [6] 姜新生. 从个人主义到自然合作:教师文化的理性建构 [J]. 教师教育研究,2010(22).
- [7] 谢翌,张释元. 教师文化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8] 李霞. 信念、态度、行为:教师文化建设的三个维度 [J]. 教师教育研究,2012(3).

(责任编辑 晨 晓)

基于学生立场下的语文教学标准答案的思考^{*}

陈尚达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六安 237012)

[摘要] 为获得分数而向学生传递标准答案的做法被认为是应试背景下语文教学的公理或铁律, 这是值得质疑的。经验视域是理解标准答案所产生的思想背景; 学生立场是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根本所在。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两个基本逻辑是, 既要关注语文知识“是什么”, 也要关注语文知识“不是什么”。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理想格局是文本意义和学生经验的视域融合。

[关键词] 语文教学; 标准答案; 学生立场; 主客交融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106-05

语文教学中, 教师在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时最后多用教师用书上的参考答案作为标准, 对学生思维进行统领和颠覆; 语文习题训练与考试之后, 很多教师也会通过讲述标准答案, 帮助学生对错题统一进行订正, 其教学目的除了督促学生改正错题, 更是为了下次考试牢记标准答案获取更好的考试成绩。这种为获得分数而向学生传递标准答案的做法, 被认为是应试背景下语文教学的公理或铁律。问题在于, 一味向学生传递标准答案能促进学生的语文思维积极变化吗? 针对学生有问题的回答或错误的见解, 用外在同一的标准答案对不尽相同的错误性思考进行覆盖和遮蔽, 这种教学合理且有效吗? 无视学生自我内部思维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试图用外部答案看得见的科学合理掩盖学生内部思维看不见的矛盾冲突, 这种做法具有教育意义吗? 显而易见的是, 学生有问题的回答或错误的见解本身, 是由学生丰富的学习生活经验所支撑的经验视域所带来的产物, 教师简单地向学生提供标准答案做法, 忽视了从学生的真实思维过程出发去追求语文教学的内在逻辑, 从而丧失了语文教学鲜明的学生立场。本文尝试从学生立场视角, 对语文教学从标准答

案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一做法进行反思与探索。

一、经验视域: 理解标准答案所产生的思想背景

“借助‘座学’习得教科书知识的‘勉强’, 在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的囚人’中作了比喻。正如‘洞穴的囚人’把洞壁上的影子误认为现实一般, ‘座学’中习得教科书知识的儿童所学的不是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知识, 不过是把教科书和黑板上映出的知识的影子, 作为信息习得罢了。”^{[1](P.16)} 换言之, 教师向学生传递的标准答案乃至讲述的语文知识, 对学生而言, 不过是习得信息而非获得智慧。

教师用书上关于文本理解的标准答案, 习题训练与考试中主观题的标准答案, 自然不能否认其科学合理性, 但是应该看到, 那是由教参编者和答案提供者的经验视域所支撑的意义理解模式和话语表达方式, 是海德格尔提到的“前理解”所推演和促成的思维产品和语言作品。换言之, 作为思维智慧的标准答案和教参编者答案提供者的经验视域之间构成一种缘在性。如果没有和教参编者和答案提供者相近的“前理解”, 标准答案对学生而言, 可能就是“不生育的瘪籽或死道”^[2]。

*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积极语用视域中的风险课堂与教学机智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14D39)。

[收稿日期] 2015-07-14

[作者简介] 陈尚达, 男, 安徽潜山人,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因此,语文知识对学生而言,不过是一个意义中介,目的在于引发基于学生自身经验视域的真实思考。教师引导学生只关注语文知识本身,“就无异于看到水果摊上的水果”,却没有看到“它的生命过程中曾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3](P.19)}。并且,它的生命过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和自身及外部条件密切相关,形态各异且风格多样。教师要善于发挥语文知识对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语文教学就该如同善待问即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礼记·学记》)。小鸣和大鸣本身,是学生语文思维智慧参差不齐的体现和反映,是学生凭借自身经验与课本知识发生相互作用后的真实生命体验和语文学习成效,也就是学生基于自身经验视域的语文思维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出现叩之不鸣,则施以启发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一连用了六个“不”字,就是对教师不能直接向学生传递正确答案的善意提醒和郑重警示。教师要追求学生思考最大化,让学生基于自身经验视域产生追求合理答案的顽强意志和思想自由。举一反三要求学生语文思维不拘泥于某个点上,而是从一到多,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根本反对将某个问题的理解固定化,而是强调对问题的理解随着时空条件和经验视域的变化而变化;即使理解的情境具有相似相近性,孔子也绝不向弟子作出完全相同的解释,这不仅体现出孔子的好学旨趣,也显现出他那种“时机化的”、“境域发生式的”和“相互构成着的”^[4]理解模式。对任何问题的理解都可以展现出参差多态的思维景观和语言情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应试教育热衷于告知学生同一的标准答案做法,显然违背了孔子启发教学思想。

二、学生立场: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根本所在

在阅读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如果学生对一个问题中包含的知识点缺乏理解和表达能力,教师又没有为其设置思维阶梯,那么学生根本无法逾越正确答案中所暗含的思维高墙。这就说明在学生经验视域之外的标准答案不能和学生经验视域发生融通,并不因为教师提供正确答案而发生统一性融合。就作文教学而言,语文老师要求学

生多背诵古诗文和多抄背名人名言本无非议,却让学生关注自身日常生活,认为学生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不足挂齿,值得商榷。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极为感人的亲情伦理,语文老师就无法通过写作教学引导学生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感受美和表达美,无法让学生体会到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情感的自我超越过程。这样看来,教师关于阅读和作文教学的错误思想认识带给学生阅读和写作方法上的失误与行动上的偏差,会导致学生在理解和表达能力上难以发生积极变化。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单靠大量的题海训练和模考强化难以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习题和考试的量变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的质变。

杜威曾对教师向学生传递现成知识结论的做法进行过批评,认为那是培养儿童理智屈从的奴性。在他看来,教师要精通教材,但他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学生关于教材的态度和反应上。或者说,教师要关注的主要不是教材知识本身,而是教材与学生之间的自由的相互作用。^{[5](PP.199~200)}教师要解决的不是语文知识本身,而是学生现有思维水平与语文知识所要求的思维水平之间的认知距离。教师不应该简单从外在语文知识出发,将学生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语文思维空间整齐划一,使得学生思维认知上的矛盾和冲突无法得到消解。教师应该从学生有问题的见解或错误的答案出发,帮助学生寻找自我见解中的问题所在或答案之所以错误的内在根由。教师这样做,就是为了引导学生对自我思维中出现的混乱和错谬进行某种必要的清理,为学生扫除通向问题所包含的客观理性道路上的重要障碍物。教师直接告知正确答案带来的可能问题还在于,学生思维认知固定于这种现成者,却不能联系自身来理解,想到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孔雀东南飞》一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告诫学生要珍视生命,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教学中如果仅关注焦刘爱情悲剧和兰芝焦母形象之类的文本知识,那课文对于现实生活和学生生命发展的关怀意义就被忽略了。

强调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学生立场,是引导学生从自身知识经验的起点迈向标准答案的终点,是帮助学生从思想认识和思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反思和清理而逐步接近标准答案,这就存在一个教师讲解标准答案的物理性时

间和帮助学生从自我见解过渡到标准答案的心理性时间不相一致的问题。另外,语文教学并不能仅仅满足于帮助学生解决认识合理性问题,还要助学生解决语文学习的欲望、意志和兴趣问题,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就是孔子强调启发教学的真正原因,学生正是在基于自身经验视域对学习对象的探索过程中,增强了思考问题的兴趣和主动性,拓展了经验视域并实现了经验改造。这也是海德格尔强调的“教,意味着让学生去学”^[6](P.1217)的内在缘由,教师要让学生顺应学习对象的亲切召唤,而不是越俎代庖式的霸道施教。学生独立思考的兴趣绝对不是教师向学生讲述正确答案所能培养的,而是在学生对学习对象的探索中领悟到学习对象本身某种神秘性的召唤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学生接受“思”的召唤过程就是见证自我思维智慧、培养语文学习兴趣并建立自信的心路历程。一些语文教师热衷于教给学生他们还不会的语文知识,恰恰忽视了学生大胆怀疑的勇气培养和周密思考的信心培植,没有领悟到孔子启发教学的内在本质。

三、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两个基本逻辑:既要关注语文知识“是什么”,也要关注语文知识“不是什么”

教师向学生讲述问题的正确答案,甚至用预设的先在结论去锁定某个问题教学进程,语文教学似乎过多地关注所要讲授的语文知识的正确性,强调参考答案的优先性,却不去倾听学生心声,对学生的不正确思考与看法置之不理,缺乏一种质疑问难和刨根问底的思辨意识和批判精神。关注语文知识“不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文教学的试错法。从错误走向正确,是学生语文思维认知发生积极变化的现实路径。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见解存在某种错误,这不仅是帮助学生澄清对语文知识的思维认知,即对学习对象本身进行重新探讨;而且是帮助学生对语文知识认知的思维过程加以审视,即基于自身经验视域的重新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学生回答问题出现错误时,教师不应急于向学生提供正确答案,从而轻易放弃抓住错误观点来推进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大好机会,转而抓住这一契机通过质疑和追问等手段,有力推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教师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会得到促进,这就是教学

相长。考证错误答案为什么是错误的,与正确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同等重要。从发生认识论上讲,关注语文知识“不是什么”,要比关注语文知识“是什么”更为重要,仰仗一个思辨过程,体现出人的思想认识从混乱无序走向清晰有序的渐进过程,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就像《背影》教学中,一些教师习惯于向学生讲解文中出现的“四次眼泪”、“父亲攀爬月台的细节描写”与“父子深情”,但如果学生认为父亲“形象不够潇洒”、“违反交通规则”而不值得尊敬,其重视外在美而轻视心灵美、用现代交通规则来曲解历史情境的认知偏误没有得到纠正与澄清,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从学生见解出发,就是从学生关于语文知识的现有认知水平出发,努力奔向语文知识所要求的理想认知水平。这或许是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坦然承认自己无知的深刻缘由,因为学生关于具体学习对象的认知状况,以及帮助学生走出具体学习对象认知困惑的思维路径,教师不可能事先知道的,而只有通过倾听学生,再辅以情境感悟或理性思辨,才能变得清晰和明朗化。教师有且只有引导学生深入到语文知识背后的经验视域,那个不为人所大力关注的隐蔽思想地带,帮助学生实现教材理解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是什么”、从“不是什么”到“为什么不是什么”的自我思维转变,并构筑与环境和他人的一种充满温情的和谐关系,才会有真正的教学实效。^[7]

教师无知并非指教师没有知识,而是指不可能有关于学生知识学习状态和困惑的事先认知,我们可以感悟出教学关系和师生关系中的某种特殊性内容。新语文课程之所以提倡对话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诱逼学生的独立自主思考。教学不是急于向学生提供一种肯定性的标准答案,而是要缓缓引导学生对自己有问题的见解形成一个否定性的思维推理,最终帮助学生解决认知困惑。因此,正确合宜的语文教学内容,不仅包含课前的预设和课后的改进,而且包括课中师生互动过程中的认知变化和正误辨析,是学生基于自身经验视域探索语文学习对象所表达的有意义内容(包括正确的或错误的观点),与教师针对学生有问题观点的反思、质疑、追问与补充内容,及其所引发的学生反思性理解。所有这些,都不是教师单方面所能决定的。

如果把向学生讲授正确答案的教学称为肯定

性教学,那么从学生有问题见解出发的教学就是一种否定性教学。教师帮助学生寻找到自我见解中的错误或欠缺,同时学生借助教师的引导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当然,学生富有见地,语文教学就表现为师生的共同分享和欣赏。这就是“知其心”基础上的“长善救失”(《学记》)。教师也可以向学生抛出标准答案,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比较性和参照性学习资源,发现其看待问题的立场、视角和局限,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以服务于学生语文素养发展为根本。如同刘铁芳教授指出的,教师是在成全学生生命发展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生命发展的,是超越成人取向的教育文化。^[8]

四、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寻求的理想格局:文本意义和学生经验的视域融合

语文教学标准答案应该是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我思维智慧体现,在主观思维和客观理性的吻合处,是文本他者性和学生自我性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教师将教师用书中的标准答案假定为先于学生经验的真理,并轻易消除了学生与文本相互作用的认知困难。学生理解课文文本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特视域,是文本与学生之间的视域融合,而非照搬他人与文本视域融合基础上的他人理解。教师向学生传递标准答案的做法,究其实质,师生一起大多是充当着专家所理解的文本意义的接受者和记述者。固执于这种现成者,自然构成对文本意义生产和学生自我发展的双重限制与损害,导致师生经验视域的遮蔽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削弱。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善诱”是教师从事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方法路径,诱导学生主动思考出有富有见地的自我看法,包含有学生思维的不断突围与重建过程,这和简单向学生讲授知识不能相提并论,后者限定了学生思维的方向和内容,并限制了语文思维水平的正能量发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道出师生语文学习在好学精神支撑下知识宽度与思维深度的双重生长,阅读理解与写作表达能力的提高更多依靠拓展阅读和生活体验,而不是大量的习题训练和考试手段。

如子夏与孔子的问对例(《论语·八佾》)中,师徒并不是满足于对所指涉对象本身的思考和解释,而是抓住“素以为绚兮”中的素绚关系取譬连

类,由美女打扮到绘画施彩再到仁礼关系。素净的脸面与姣好的面容、素白的底子与多彩的画面、素朴的内心与恭敬的举止之间,构成高度的相似相关性,体现出思维的连环跳和机智性。孔子就是要让学生思维不拘泥于并停留在某个知识点上,而是要借助类比思维,引起学生举一反三。在关于“孝”、“仁”、“政”与“君子”等一系列问对中,孔子都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理解的游刃有余,且都能契合它们各自的意义区间,孔子的好学品格、即兴思维力和情境把握力内含其中。孔子答语虽因弟子心性不同而为,体现出微妙差异,但本质上是相近相关的。如对“仁”的阐释,涉及诉诸内心(克己与爱人)、行为约束(复礼与恭敬)和针砭人性(讱言去躁)等不同视角;又如对“孝”的解释,包括“无违”、“忧疾”、“敬重”和“色难”等,关乎子女和父母相处的多个方面。生活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忠恕之道”。^[9]虽然答案多由孔子和盘托出,但因答案所包含的内容多切近日常生活,即由“近取譬”所带来的经验视域上的公共性和融通性;且由颜渊等弟子“请事斯语”的回应等,不难发现孔子启发教学的成效,跟当下应试语文教学追求同一性的标准答案做法大异其趣。孔子对所学对象理解的游刃有余与融会贯通,与弟子关于所学对象解释的心领神会与自我反省,印证了一种专注于“境域敏感的思想方式”,即“人的原初的(不只是实证的、现象主义的)体验为知识和艺术之根,摒弃一切脱开这种体验的概念建构和假定,只以此体验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关系境域为真为美”^[10]。

一些老师在语文教学中也努力贯彻启发方式,但由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标准答案情结,导致问题情境创设不过是个诱饵甚至陷阱,教师自我思想的不解放与对学生语文思维的不信任,和学生主动思维受挫的命定结局,导致语文课堂教学形成简单线性思维逻辑和被奴役的枯燥无趣压抑心理。启发教学其实包含“让思”、“助思”和“扩思”三部曲,实现学生语文思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黄美莲老师的《清塘荷韵》教学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案例。“学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本身就说明,老师们在教学之前总是把学生想象的不怎么好。黄老师在教学中努力克制住自己,由学生对“静”字怀疑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促成了学生一连串的悦知和美悟,学生语文经验中关于周敦颐、李白与《山中问答》等旧知和史识,都得

到调动并参与意义建构。^[11]因此,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和宽容非常重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一连三个‘不’字,仿佛不是要正面阐述做君子的道路,而只是要为踏上这条道路准备一个谦逊的可能性,那便是道路上方的虚空,必须首先被恕让出来,而不是急切地要布道,鲁莽地触及他人,迫使他人信我、知我,信道,知道。”^[12]教师不能霸道施教,要为学生勇于思考不怕出错创造一种支持性心理环境,并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思维援助。“知其心,然后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失者也。”(《礼记·学记》)

语文教学的意义正在于教师引导学生行走在从已知到未知的思之旅途,问题探索情境中那种无法预知的优美风景与出乎意料的生动体验,构成语文课堂教学生活的幸福乐章。这是过分重视复制经验与巩固旧知的应试语文教学传统所无法企及的。这种主客交融的标准答案寻求体现出心物一体,一种关乎觉解心通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孔子用否定式疑问句表述方式意在说明,人们往往停留在追求对象本身的认知,却忽视了学习中伴随智慧发生的快乐内心体验。语文学习就是追求知行统一达成身心和谐的美的历程,教师引导学生超越外部参考答案,并帮助学生寻求语文学习的自我感,进而实现自我超越,这是教师培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根本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日]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2]张祥龙.边缘处的理解:中西思想对话中的“印迹”[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 [3]杨义.韩非子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张祥龙.现象学视野中的孔子[J].哲学研究,1999(6).
- [5][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6][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三联书店,1996.
- [7]陈尚达.从应试教育到课程改革:教育现象学观照[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1).
- [8]刘铁芳.日常教育生活中儿童立场如何可能[J].中国教育学刊,2011(11).
- [9]陈尚达.孔子学习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皖西学院学报,2014(6).
- [10]张祥龙.思想方式与中国观:几位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分析[J].河北学刊,2000(5).
- [11]黄美莲.学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清塘荷韵》教后感[J].语文学习,2009(10).
- [12]柯小刚.教学与他者的伦理:《论语·学而》首章解读[J].现代哲学,2010(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历史背景下的语文教学

——兼与李山林教授商榷

张长霖¹ 王家伦²

(1. 苏州市第五中学, 江苏苏州 215000;
2.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回顾语文教学的历史, 就能发现“五四”否定汉字, 种下了语文教学困境的根。回顾语文教学的历史, 就能发现“文以载道”之说很可能使语文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简单说教的凭借以及“名师”标新立异的工具。回顾语文教学的历史, 就能明白叶圣陶高倡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就是为了防止语文成为政治的附庸, 防止整个社会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下降。回顾语文教学的历史, 就能明白追求考试的功利把语文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实际上语文中“文化”的绩效是难以考核的, 而语言文字运用的绩效能够考核才不容置疑。所以说, 我们不能把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简单归因到“语言教学”,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借助“工具”渗透“人文”才是正途。

[关键词] 语文教学; 历史眼光; 语言教育; 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111-04

近读李山林教授的文章《“语言”教育的歧路和“文化”教育的回归——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反思》^①, 基本认同山林教授对百年语文历程的概述。但是我们认为, 有些概念仍须辨析清楚: 叶圣陶先生说的“语言”并不等于“语言学”的“语言”; 另外, “文革”后出现的“语言派”主导的语文高考与其主导的语文教学与叶圣陶主张的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也并非一回事。山林教授把时下语文教学的问题主要归向“语言教学”, 窃以为不可。我们认为, 只有把语文教学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辨认, 才能真正意义上找到问题的根源。

一、语文教学被人诟病的根子在哪里?

语文教学开始被人诟病, 恐怕还是肇始于世纪之交的那场大讨论, 但是, 这场与其说是大讨论, 不如说是对“工具论”的大“讨伐”。但是, 这场“讨伐”过去了十多年, 语文教学的生存状态却并

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语文教学的效果更加叫人忧心。事实说明, 语文教学的病根不在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 拯救语文教学的良方也不是“文化论”, 语文教学的病根存在于更深的历史原因中。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所做的有关语文教学的一切改良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1. 向远处看: “五四”否定汉字, 种下了语文教学困境的根

说来也怪, 是“五四”让语文学科脱离读经, 从而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但是, 也正是“五四”, 让语文学科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这主要指的就是“五四”的那些“青年导师”们对汉字的否定。就“语文”而言, “五四”中最惊人的一句话, 莫过于“汉字不亡, 中国必亡”^{[1](P.119)}了。鲁迅、钱玄同这些留日归来的学者, 否定汉字有其历史原因, 这与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无关系。因全盘西化的日

[收稿日期] 2015-07-09

[作者简介] 张长霖, 男, 江苏苏州人, 苏州市第五中学高级教师,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兼职导师。

王家伦, 男, 江苏昆山人,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① 李山林:《“语言”教育的歧路和“文化”教育的回归——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反思》,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2)。

本“脱亚入欧”成功，这成为了当时很多希望改变中国旧面貌的人们心目中改造中国的蓝本。但是中国有着与日本不一样的历史情况，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汉字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否定汉字，刨掉了传统文化的根，中国就不再是中国了。这就是传统文化不可抛弃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汉字消灭不了的原因之一。但是，“消灭汉字”的倡议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于是汉字、文言文就成了几代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走拼音化的道路”一时成了十分时髦的口号。以至到今时今日，国民汉语言文字的水平大大下降已经成了必然事实。这不是当代语文教师的责任，而是有着深深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然而，汉唐不因汉字而衰弱，两宋不因汉字而贫穷，国家贫弱，怪罪汉字，与理不通。要说语文教学的问题，当年否定汉字，是最深处的病根之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需要语言文字来负载，负载文化就是语言文字具体运用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病根，从“梢”上解决语文教学的问题只是痴人说梦。

2. 向近处看：几番改革，收效甚微，甚至伤及根本

而1949年以来，语文教学的改革就从未停止过，但收效甚微。自有现代语文教学以来，考试一直是一篇作文定终身的，到“文革”前还是如此。“文革”后，出现了“语知题”，一直沿袭至今。从大考错别字病句，到引进美国早已发现了问题的选择题，再到后来“开放性题型”走上考卷。再说作文题，先是命题作文，一度又是改写作文，后来材料作文的议论文一统江湖十多年，之后出现了话题作文，极尽时髦之能事。后来话题作文被人诟病，于是“新”材料作文粉墨登场，造成了命题作文、“新”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的“战国时代”。高考指挥棒指挥着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使语文教师疲于应对。

语文教材呢？混乱现象依然。或云思想挂帅，领导人文章纷纷入教材；或云体裁组元，或云主题组元；或高举人文大旗，或大唱道义高调，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叫一线教师根本无所适从。

这样的几番改革说轻点是朝令夕改，教学思路混乱，其后果必然是让具体执行的学校和大量的前线教师无所适从。说严重点，是缺乏法制观念，缺乏对受众的起码尊重。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政方略之一，应慎之又慎，母语教学尤如是。语

文教学的连番改革，已经伤及根本。我们的新一代语文教师已经不知道如何教语文了，他们只知道如何抓语文分数。悲哉！

二、“载道说”可以有几种面目？

“文何以载道”可以向历史要答案，可知“文以载道”由“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提出，千百年来，被人捧为圭臬，以为是不易之说。但是，“文以载道”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常被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以致面目全非。

1. “道”的来龙去脉

那么何谓“道”？“道可道，非常道。”在老子这里，一切形而上的东西皆可以称之为“道”，自然规律、社会法则、思想、道德、修养、境界等都可以为“道”所包容。正因如此，后世的人们说到的“道”也就千人千面。就说韩愈吧，他的“文以载道”的“道”就不是老子的那个“道”，而是狭化成“儒家之道”，也就是儒家的政治理念、道德标准、思想方法等等。倒是稍后的白居易说得更透彻，那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有点“时代精神”了。

简言之，“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思想性和文章的社会功能。而后世认为属于语文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文化传播”基本脱胎于此。这与老子的“道”已经基本没有关系了。

2. 过度追求“道”的历史呈现

山林教授认为“语言”教育是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歧路，认为“文化”教育是语文教育本体的回归，实际上，此论就是十几年前课改伊始时提出的“限制科学主义，倡导人文主义”的翻版。且让我们回头看看过度追求“人文精神”，过度追求“文化教育”的几种呈现方式。

其一，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希望他要“更加莎士比亚化”^{[2](P.340)}。而几乎同时，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作出了几乎一样的评论。不幸的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说，往往是把语文教学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举个例子，1976年上半年，语文教材中被紧急命令插入一篇课文《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批邓”；不久又紧急命令拿掉该文，改上《江青的女皇梦》，以批判“四人帮”。多少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直在“载道”的大旗

下行进,结果是越来越像政治课,越来越不像语文课了。何谓“更加莎士比亚化”?简言之就是表现出活生生的人来,这个“人”,不是高大完美可望不可及的偶像,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甚至有缺点的真人。语文不能不体现是非对错,不能不表达赞成反对。但是语文教学不能仅仅是这些,还要给人以美,给人以想象,更要教会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其二,成了简单说教的凭借。如果我们仅仅把语文看作是时代精神的载体,那么就很可能把语文教学纳入简单说教中去了。这样的局面离我们并不远。原江苏省负责基础教育的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先生退休后潜心研究小学生识字教学,他说起的一个例子笔者记忆犹新。他说,现在的小学老师给小学一年级学生讲“天安门”三个字可以讲一星期。因为他们要从天安门的建造史说起,说到“五四运动”,说到开国大典,说到国徽,说到历次大阅兵……说到他们知道的一切。试问,一年级的小学生能听得懂这些吗?但是,“天安门”三个字呢?学生会写了吗?再说一星期就学会写三个字,是不是效率太低了?这就是简单说教的真实范例,这样的现象并非极端的例子,只是常态而已。但是语文老师不能不这样讲,因为这是思想教育,这是“文化载体”,这是“文以载道”。这样的“文以载道”叫人啼笑皆非,我们还要提倡吗?

其三,成了“名师”标新立异的工具。更可虑的是,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界,在“文化载体”“人文精神”的大旗之下,掀起了一股对文本内容的刻意“深挖”之风。有一批“名师”刻意标新立异,在文本负载的内涵上恣意妄为,动辄做翻案文章。如此“深挖”,或许对打开资质较高的学生的思路有所帮助,但对绝大多数的“平民”学生而言,只会把他们导向思维的误区。所以说,这种做法哗众取宠还在其次,扰乱视听害莫大焉。

语文课该不该承担传承文化、道德品质的养成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识等等重任?该,完全应该!我们认为就某种意义来说,语文教师做的就应该是这个。但是,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更不能成为简单说教的凭借和标新立异的工具。这里面有个“度”。如今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日趋下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必须在提高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播,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通过“工具”渗透

“人文”,^[3]金字塔是不能倒置的。

三、谁理解叶圣陶高倡工具论的苦心?

如今有一种浮躁,那就是借攻击名人抬高自己。新课改伊始,甚至有人提出了“不搬走叶圣陶这座山,语文教改就没有出路”这样的论调。而攻击叶圣陶的着眼点往往就在“工具论”。但是,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刻意回避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叶圣陶的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叶圣陶提倡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就是为了防止语文“载道”过头,以致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番苦心有多少人能体会?

把叶圣陶当作惟“工具论”的代表人物来打,是犯了基本常识的错误。

首先,叶圣陶从来没有片面强调“工具性”,叶圣陶从来没有轻视过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小说《倪焕之》中所反映的强烈的“教育救国”的倾向,还是叶圣陶主编的各时期的语文教材中有关国民素质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主管官员主持编写的教育大纲中有关思想内容的条文,都证明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是重视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把“人文精神”明确表述出来而已。

叶圣陶强调语文教育的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具体说起来就是在建国初期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主管基础教育的一段时间,以及“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的一段时间。我们只要把这两段历史回顾一下,就知道当时叶圣陶力主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实质上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争抗”而已。

这样的局面想必很多人仍记忆犹新,“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时期的语文课基本上就是政治思想教育课,这种“惯性”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语文课上成这样子,还是语文课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叶圣陶强调语文的以“语用”为主体的“工具论”,无非就是尽可能保留一点语文教育的特质,尽可能让语文不太像政治的附庸。所以,我们把叶圣陶的努力,定义为“争抗”。

现在的年轻人能理解叶圣陶当年的良苦用心吗?叶圣陶在当时情形下提倡语文教育的工具性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割断历史,把人把事放到他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考虑,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又岂止是认识

叶圣陶和“工具论”时的需要！

影响语文教学效果的不是语言，而是政治气候。

再说，如果看看现时下语言运用整体水平之低下，就发觉叶圣陶当年提倡语言教学（实际上就是语用教学）也确实有切中时弊之效。在课程改革进行了十多年的当今，且不说现时社会上乱用成语，甚至辞不达意的现象，就说应该以“语言典范”著称的当下语文教师吧，其语用能力之低下，也有些让人忍俊不禁。曾有一位青年教师的语文公开课上指导学生进行说明文写作，写作规范教师讲的头头是道，但最终教师发给学生的学习“样本”却是一篇散文。面对这样的现状，语文课该不该抓一抓语用教学呢？

四、语文教学的绩效应该怎样衡量？

“绩效”，是指组织、团队或个人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完成任务的出色程度，是对目标实现程度及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馈。时下功利的教学不能“免俗”，必然也祭起了追求绩效的大旗。

1. 考试功利的悲剧

说起来，我们的教学出现功利性走向，也是历史的反弹。“文革”期间，高考与教育“失联”。一朝恢复高考，自然呈洪水决堤之势。于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即植根于此。然而，仅仅过了20多年，世纪之交，忽然“万炮齐轰”语文，语文成了失败的基础教育的替罪羊。“误尽苍生是语文”，说的是语文教学效果差，费时费力。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分”——语文高考的低分政策让语文老师背上了骂名。分数是硬道理，高考指挥棒害惨了语文，当然也害惨了语文教师，而并不因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只有“语言”没有“文化”。

——这也是我们想与山林教授探讨的一个问题。

2. “文化”的绩效何以考核？

事实上喜欢讲绩效的朋友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绩效该如何考核。我们不妨看看江苏省的高考语文文科加试题的“文化”考核吧。如考某一文学名著的某一个具体内容，此类题意在“指挥”学生读书，用心良苦。但是，事实上此类题一经问世，就出现了“代读”的怪现象，也就是语

文教师把可能考到的文学名著整理几条，猜题押宝，学生仍然不读书。于是我们考核到的是教师的押宝本领，而不是学生的读书情况。

想当年，笔者每教《五人墓碑记》，必定带学生到五人墓现场去感受那特定的氛围。笔者相信，即使同在苏州的同行，大多也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们照样也教《五人墓碑记》。这样的语文课的“文化”含量，在考核中如何体现得出来？

“文化”的绩效是隐性的，也许要用学生一辈子的发展才考核得出来。我们等得及这样的考核吗？

3. 语言文字运用的绩效能够考核

而语言文字运用的考核就是显性的，就可操作得多。这个问题不用我们说，大家一直都在做，驾轻就熟。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素养呢？还是那句老话：多读多写。不要那样刻意地追求“文化”或“人文”，而是要让学生读自己喜欢的文章，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们至少要先让学生觉得语文“有味”，愿意学。改善语文学科的生存状态，必先从学生不拒绝语文开始，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多年来，笔者一直以为，叶圣陶先生的有一句话把语文教学最根本的问题讲透了，那就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才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只要教会我们的学生自己读书，从而吸收“文化”；进而写得出自己的心里话，从而输出“文化”。我们语文老师的主要使命也就完成了。以上所述，不过是希望语文教学界的同仁们不要忘记自己最主要的使命，那就是教会学生自己读书。

——谨以此与山林教授商榷之。

[参考文献]

- [1] 鲁迅. 痘中答救亡情报访员[A]. 倪海曙. 中国语文的新生[C]. 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49.
- [2]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欧阳芬, 王家伦. 语文教学: 借助“工具”渗透“人文”[J]. 中学语文, 2009(7-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产出导向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研究^{*}

黄 珍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 广东广州 510520)

[摘要] 以文秋芳的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为基础, 探讨其在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 在教学过程中以阅读中的文本为载体, 践行以说、写带读, 以读促说、写的教学理念, 构建从“输出驱动”到“输入促成”再到“产出评估”的教学过程, 挖掘实施产出的有效途径与评估方式, 提升学生的语言产出能力, 实现有效的阅读课堂教学。

[关键词] 产出导向法; 文本; 阅读;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115-05

一、研究背景

阅读能力是英语为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者必备的一种技能。^[1](pp.1-65) 国内高校英语类专业基础阶段大部分都开设英语阅读课(也称泛读 Extensive reading)。《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描述为“英语阅读”(以下简称“阅读课”), 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 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析归纳、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 包括细读、略读、查阅等能力; 并通过阅读训练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吸收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阅读课教学应注重阅读理解能力与提高阅读速度并重^[2](P.19), 这是国家层面上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阅读课的定位, 对英语教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对阅读课的课堂教学的负面评价就没有停止过。首先从教学法上来看, 邓世俊认为传统英语泛读教学法存在缺陷与不足: 缺乏足够的和有效的阅读技巧的教学, 没有阅读前的提示、引导活动, 缺少丰富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 单一的习题模式, 缺少适当的放松性活动^[3]; 从课程的功能上来看, 泛

读课远未起到其应有作用^[4]。杨翠英认为泛读教学中存在着“让学生无目的地阅读而不能有针对性的阅读”“不能为学生提供积极参与和思考的机会”^[5]等问题。何宁等认为在泛读教学中“无论在阅读兴趣还是词汇方面都成了教与学的拦路虎, 以致在课堂教学中遇到不少困难, 教学双方都对课程不满意, 甚至不少同学认为可以取消泛读课”^[6]。总体上来说, “我国内地的外语泛读教学从理念到现状都不容乐观”^[7]。

基于以上几点, 结合笔者多年教学实践与观察, 阅读课确实面临着一些“难以言说”的困境。第一, 受到阅读课课程性质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思维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课堂活动依然以“读”为主, 缺少互动, 导致阅读课的课堂氛围较为沉闷。第二, 阅读材料与教学组织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部分阅读材料的难度较大, 与学生现有的理解能力不匹配, 教师极易将其当做精读来处理, 依然停留在词汇、语篇理解的讲解上, 导致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与精读课的区别度不高, 课程设置的效果难以凸显。第三, 课程评估的模式单一, 教学效果不佳。通过阅读实现大量输入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输出, 但考察评估输入的

*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产出导向型英语专业阅读课程教学模式探析”(项目编号:2015J008)。

[收稿日期] 2015-06-15

[作者简介] 黄珍, 女, 湖北襄阳人,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手段依然有应试化的倾向,即单纯通过习题来考察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正是基于以上问题的困扰,笔者以文秋芳为代表提出的产出导向理论体系为基础,尝试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在阅读课中,以文本为重要媒介,通过说、读、写的互动,实现评估模式的多样化,激发学生在阅读学习过程中的语言产出能力。

二、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是以文秋芳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家们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的探索与尝试^[8]。该理论体系包括3个部分,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如图1^[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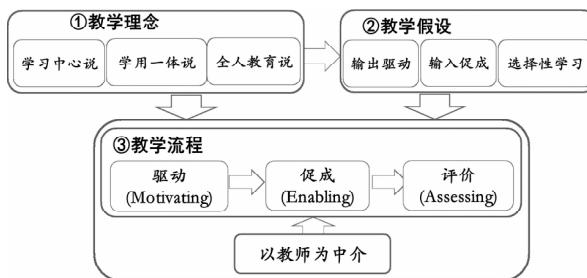


图1 POA的理论体系

教学理念包含三大基本原则,即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从这三大基本原则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格局,回归课堂教学的本质,即教学必须要实现教学目标和促成有效学习的发生,提倡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紧密结合,两者之间有机联动,无明显时间间隔^[8]。教学假设中的三个子假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其中“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是该体系的理论核心,在此重点阐述其发展过程。1995年Swain在认可Krashen的输入功能前提下提出了输出的四个功能^{[9][10](pp.128-140)}:(1)增强语言的流利度;(2)提高学生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程度,揭示所想与所能之间的差距;(3)帮助学习者检验语言假设;(4)促进学生对语言形式的反思能力。2008年,文秋芳就英语专业技能课的课程设置提出了“输出驱动假设”,该假设只针对中、高水平学习者,不适合初学者或者低水平学习者,只限于正式的外语课堂教学^[9]。2013年,文秋芳再次对“输出驱动假设”和“输出假设”进行剖析,指出二者存在的明显不同,“首先,两个假设的出发点不同,输出假设探讨的是二语习得理论,而输出驱

动假设关注的是二语教学效率问题,输出驱动假设是一个二语教学假设,而不是二语习得假设”。 “第二,两个假设挑战的对象不同。Swain的假设挑战的是Krashen的输入假设,输出驱动假设挑战的是‘输入促输出’的教学顺序和听、说、读、写、译能力均衡发展的教学目标。该假设针对中高级外语学习者,主张教学要以输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11]2014年3月在题为“形势、目标、能力、策略”的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文秋芳以“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为题,报告了基于试验结果对“输出驱动假设”进行的修订与完善,并将原有的“输出驱动假设”修改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Output-Driven, Input-Enabled Hypothesis),清楚界定输入与输出的关系^[12]。2015年,文秋芳及其团队经过近8年的探索研究,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法即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并将“输出”更正为“产出”,“产出”除了包括“输出”所指的说和写以外,还包括口译和笔译;“产出”对应的英语是production,既强调产出过程(producing),又强调产出结果(product)^[8]。

三、产出导向法在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

“产出既是语言学习的驱动力,又是语言学习的目标。产出比输入性学习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学习热情,更能够取得好的学习效果。”^[8]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在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阅读课中在理论上是有其可行性的:首先,本科英语专业学生经过了至少6年正式的英语学习,属于中、高级外语学习者。其次本研究过程中课程的设计及实施主要针对正式的外语课堂教学。阅读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开设阅读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大量的输入,但是“一个没有输出驱动的学习过程,即便有高质量的输入,其习得效率也有限”^[9],因此从产出导向的视角研究阅读课上的输入、输出及二者的关系是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一种尝试。

本文重点讨论阅读课堂教学,因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教材范围内的文本。大纲明确提出“教材应选用题材广泛的阅读材料,以便向学生提供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素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英语语感,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2]。国内的大部分阅读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以话题为中

心。编者通常就某一个单元或者章节选取两到三篇文章,每个文本后配有相关的习题,如问答、词汇辨析、词组填空、大意概括、细节判断等。体裁多样,展示目的语中风格各异的文本。“文本的多样性使文本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标准”^[13],由于研究的深度有限,这里不对文本进行特别详细地划分,

而是重点探讨如何利用教材中的文本在阅读教学中应用产出导向法,前面提到产出的形式包括说、写、译,这里只探讨如何充分挖掘文本价值,寻找输入与输出的最佳结合点去实施说和写的阅读教学活动,主要的教学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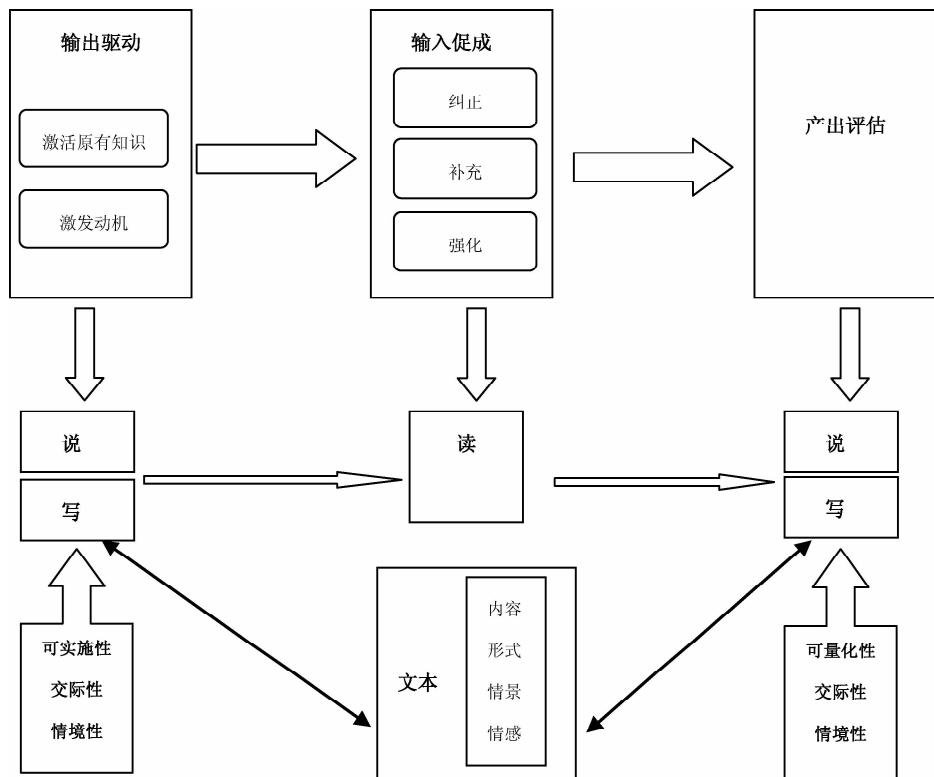


图 2 基于文本的产出导向型阅读课堂教学过程

1. 以说带读,以读促说

以“说”为产出的教学过程始于说,止于说,以读为重要输入,利用文本的话题、情景实施产出活动。始于“说”的目的是激发动机(motivation)或者激活原有知识(prior knowledge),动机与阅读的质量是相关的^[13],好的动机能够激发阅读,而激活原有知识能够促进理解^[1]。课堂教学中,首先要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文本去“说”。其一可以利用文本的话题。教师选取与文本相关的话题,这里的“相关”体现在内容、价值、态度上,搭建一个从“说”到“读”的桥梁。其二可以利用文本中的情景。教师选取一些既与文本相关又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信息。如何判断选取的信息是否具有潜在交际价值?“如果能够列举出产出任务发生的交际场景,这项任务就具有交际价值^[12]”。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说”?以简短、限时的小型口语活动

为主,因为此阶段的“说”旨在驱动,不必耗费过多的时间,如口头报告、对话等形式。该阶段教师要关注学生“说”的内容,目的是观察学生的产出与文本的信息是否相关,如果产出的信息不准确或者存在遗漏等,这就需要教师有意识地提醒学生通过后期“读”文本来发挥纠正、补充及强化的作用,因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中强调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中介”(teacher-mediated)的学习,即整个过程是以学习为中心,在教师的引导、指导下完成一系列的输入输出任务。第一阶段“说”的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引导学生进入“读”的状态,该阶段的“读”是完成第二阶段“说”的基础。文本阅读的任务完成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再次回到“说”的环节,设计具体的产出任务让学生从所读文本中领会、掌握、利用信息以协助其完成第二阶段的“说”,因此这一阶段的产出一定需要评估,即

设定具体的标准来检验产出。

2. 以写带读,以读促写

读写结合教学模式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基于读写结合的实证研究^{[14][15]},有从教学团队建设提出“读议写”课程群的理念与实践^[16],而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在阅读教学中是始于写,终于写,以读为重要输入,利用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实施产出活动。那么阅读中的文本能够为写作创造什么价值呢?首先,文本的话题可以启发读者思考,激发写作的灵感,还能作为写作的论据支撑,如文本中的观点、事实、态度等;其次,文本的类型可以作为某种文体的范文,充当模仿练习的重要素材,比如叙述类文本中的动词、形容词,议论文体中的逻辑性与连贯性;该过程的“写”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写”要用具体的、可实施的、与文本相关的写作任务去激发学生的阅读动机。“读”的过程中教师要有所“干涉”,特别是引导学生理解、欣赏并最终利用文本,实现最后的产出。从产出的形式来看,可以从句子到段落再到篇章;从产出的文体来看,可以从叙述文到议论文。总而言之,要在充分挖掘文本价值的基础上实施产出。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再次发挥作用,对文本进行筛选整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能够为产出创造价值,要寻找输入与输出的最佳结合点,为课堂教学创造价值。

3. 讨论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从图 2 看出,输出驱动阶段以“说”“写”为中心展开教学活动,其特点是任务的可实施性、交际性和情景性。输入促成阶段以“读”为主要学习任务,其主要功能是对第一阶段的输出进行纠正、补充及强化。同时输入的“养分”来自于文本,包括文本的内容、形式、情景及情感等。最后的产出一定要可量化、具有交际价值。笔者以阅读课堂教学为立足点从学习目的、教师任务、学生任务三个方面将传统模式与产出模式下的阅读课堂进行对比,如表 1 所示。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如果将这种方法应用在阅读课中,那么该课程的主要任务岂不是成了“说”和“写”?有悖于“读”的教学目的?这就要回到“设置阅读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教学理念是“学用一体说”^[8],“无论阅读课文还是接受听力材料都要为完成产出任务服务”^[8],因此从这个角

度分析,阅读的最终目标是产出,这也是英语学习的最终目标,阅读课上的产出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产出导向法应用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的任务更艰巨,首先,教师对阅读材料不能仅仅局限于词汇、句子、语篇的讲解与分析,更多地要从全局把握文本的价值,特别是要能够设计出与文本相关而又具有交际价值的产出任务;第二,教师要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以合适的角色参与指导学生完成产出任务。另外产出导向教学法要想有效实施还有赖于学生的积极参与,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已经习惯了“听讲”的课堂模式,真正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进行语言的产出实践未必是一件易事,需要教师做大量的前期准备、调研以及后期的访谈工作。

表 1 阅读课堂的传统模式与产出模式对比分析

阅读 课堂教学	传统模式	产出模式
学习目的	以“读”的方式实现大 量输入,从而促进输出	以产出驱动“读”,以 “读”促成产出
教师任务	1. 导入(背景介绍) 2. 布置阅读任务 3. 分析重点词汇、长 难句 4. 介绍相关阅读技能、 策略 5. 核对相关练习的 答案 6. 讲解练习	1. 布置任务(说、写) 2. 考察任务完成情况 3. 引导阅读(技能、策 略) 4. 筛选文本 5. 评析并利用文本 6. 评估产出
学生任务	1. 阅读 2. 查生词、理解句子、 语篇 3. 应用阅读技能、策略 4. 巩固练习	1. 完成任务(说、写) 2. 展示 3. 反思 4. 阅读文本 5. 利用文本 6. 产出(说、写)

四、结论

产出导向法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的一种尝试,对中国语境下的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以职业为导向的语言教学中,产出导向法在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中是可行的,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阅读学习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即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利用文本促进产出。其次,为互动教学创造条件,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增加了“说”“写”的课堂活动必然会逐渐摆脱以“读”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第三,阅读中的文本被充分利用,教师一定要对文本的进行二次“处理”,实现教学资源利用的最优化。“读”依然是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走

向“产出”的必经之路,发挥着“输入促成”的巨大作用,但从课程的最终使命上看,“读”是为了更好地实施产出,即“说”“写”“译”。另外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产出能力是学生走向职场真正需要的能力,这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宗旨是一致的。然而,本文只是从理论层面对产出导向法的应用进行阐述,尚未将其全面地应用于教学实践,产出模式和传统模式的阅读课堂相比是否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产出能力,教师如何更有效地评估产出,如何保证产出的质量,教师如何利用新方法与学生共同成长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参 考 文 献]

- [1] Neil J. Anderson.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M]. Boston: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2000.
- [2]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3] 邓世俊. 我国英语泛读教学必须改革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2(2).
- [4] 夏赛花, 吴古华. 英语泛读课的现状及改革——北京三所高校的调查报告 [J]. 外语界, 1997(4).
- [5] 杨翠英. 英语泛读教学中的问题与建议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8(4).
- [6] 何宁, 董颖. 从《新编英语泛读教程》使用情况谈泛读课的教改 [J]. 外语界, 2000(2).
- [7] 李天紫. 论英语泛读教学的发展趋势 [J]. 外语界, 2007(6).
- [8]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4).
- [9] 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与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改革 [J]. 外语界, 2008(5).
- [10] Swain, M.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In G. Cook&B. Seidlhofer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r of H. G. Widdows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 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思考与建议 [J]. 外语界, 2013(6).
- [12] 文秋芳.“输出驱动, 输入促成假设”: 构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4(2).
- [13] J. Charles Alderson. *Assessing Read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4] 徐浩, 高彩凤. 英语专业低年级读写结合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 [J]. 现代外语, 2007(2).
- [15] 左艳红. 英语专业低年级读写课新课型可行性实证研究 [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
- [16] 陈敏哲, 白解红. 英语专业阅读写作课程改革探索——以“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在建的“读议写”课程群为例 [J]. 中国外语, 2012(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卫生法学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促进^{*}

祝 彬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9)

[摘要] 卫生法学的宗旨和目标与医学人文精神高度契合。卫生法学体现了对生命法益的保护,其伦理渊源体现了对医学人文精神的追求,其内容具有人文特质;并且,卫生法学中的权利义务观体现了新型医患关系模式下医学人文精神的要求。卫生法学教育兼具人文精神之柔性和法律精神之刚性。卫生法学教育促进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主要包括:确立开放式和实践性的卫生法学教育路径,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并在学校内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

[关键词] 卫生法学教育; 医学人文精神; 促进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8-0120-04

一、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作为一种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是万物的尺度,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载体,是人类所特有的且为人而存在的人类有史以来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为:一是发现和尊重人性和人的需要;二是重视人的价值;三是注重人格的完整和充分的自我发展;四是崇尚和尊重人的尊严。^[1]人文精神应当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认同和自我尊重,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权利、自由、人格、尊严等的维护、追求和关切的精神和信念。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挚爱生命、在医学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反映人类对生命根本态度的精神。^[2]医学的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感情的一种社会存在,具有社会性。因此,医学人才比其他专业人才更应具备宽广高深的文化素养。^[3]医学人文精神相较于普通的人文精神体现为它是一种一切以患者为本的精神,表现为对患者的关怀、理解和尊重以及对患者权利的维护。医学人文精神强调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关心、主体地位的认同、人格尊严的维护和权利的维护。对

人类中的患者这一特定群体的人文关怀也是人类对自身关怀的一种体现。

二、卫生法学的宗旨和目标与医学人文精神高度契合

法的人文精神应当体现为法律和法学将人作为运作的核心,把人的权利保护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及终极目标。医学人文精神以患者为中心,倡导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关怀、人格尊严的维护、基本权利的尊重。卫生法学作为研究调整医疗卫生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法学学科,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命、健康、发展、尊严等核心的权益,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生命法益,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尊严和权利,卫生法学的宗旨、目标和规范与医学人文精神高度契合。

1. 卫生法学体现了对生命法益的保护

法学和人的行为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卫生法学以规范医疗卫生活动的卫生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医疗卫生活动和人的生命、健康、价值、尊严等密切相关。卫生法学是随着生命科技和医事发展所引发的诸多法律与伦理问题而

* [基金项目] 南京医科大学“十二五”教育研究课题“卫生法学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促进研究”(项目编号:2013-21)。

[收稿日期] 2015-07-10

[作者简介] 祝彬,男,安徽砀山人,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兴起的、以卫生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是法律和法学对生命科学及医学社会问题的回应,同时与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卫生法学更加蕴含着人文的内在特质和要求,卫生法学教育更应当融入人文的理念和意识。

医学与法学关系密切,法律调整、规范医疗活动和医学发展的同时,医疗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又要靠医学的帮助来判明责任,明确因果关系。医学与法学存在共同之处,医学的目的消除人类的疾患和痛苦,法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权利;医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控制疾病,法学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社会冲突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都是将普遍的原则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卫生法学所体现的对生命法益的维护与医学人文精神不谋而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医学从业人员加强卫生法学教育有助于解决“医学尊严的蜕变和医生个人与组织声望的下降”,有助于提升医学从业人员的医学人文精神。

2. 卫生法学的伦理渊源体现了对医学人文精神的追求

通常,“科技发展是不同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5](P.10)}但是,医学科技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卫生法律规范对医学科技活动的规范,使得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技术发展沿着法律的轨道前行。法律不仅具有工具意义,更有人文主义价值和精神蕴涵,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法律的真正职能是浸渍了对人的个性、人格尊严以及人的价值等的关怀。^[1]一切进步的法律必然彰显人的主体性,注重保护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尊严和幸福,处处体现人性的光辉和对人文的关怀。法律的进步性与其人文性密不可分,人文性体现了法律的进步性。卫生法学及相关的卫生法律规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和渊源,使得卫生法律规范本身更加具有伦理的正当性,符合人类自身对医学研究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保证医学科学研究方向沿着正确的法律轨道前行。

3. 卫生法学的内容具有人文特质

卫生法学及相关卫生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医疗卫生实践活动的发展。法律是人类社

会活动和发展的调节器,卫生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卫生法律规范调整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活动和医疗卫生发展,例如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和运用的规范,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研究和运用的规范。卫生法学教育处处体现着人文的特质和要求,例如,卫生法律规范所倡导的平等原则早在唐朝就已经被“医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做了详细阐释:作为医生,对前来求医者,无论贵贱贫富,无论官商士农,无论乞丐盗匪,均应视作至亲,一视同仁。这表达了对一名医生应具备的起码的人文素养提出了要求,一视同仁对待患者,与法律上平等原则具有同样的本质内涵。

卫生法学属于法学学科,人文精神是法学的内在要求,同时,卫生法学的规范对象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活动,因此,卫生法学的人文内在要求更加的强烈。而且,卫生法律规范的执行与落实需要医学人文精神的支撑与推动,一切医疗卫生实践活动都和人这一主体密切相关,卫生法律规范在调整医疗卫生实践活动中必须要体现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权利等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法律精神的要求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

4. 卫生法学中的权利义务观体现了新型医患关系模式下医学人文精神的要求

传统的父权主义医学模式已不复存在,新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正在彰显,“医患共同参与”的医学模式,以及生物—心理—社会一体的医学模式已经取代了原有的医学模式。新的医学模式下,患者的权利观念逐步增强,患者单纯被动接受治疗的情形正在被双方积极参与的医疗方式所替代,这给医学人文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医患关系模式下,部分依靠伦理调整的医疗活动逐步上升为刚性的法律调整,医患之间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逐步取代伦理关系,强调医患关系中对患者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尤为重要,权利义务意识逐步成为医学人文观念的重要体现。卫生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培养他们尊重患者权利的意识和观念,接受和适应现代医患关系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培养符合权利义务观念的医学人文精神。

三、卫生法学教育:兼具人文精神之柔性和法律精神之刚性

一般来讲,学校教育都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科

技教育；其二是人文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人文教育是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和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6]其核心是人文精神的培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也就是说，人文教育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围绕着人文精神的养育而展开的，关注人格尊严与人格完善是其应有之义。卫生法学教育属于人文素质教育，目的是使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从而指导人的行为。卫生法学教育的内容更加体现人文精神，因为卫生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医疗卫生活动，而医疗卫生活动开展的核心目标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实现，医疗卫生活动的开展是围绕人这一核心主体要素展开的，这就要求在医疗卫生活动中应当更加充分地体现人文精神，最大化满足人的合理需求，尊重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等。因此，卫生法学教育的内容应当以人文精神为其精髓，通过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使医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将来的职业中人文精神之重要，从而践行医学人文精神。卫生法学教育中体现的人文精神反映了卫生法学教育的人文柔性特质。

卫生法律规范调整医疗卫生活动的方式是通过对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而实现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区别于伦理、道德关系的最大之处就在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通过事前调整来明确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界限，同时通过责任追究的事后调整来修复被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使得卫生法律规范调整医疗卫生活动的方式具有强制性。虽然卫生法律规范的调整目标与医学人文精神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卫生法律规范对医疗卫生活动的调整具有强制性，它将对人的生命健康、尊严、价值等人文精神要求的内容通过权利义务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急危患者进行抢救的义务，对患者隐私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利的保护和尊重等。因而，卫生法学教育中较多的体现着法律精神之刚性。

四、卫生法学教育促进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路径

有学者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指出，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在医学院校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应列为医学人文模块的核心课程。^[7]卫生法学

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实践价值不言而喻。卫生法学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促进的有效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 确立开放式的卫生法学教育路径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升华，是人的一种自觉和自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人文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更需要通过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使学生在行为中自我教育，在实践中自我养成。^[3]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尤其如此，必须要有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才能使学生置身其中，更加理解人文精神，更好的践行人文精神。卫生法学教育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同样需要尊重社会实践的路径。尽管教学时间有限，难以带领学生到医疗实践活动中切身感受医学人文精神，但是可以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解读、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评判、通过角色扮演等来实现情景化教学的效果，让学生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推动学生对医学人文精神的认知和感悟。卫生法学课程特征和内容的特点决定了其教育必须要采取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应当吸纳更多的优秀资源进入卫生法学教育队伍，卫生法学教育离不开一线从事相关实践工作人员的参与。作为医学院校，往往有自己的附属医院，学校的卫生法学教育应想办法整合优秀资源，邀请附属医院从事卫生法务工作的一线人员参与进来，创建卫生法学教育的人才库，增强卫生法学教育的生动性。

2. 确立实践性的卫生法学教育路径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之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务工作者的实践能力不仅表现为对医疗技术的运用，同时表现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等实践能力。如何在医疗实践中遵循卫生法律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义务并与患者进行有效和恰当的沟通，将直接关系到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甚至关系到最终的医疗效果。这要求卫生法学教育应当与医学的实践特点相结合，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精神、法律思维，使其将来在临床实践中能够自如的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尊重患者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并与患者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创建良好的医患关系，使医学人文精神得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彰显光辉。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8]。医学本身就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卫生法学教育更应当要求采取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实践性的卫生法学教育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突破：

(1) 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卫生法学教学紧密联系实践的重要桥梁，也是卫生法学教育完成提升医学生法律素养使命，以及提高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能力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们更加深刻理解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不容侵犯性，明白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重要意义。案例教学的生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念，这种法律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念是将来医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坚守道德和信仰的力量源泉。卫生法学教育应当引入相关典型案例启发学生法律思维，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让权利义务观念植入医学人文精神之中。

(2) 观摩庭审教学法。带领学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司法活动，更深入了解司法运作的机理、程序和规则。通过对具体案件庭审的观摩，有助于学生更真实的感受到一些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医疗纠纷的特点，以及医疗纠纷应当如何防范和避免，有助于医学生归纳和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努力方向和目标，有助于医学生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并将这种观念融为医学人文精神的一部分。

(3) 讨论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有利于学生拓展思考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养成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看待问题的思考习惯。并且，通过对一些重大焦点问题讨论的参与，可以让学生更深入了解问题背后的本质，更好的理解问题的根本，启发学生考虑问题更加全面。通过对问题的多角度讨论，可以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己不欲为，勿施于人”，有利于将来处理医患关系时更加耐心和包容，增强其处理问题的能力，提升其人文精神。

3. 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

医患关系模式的转变、医疗服务关系的确立、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等，让部分医务工作者无法接受自己支配地位的改变，从而对医患关系状况过于悲观，认为医疗工作难以开展，这是对医患关系本质的误解和对社会发展适应能力不足的反

映。医学产生和发展的本源就是为了消除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为患者服务的是医学发展的宗旨。平等医疗服务关系的确立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医患关系的一种法律解读和法律确定而已，医患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以患者为中心是医学发展的一贯宗旨，树立这种服务意识有利于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有助于对患者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自主权利的保护，有助于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人文精神。这就要求卫生法学教育中着重培养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和法律精神。

4. 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

作为培养医务工作者基地的医学院校，要想让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富有医学人文精神，成为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学校整体的人文精神氛围不可缺失。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果，不可一蹴而就，学校应着力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卫生法学教育工作在学校人文精神氛围的营造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法制宣传、专题讲座、案例解析、法律咨询等形式培养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提升校园人文精神的氛围，为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参考文献]

- [1] 樊卓华. 法学基础教育中融入人文知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J]. 理论导报, 2013(11).
- [2] 刘虹. 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6(2).
- [3] 贾颜. 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12).
- [4] 胡平仁. 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与人文关怀[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 [5] 黄丁全. 医疗法律与生命伦理[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6] 雍淑华. 高等教育的人文缺失[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4).
- [7] 陈洁, 姜柏生, 刘虹. 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8(9).
- [8] Blume.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J]. *The China Law Review*, 1983(17).

(责任编辑 光 翟)

Guarantee Conditions for China's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ANG Hai - y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needs a series of guarantee conditions, such as the basic organization, the necessary system regulations and the relevant platform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the leading group for education reform is its governing body, the autonomous civil societies function as its advisory body,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hird party serve as its supervisory body;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guaranteee,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from the aspect of platform support, technical platform, business platform,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built as well.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 system; guarantee conditions;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system guarantee; platform support

From "Virtue is Knowledge" to "Virtue is Capital"

JIN Qi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Virtu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apital as well as with knowledge. The theory that virtue is knowledge emphasizes the knowledge deposits and precondition of virtue, which reflects the unity of the good and true, i. e., virtue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ue and reliable knowledge. So, education is a rational path to cultivate virtue. While the theory that virtue is capital holds that virtue is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apital and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as well, thus laying stress on the capital attribute and value attribute of virtue. Virtue capita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namely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virtue capital. Virtue, as the capital, is not only a tool, but also the value itself. The rational route map from "virtue is knowledge" to "virtue is capital"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line from education to knowledge, to virtue and to capital.

Key words: virtue; knowledge; capital; education

SWOT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aizhou

ZHANG Ying - hu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n Taizhou has come into the bottleneck period currently after experien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its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via SWOT analysis method, it is propos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aizhou should implement growth strategies instead of stability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zhou, which serves as a motive forc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do a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secondly,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create preponderant disciplines through proper positioning, clear thinking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eek diverse support to transform the disadvantages;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enhance the connotation.

Key words: Taizhou; higher education; SWOT analysis;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Review on China's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Rural Preschool Left - behind Children

XU Lin

(*Preschool Education School,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Rural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vulnerable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ization. Social support system, as a protection mechanism,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se children's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current researches have initially form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rural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most still stay in the scattered state of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which still need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dynamic research. There exis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udies: first they only focus on some remote support subsystem without dealing with the core problems —— family education near-end subsystem; second, they lack the targeted intervention plans and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The future research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preschool children, need to build a coordinated social support syste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ociety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Key words: rural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support system; family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ZHANG Qin ZHAO Min - qi

(1.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46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the most basic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Building a new, orderly and harmoniou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needs to stick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roaden the cultural horizons and form ethical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serves the people, and educators need to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policy. With this sense of mission, only by establishing an equal relationship,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and highlighting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ca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 promoted, can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pect and benevolence be embodie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can the mutual development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 achieved and their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new typ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thical consciousness